

#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11年

**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关于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的重要修正**

**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

**苏俄对华政策与中共建党**

## 目 录

### 求实篇

- 1 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王占阳
- 6 关于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的重要修正 .....高 锴
- 9 苏俄对华政策与中共建党 .....夏白鸽

### 春秋笔

- 15 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胡治安
- 21 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 .....王晓中
- 26 1958年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原委  
..... 崔 敏

### 往事录

- 31 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萧 扬 整理
- 34 1945年中苏军队会师的一些情况 .....段沐恒
- 41 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 .....蔡晓鹏
- 47 我和伯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通信 .....吴 昆
- 49 文史资料委员会建立的前因后果 .....雷 戈

### 一家言

- 51 如何跳出反腐困境：建党90年的思考 .....李永忠
- 55 谨防改革走偏 .....张千帆
- 59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茅于軾

### 亲历记

- 61 在胡耀邦家做客 .....陆魁宏
- 65 在南宁陪首长跳舞 .....郭美春
- 69 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 .....魏海林
- 73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文革纪事 .....张 军

### 争鸣录

- 78 也谈儒家与民主：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解正中
- 82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王树人 解芳雯

### 怀人篇

- 84 痛别陆钦侃老友 .....李 锐

### 海外事

- 86 苏联顾问与斯大林模式移植东欧 .....徐元宫

### 编读窗

- 94 读者来信摘登 .....温兴路 等

### 专 稿

- 95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感言 .....杜导正
- 96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杨汝岱
- 96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贺词 .....许嘉璐

###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方 实       | 王 俊 义      | 冯 健 | 冯其庸 |
| 卢跃刚       | 曲润海        | 何 方 | 吴 象 |
| 吴明瑜       | 宋木文        | 张文彬 | 张 岷 |
| 张希清       | 张荣华        | 张惠卿 | 杜 光 |
| 杜导正 (召集人) |            | 李一鑫 | 李大同 |
| 李冰封       | 李宝光        | 李维民 | 杨天石 |
| 杨奎松       | 杨继绳 (副召集人) |     | 沈志华 |
| 苏双碧       | 陈 敏        | 邵燕祥 | 周瑞金 |
| 金冲及       | 赵德润        | 保育钧 | 郭道晖 |
| 资中筠       | 钟沛璋        | 凌 云 | 展 江 |
| 秦 晖       | 袁 鹰        | 袁伟时 | 高尚全 |
| 陶斯亮       | 钱理群        | 章诒和 | 萧蔚彬 |
| 彭 迪       | 韩 钢        | 董 健 | 曾彦修 |
| 鲁 淳       | 雷 颐        | 魏久明 |     |

### 社 委 会:

杜导正 (主任) 吴 思 (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 社 长:

杜导正

###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 总 经 理:

李 晨

###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 理 事 长:

杜导正

###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 理 事:

白建钢

### 秘 书 长:

吴 思

###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奕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 (北京399信箱)

###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68525374

办公室: 68522852 (传真)

###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296号

###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8.00元

# 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 王占阳

自上世纪初以来，创建新中国的建国思想、建国运动和建国实践，一直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历史主流。在这一过程中，从直接追求新中国，到面临名不副实的新中国，再到追求名副其实的、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先驱者们曾经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这段历史值得回眸和回味，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历史方位。

## 一、“新中国”的提法与早期实践

从历史上看，中国最早主张建立新中国的，实际上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清末立宪派。立宪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学习现代文明，建立现代社会，所以他们的奋斗目标实际已是建立新中国了。立宪派的建国之路本来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但因有关各方（特别是满清贵族方面）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不是狭隘愚钝就是豪放不羁，不是过于保守就是过于激进，硬是把一盘活棋给走死了。

最早提出和使用“新中国”这个词的，也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立宪派。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1902年6月，他在《杭州白话报》上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年11月，他又在《新小说》杂志上开始连载自己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国人展示了一幅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到辛亥革命前，“新中国”这个词就已开始流行了。如当时的共和派也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开始在内部讨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了。1910年，上海名医陆士谔还曾写成政治小说《新中国》，畅想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现代化的新中国，其中对于上海未来的预言尤为准确，甚至预言到了2010年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

到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这个词已相当流行。这是因为，与立宪派不同，共和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人民共和国（即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连形式上的皇权都要废除，这就已经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新中国了。由于这种新中国比立宪派的新中国还要新颖得多，所以他们更有理由、也更有底气使用“新中国”这个词。故而，孙中山引导国人为“创建民国”和“改造民国”而奋斗时，始终以“建设新中国”作为号召，从而成为继梁启超之后最有力地倡导“新中国”的第二人。在这种背景下，进而又是在人们不满意民国现状的背景下，“新中国”这个词在民国时期逐渐流传开来。后来中共使用“新中国”这个词，实际也是由此延续下来的。

“新中国”这个词的内涵自始就是非常革命的。它从来都不是指新王朝，而是指现代化的新中国。由于经济现代化自始就是它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新中国的先驱者们也首先从经济角度认识了这种建国历程的长期性。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建立了共和国，那也不等于建成了新中国。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就在国外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民国元年，他又在上海说：“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在他看来，民国建立后，着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也是“创造新中国”之继续。所以，卸下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就开始醉心于修铁路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孙中山也还是过于乐观了。事实表明，即使是建立共和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刚刚建立的共和很快就出现了大倒退，孙中山也很快看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

234  
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而一切這些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與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與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聰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19日)，  
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发行。

真中华民国。”但他主张的大革命并不是要推翻中华民国，而是要“捍卫民国”、“改造民国”、“造成真中华民国”。他要在保卫民国的框架内“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他在临终前留下了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从建国角度看，这就是：建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实际上，自宋教仁遇刺后，“中华民国名不副实”即已日益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即使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是承认这一点的。这就使清末时期的创建新中国演变成了民国时期的创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而其举国公认的提法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基于这种广泛共识，“抗战建国”才成为抗战初期最能激发国人奋起抗战的主旋律。中共方面当时提出：“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方面当时也很积极，不仅公布了写得很好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而且其行动也令

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上说：国民党有两个伟大领袖，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蒋介石。

中共当年的建国目标无疑就是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讲得很明确：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38页）

诚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后来又日益复杂化了，以致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但上述事实仍然足以表明，早在民国时期，国人即已普遍认识到，建国的实质就在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权和现代文明社会，而不是只在形式上或名义上建立了新政权。中共领导人也深知这一切，认同这一切。他们遵循孙中山“造成真中华民国”的基本思路，也在积极地为创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而奋斗。

所以，中共在新政协期间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实际是有其相当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偶然的。中共开国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之实现，而不是对于中华民国的根本否定。他们非常清楚，新民主主义来自于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又来自于三民主义，而中共和民主党派当时也正是以此为蓝图再造中国的。他们都知道，孙中山曾经反复指出：民国是人民的，民国是共和国。所以，若将“中华民国”展开，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之，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缩写，那也正是“中华民国”。他们使用“简称中华民国”这个副国名表明，他们认同“中华民国”的“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建国原则，承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最早的新中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之再生，而不是新中国之初生。后来中共继续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实际也包含了这层意思。毋庸置疑，孙中山不是作为“旧中国的国父”受到尊重的，而是作为“新中国的国父”受到尊重的。

中共提议的“简称中华民国”后因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而被删除了。但现在看

来,在国名问题上,原本正确的恐怕是中共,而不是少数民主人士。至少从两岸关系看,有这个简称总比没有这个简称好得多。而且国名的连续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名称问题,更是背后的历史观问题以及形式建国与实质建国的大问题。

历史表明,创建新中国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社会发展过程。相对于清王朝来说,辛亥革命中创建的中华民国就是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但它又远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中国,它的新质要素还不那么多,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旧中国。相对于民国初年的落后状态来说,民国后来的社会进步也是创建新中国之继续,但民国时期的社会进步也很艰难,中国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旧中国,所以创建新中国的呼声和努力才又遍布到全中国。

那么,中国是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就突然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新中国了呢?那也不是。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再次申明:我们要“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随后通过的《共同纲领》又将其正式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按照这个奋斗目标和“新中国”的概念,1949年距离建成新中国显然还很遥远。所以中共当时很清醒:“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328页)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两大口号“民主化和工业化”,也反映了这种清醒认识。新中国不是只靠战争就能建立起来的,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必须依靠长期的和平建设才能建立起来的。而且这种和平建设也不能仅限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它还必须包括各种改革和制度建设,才能最终建成新中国。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际只是创建新中国的新起点,而不是通常所谓建国大业之完成。这是当年开国者的普遍共识,也应是今天的普遍共识。

## 二、从建国理想看成就与不足

那么,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新中国是不是已经建成了?我们是不是已无需再去梦想新中国、

不必再去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首先就应是当年的建国理想。只要这个理想是合理的,它就可以成为基本尺度。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想经历过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到抗战后期方才成熟。中共“七大”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956页)这实际也是全国民主派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而且是普世价值范畴的建国理想。所以,后来《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家奋斗目标与之大同小异,邓小平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也保留了它的核心内容。尽管后来的各种概括都有了某些变化,但无论是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完整性角度看,建国理想的经典表述都只能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不再可能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表述了。

抗战时期概括的这一崇高建国理想,理应予以实现。这是因为,第一,它是普世价值,而且近百年来也正是中国需要实现和能够逐步实现普世价值的历史时代。同时,作为普世价值范畴的建国理想,它也是使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主流的根本指南。第二,它概括了近百年来全国所有进步力量的基本共识,浓缩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目标。第三,它符合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也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之所在。第四,它是中共在战争年代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中国人民也为建立这种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千百万人人为之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曾经坦言:“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进而提出要“履行对人民的承诺”(1991年国庆前夕邓小平一次谈话要点)。第五,这一建国理想的基本内容已经写进了《共同纲领》,上升为国家意志,而且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共同纲领》无疑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任何对于它的根本否定都是不正当的和非法的,除非那是经过了真正民主的立宪程序或修宪程序的。第六,从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只要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那就一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所以说,从近代、现代到未来,中国的建国理

想、建国目标始终都应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就是创建新中国,直至最终建成新中国。而若倒行逆施,则就是破坏新中国,退往旧中国。

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建国理想和客观事实看,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我们现在也还是处于建国的半途中。

1.独立。我国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开始走向独立,1943年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1945年抗战胜利就是其最大的转折点。通常认为1949年中共建国时已经完全实现了国家独立,但开国领导人实际都知道,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治独立,但我们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而真正的最后的独立,就需要经济独立”(刘少奇语)。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再次重申:“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67页)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言独立问题之解决。

独立意味着独立自主,不受人欺负。但穷国国力弱,难免不受欺负。经济落后也使我国仍然缺乏必要的经济独立性。现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再把经济独立理解为万事不求人,当然是不妥当的。但在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仍然存在着是否受人欺负的问题,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独立问题。毋庸讳言,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至今仍然相当大。邓小平当年已经看出:我们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现在看来,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位于全球产业链中下端、缺乏独立自主的国际营销体系等等所导致的处处受制于人、处处被人欺负、处处多劳少得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其他诸如丧失大宗商品议价权等等吃大亏的事,也都是因为经济落后(其中也包括经济观念、经济制度等等之落后)而受人欺负之事。除历史和经济技术实力方面的原因外,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合理、思想文化的陈旧落后等等,实际也都是导致我国的政治、经济独立仍然严重不足、国家也仍然未能享有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尊严的深层原因。所以说,我国还必须经过较长期的改革和发展,才能真正发展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新国家。

2.自由。自由是最经典的革命理想,也是最

经典的建国理想。革命就是要获得解放,解放就是要获得自由。《论联合政府》曾有专节论述“人民的自由”,其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政府。”(《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971页)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曾经普遍地享有了自由解放的愉悦,“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的嘹亮歌声也随之响彻云霄。但后来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倒退,以至于连私生活领域的自由也被严重剥夺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走上了恢复和扩大公民自由权的发展道路,并已实现了重要进步。到目前为止,私生活领域的小自由已经基本实现,经济自由已经得到了大幅推进,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也大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尊重,中国公民确已享有了相当广泛的自由,这是改革开放后实现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进步。

但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不足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市场化改革只进行了一半,市场自由仍然很不充分。民营企业仍然严重缺乏市场准入、平等竞争等方面的经济自由。普罗大众仍然严重缺乏平等就业、争取权益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人民也仍然无权决定财政收支。所以,经济自由仍需通过大改革、大发展才能达到现代水平。在政治领域,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实现和保障尤为不足,距离实现这些“最重要的自由”依然很遥远,甚至在舆论上让“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都还没有实现,自由仍然是受气的“小媳妇”,很少被官员们所提起,实践中缺乏自由、侵犯自由、剥夺自由、过度控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这就表明,建立和建成“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毛泽东语,1938年),依然是我们的历史重任。

3.民主。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要“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并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民主国家。近现代以来,国人关于民主理想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如毛泽东就说过:“民主政治就是政府属于人民,不得为少数人所把持。如果我们遵循孙中山的政策,问题是很简单的。”(与根舍·斯坦因的谈话)刘少奇1951年也提出:“选举要很好的搞,这也是为建设作准备,

没有人民民主不好搞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选举就是整风、批评,这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曾为国家民主化奠定了良好的宪法基础,实践中也出现了走向民主化的新气象。但后来出现了大倒退,甚至出现了“封建法西斯专政”(邓小平语)。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所以我国“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所以“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144页)。建国30年后仍然是“民主太少”,也才开始要“认真建立民主制度”,可见问题之严重。时至今日,我国的民主仍然是形式远大于实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以至于官场腐败、司法腐败、分配不公等等都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受到了根本威胁。这就表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民主化的启动阶段,切实实现民主理想依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4.统一。统一与自由、民主密切相联。《论联合政府》指出:“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统一呢?”“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这就是作为建国理想的“民主统一”的本来内涵。

按此标准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困扰中国的领土统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又仍未完全解决,最突出的就是两岸统一问题。大陆内部的问题至少有四个。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分治。二是地方主义严重,“土皇帝”比比皆是,统一市场、统一法律等等也都随之成为牺牲品。三是缺乏迁徙和居住自由、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更广泛的公共福利均等化,国民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地域化而不是国民化,同时蒙受制度化的地域歧视。四是缺乏作为民主统一要素的地方自治。这些实际都是“封建残余”的现代变种和延续,也都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大障碍。这就

表明,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全统一的新中国,也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建国任务。

5.富强。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当然就应当繁荣富强。所以,从立宪派到共产党,无不追求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新中国的特征,而是旧中国的特征。按此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前,虽然经济建设已有相当成就,但中国仍然是太穷了,甚至比一些非洲国家还要穷,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8页),也就是经济上仍然未能获得解放,并未变成富强的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普遍得到较大改善,国家经济面貌日新月异,中国确实是越来越像新中国了。百年建国史,这一阶段成绩最卓著。但现在距离真正建成富强的新中国仍有很大的差距,建立富强的新中国也依然是我们的一项繁重的建国任务。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1949年都只是中国百年建国史的新起点,而不是建国大业之完成。历史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我国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发展成为新中国,百年建国梦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另一方面,我国又在相当的程度上没有发展成为新中国,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旧时代的落后现象,百年建国梦仍未得到最终实现。这种两重性告诉我们,我国现在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既是新中国,又是旧中国。我国仍然处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百年过渡期之中。但我们又已达到了这一过渡期的较高阶段,以至于如果顺利的话,再有三四十年时间,我们就能迎来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了!然而,新中国又是不会按照“历史必然性”自然到来的。一切历史规律归根到底都是人的活动规律。没有梦想,就没有奋斗。没有奋斗,就没有美好的未来。新中国仍然是我们的梦。我们的崇高建国理想也仍然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已经为了新中国而英勇牺牲了,无数先辈也已为了新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理应继承先辈的遗愿,继续为未来的新中国而奋斗。■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 关于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的重要修正

○ 高 锴



1982年11月4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草案，彭真主持会议。

世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迄今，中共党员人数已超过8000万人，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中，中共党员都占有很大比例，担任重要职务。按照中共党章，党员必须执行组织决定，因此，只要中共领导一声号令，全党坚决响应，全国也就会随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在事实上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1982年宪法序言中多处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笔者认为，这是对宪法的误读。

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讲述立法经过、历史背景、立法宗旨等，但它不是宪

法正文，而是宪法的前言，是解释和说明宪法，引导人们去正确理解宪法，以利于宪法的维护和施行。宪法序言提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它不是宪法本文。

序言中有三处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都是用的叙述性语言，讲述历史事实和展望未来，并不是法律规定。

1982年宪法的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章《国

旗、国徽、首都》，共138条，全都用的是规范性法律语言，这才是法律规定。但是，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任何条款中都没有出现“共产党”一词，也自然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了。

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不在宪法正文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回忆一下1975年宪法，这部宪法是“文革”后期，左倾路线猖獗时制定的。它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否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宣扬以党代政、以党治国。这部宪法总共只有30条，在它的第2条、第13条、第15条和第16条中，都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甚至在第26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首先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更有甚者，在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这个宪法的“草案”时，原文写的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只因为过后不久，林彪“折戟沉沙”，草案的这些提法沦为历史笑柄，才在制订1975年宪法时把“拥护”毛主席和林彪的半句删掉了。

“文革”结束以后，在华国锋主持下，制定过一部1978年宪法。由于存在着“凡是”思想的影响，这部宪法的法律条文中仍多处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词句，仍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82年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理“文革”错误，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制定本法前不久，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中共党史上划时代的决定，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还明白提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当年主持新党章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在1982年9月13日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说：“党是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力量，但它并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党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党在国家之内，党在人民之中，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摆正了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摆正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应运而生。

1982年宪法制定前两年，全国人大就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吸收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经过多次认真讨论，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这个“草案”并组织全民讨论，征求各方面意见，集中群众智慧。同时，起草者也很重视外国的立法经验，关于宪法中写不写“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参照了外国的经验制定的。

当时，笔者所在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曾根据领导指示查阅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发现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专制国家以外，没有哪个号称“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由某党或某位大人物领导的。

“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国家由人民做主，由人民共同管理，否则就不配叫“人民共和”。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却又规定公民必须服从某党或某位大人物领导，这还能叫民主吗？这是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颠倒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执政党，任何执政党都要推行自己的施政方针，动员人民一道来实现党的政治理想。但是，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执政党，这只能由人民自愿抉择，而不能由法律来规定。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不是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可以选你，也可以不选你；以前拥护你的，以后也可能不拥护你，拥护不拥护全在于人民群众的自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要研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任务，要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做对群众的说服工作，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决定权在人民手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用法律来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

中国共产党曾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巨大的威信，党的领



1982年，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代表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

领导人毛泽东曾经被亿万群众拥戴为“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但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政党和领袖是不存在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饿死,“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亿万家庭,这些都是当时的领导者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如果有一个政治机制,能够抵制这种错误就好了。

“文革”后,笔者有幸参加全国人大的许多会议,直接看到、听到主持人大工作的彭真、习仲勋、杨尚昆、彭冲等中央领导同志苦心思虑,讨论总结经验教训,防止“文革”这类错误重演。他们无数次告诫大家,一定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也就是说,要坚持反对“人治”,反对“以党治国”。

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上,修改制订1982年宪法时,断然删除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正文中所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词语,删除了“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也删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个人的名字,无论这些人物多么伟大,宪法遵从的是“人民至上”的原则,拒绝把政党和个人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

新宪法的条文中删除了“共产党”一词,却出现了“各政党”一词。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人数百倍于八个民主党派的总人数,对国家的贡献更不知大多少倍。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宪法中也被列入“各政党”之内,这体现了各政党无论大小,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经过这些修改,我国宪法焕然一新。依照法律,新的宪法一旦通过,旧的宪法即行废除。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当天就公布施行。旧的宪法早已不具任何法律效力,但奇怪的是,有些人迄今仍在沿用1975年宪法中的某些错误语言,这是否是极“左”思潮“阴魂不散”呢?

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党的经验时说过:“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这是我党新一代领导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和1982年制订现行宪法时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方

针,依靠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依靠艰苦奋斗的作风,依靠不断改革,与时俱进,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而不应企图用法律条文把党的领导固定下来。

邓小平同志从来反对“以党治国”,他在1941年就写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布到我们党内来”。现时,有人仍坚持主张用宪法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用法律来要求人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正是“以党治国”观念的翻版。

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是,有了好的宪法不等于就有了宪政。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一道,共同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他还说:要“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要“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权利”。他在多处讲,要“真正的”、“真实的”,是否为提醒大家要防止某些人可能用“虚假的”和“伪装的”手法,在明里暗里抵制和侵犯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呢?■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 3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苏俄对华政策与中共建党

○ 夏白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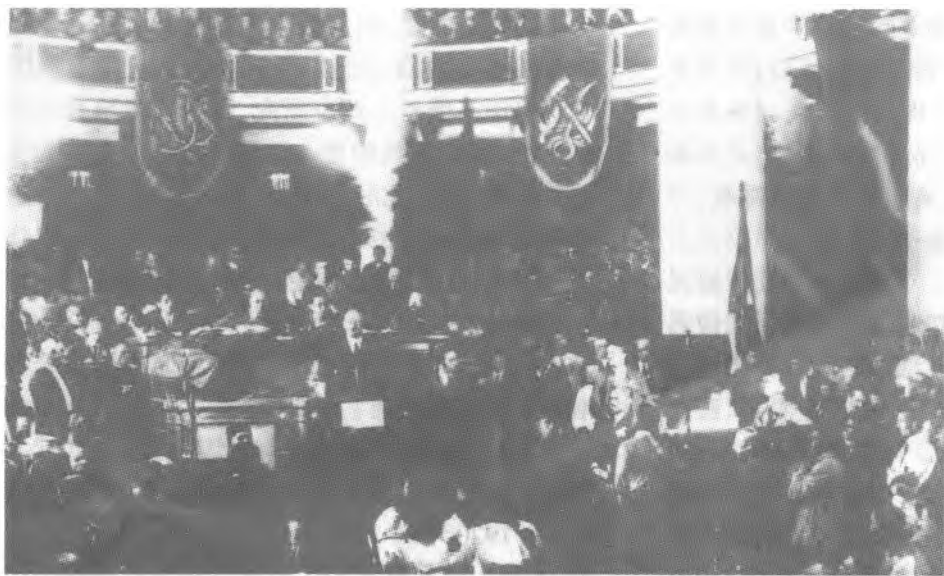
在中国共产党如何成立的问题上,有三个问题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一是在列宁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中,中国的具体位置和价值;一是俄国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1919年制定的远东总政策及对华政策;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最初推手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是导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直接原因。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忽视,笔者以为,除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是因为学界在研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时,偏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而对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关注不够;偏重于苏俄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而对作为主权国家的苏俄的远东利益关注不够;偏重于对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也有人译作维金斯基,其中文名字是吴廷康,为区分维连斯基,以下称其中文名字)的研究,而对他的领导者维连斯基关注不够。

## 一、苏俄的世界革命战略与中国的具体位置和价值

“一战”后,俄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种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国家制度——苏维埃政权。这一新型的国家制度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建国的灵魂。而马克思主义恰恰又不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建立全球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精髓同样体现在苏俄第一部宪法中,并以刻印在国徽上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苏俄宪法第169条)

这就是说,在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是一个突破任何国家界限的运动,这就使苏俄共产主义者们不仅有了一块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任意耕作的试验田,而且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和意志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将他们的试验产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他们控制的地域之外。

俄罗斯苏维埃联盟共和国成立之后,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组建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与任务十分明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发起建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图为列宁在1920年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系统地提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号召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把那里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

确,就是世界革命。

“人类的全部文化已经荒废,人类本身则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挽救它,那就是无产阶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二卷,以下简称第二卷,第57页)

这是在3月4日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共产国际为世人描绘的图景。为了拯救人类的灾难,3月6号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了号召: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兽行、反对帝制、反对特权等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各种各样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第二卷,第74页)

对于落后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第二卷,第114~115页)

列宁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勾勒的前景是,通过联邦制这一过渡形式使各民族劳动者走向统一,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产生新的联邦国家。在列宁看来,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幌子。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出路。(第二卷,第112~118页)不言而喻,这个新联邦国家的核心只能是莫斯科。列宁当时急于要做到的是,把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几个先进国家能够对全世界政治起决定影响的国际专政。这就要求:

“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第二卷,第116~117页)

在列宁的提纲中,中国—朝鲜—日本被排列在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显然不可能与苏俄结盟,朝鲜太小,起的作用也不大,结果,列宁的目光盯上了贫弱的中国。维连斯基在考察中国之后写给列宁的绝密信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一卷,以下简称第一卷,第76页。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但维连斯基的着眼点在孙中山。)中国最终也确实为了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而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并与苏俄结盟,只不过不是在列宁时代,而是在斯大林时代。

在苏俄寻找远东结盟对象初始,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恰好为苏俄提供了机会。苏俄派出大量人员在中国寻找可依附于己的政治力量,而且列宁亲自过问。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吴佩孚的直隶政府、冯玉祥的军队都是苏俄专心调查研究、积极拉拢培育的对象。1922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组成以斯大林为首的工作委员会,此后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均由斯大林签发,后来又专门组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中国的一切军政工作和经费的发放统一于中国委员会。(第一卷,第72、623页)俄共中央明确要求充分利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了培植受控于己的军事力量,苏俄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现实存在的一切武装加以观察研究,包括土匪武装,以求策动叛变、收编。在1920年到1925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大量记录着军事援助中国某一派政治势力的内容,甚至出现倘若中国政府不中立,就采取措施让它分裂和瘫痪的指令。(第一卷,第637页)

这就让人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既然中国是

被列宁划分为应该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才能得救的落后国家,那么中国所应走的道路就不是国家政治上独立的道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实行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政策,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必须首先服从于苏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中心。为了列宁世界革命总战略这个大局,同时也是为了苏俄的远东利益,中国应该、也必须有能力和决心承担民族牺牲。

## 二、俄共中央政治局的远东总政策及对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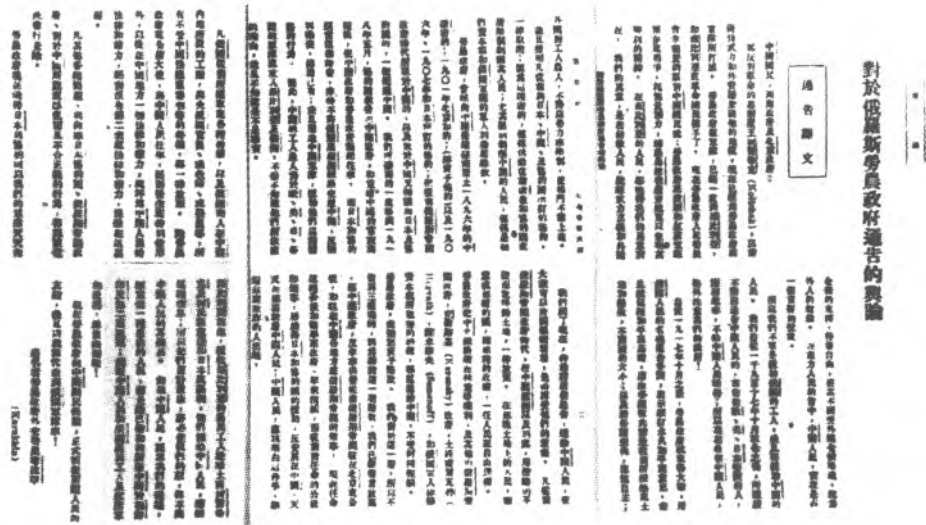
为了确保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苏俄的远东安全变得尤为重要起来。十月革命之后,苏俄以剿灭“白匪”之名出兵占据了蒙古北部,从此有了“内蒙”和“外蒙”之分。之后,苏俄红军又很快进驻新疆,以防日本从中国东北向西扩展。到了1919年,苏俄把目光盯在了中国的满洲。

1919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派维连斯基·西比亚科夫以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1919年8月维连斯基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政治局的赞同,成为政治局给他下达的“在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的指示的基础”。政治局指示的要点是:

“1. 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的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

2. 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

3. 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



1920年3月间,苏俄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传到中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迅速传开。图为《新青年》第7卷第6号刊登的“对华宣言”译文。

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

4. 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第一卷,第38~39页。目前尚未见该提纲原件、俄共中央的决定和维连斯基给政治局的报告)

虽然这一总政策的具体内容至今尚未完全被披露出来,但从要点的排列次序可以推断,俄共中央政治局指示的第一点远东总政策决定、制约了其他三点。换句话说,所谓共产国际也好,世界革命也罢,首先是为苏俄的远东利益服务的。东亚人民的自觉行动、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是围绕加剧日、美、中三国冲突而展开的。革命组织,特别是游击组织在其间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也就构成了苏俄对华的基本政策。

为了使远东总政策得以顺利展开,苏俄还试图以全新的姿态公开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示好。同年7月,苏俄发表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称“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同时提请中国人民注意“十月革命”后工农政府所做声明,包括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密约,放弃沙俄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拒绝接受“庚子赔款”,放弃在中国的特权等。(第二卷,第79~81页)第二年9月再次发表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宣布遵守前次宣言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要求缔结中俄友好协定。(第二

卷,第91~93页)这两次宣言不仅引起了中国国内的极大好感,甚至蒙蔽了苏俄派往中国的谈判代表越飞,以至于在1922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斯大林代表政治局对派往中国谈判的代表越飞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因为越飞竟然天真地以为,苏维埃俄国于1919年和1920年发布的对华宣言可作为与中国谈判的根据: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第一卷,第115页)

为此越飞在给列宁、斯大林等领导的信中表示了极大的不解:

“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的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是我们全面破灭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第一卷,第115页注①)

实际上,这两项宣言确实就是一纸空文。1923年,托洛茨基在一封给越飞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既然中东铁路是我们在中国领土上的国家财产,无疑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既然转交给中国,它也是巨大的经济文化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农民必须靠俄国农民来拥有铁路。……俄国也很贫穷,根本没有能力来资助它周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第一卷,第200~201页)

到了1924年,苏俄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共管中东铁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境内传播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俄方并未遵守该协议。中东铁路管理权仍操在俄籍总经理手中。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及奉军在张作霖的指示下突然搜查了苏俄驻华大使馆,并将搜到的苏俄文件影印后分送新闻界和各国驻华使领馆。文件揭示了大批苏俄专家以工程师和铁路技工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赤化”中国的活动。半个月之后,4月21日,由斯大林主持召开苏俄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其中决议之一是询问北满委员会是否已将中东铁路俄国党组织文件销毁,并要求避免出现任何可能提供任何借口的行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6号(特字第74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1929年6月,继承张作霖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对共产国际在哈尔滨举行的秘密地区会议进行了突然袭击,这次会议及缴获的文件再次证实苏俄利用中东铁路进行“赤化”中国的阴谋活动。于是,张学良于7月10日派兵占领了中东铁路局,解散了苏俄铁路工会,逮捕了大批人员。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苏俄宣布与中国断交。接着爆发中苏之战,其规模远比后来“文革”期间的“珍宝岛之战”大得多。在满洲里,中国军队付出了丧生八千将士的惨重代价;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俄的飞机大炮夷为平地;位于松花江口的拉哈苏苏城也被苏俄的飞机炸成一片焦土。战争持续了约半年,蒋介石无力派兵支援,张学良被迫停战,中东铁路管理权再次归于苏俄。(时在哈尔滨采访的美国《米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对此做了采访报道。见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164~175页)“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日内瓦讨论满洲问题。当时有中、美、苏通过结盟方式对付日本的提议,苏俄代表提出的条件是,中国应该承认苏俄对外蒙古的主权,并将中东铁路以北的中国领土割让给苏俄。(前引《鲍威尔对华回忆录》,190~193页)

事实上,从苏俄建国初始到后来的历史都足以说明,苏俄的对华政策从来没有遵循过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而是延续沙俄的扩张政策。可以说,这一总政策使苏俄获得了最大的效果,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指着地图说:

“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长春铁路(日本占领东北期间称中东铁路支线为南满铁路,二战后两路合并成长春铁路,又称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转引自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3页)

苏俄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国家利益,除前述原因外,同它在执行远东总政策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日、美、中三国冲突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对三国冲突展开论

述。但中日和美日冲突的加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已被屡屡验证，而中美冲突的加剧则主要是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虽然远东区域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苏俄远东总政策确实起到了加剧这种冲突的催化作用。

### 三、维连斯基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前已提到，维连斯基在其报告中披露了苏俄中央政治局远东总政策的要点。虽然目前公开的档案资料只见于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但正是这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为我们揭开了笼罩于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上的神秘面纱。

维连斯基利用“使者地位”在完成特殊使命的同时，坚持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第一卷，第39页）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点，首先在共产国际内组建、完善组织机构，制定具体政策。根据维连斯基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5月，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连斯基担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日本科。中国科的纲要之一就是“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全部活动都通过积极活动的书记处和上述三科进行”，“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第一卷，第39~41页）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最早的远东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人是维连斯基。开展共产主义工作、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他落实远东总政策的主要工作之一。

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之后，1920年7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了苏俄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维连斯基专程来到中国，主持了这次大会。会上，俄国人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中国的局势。这显然也是根据政治局下达给维连斯基



维连斯基(1893~1953),俄国人,在中国化名吴廷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具体执行远东总政策的指示而安排的。大会的议题之一就是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卷，第41页）

至此，我们已基本看出了一个轮廓：为了落实苏俄的远东总政策，由苏俄远东全权代表在中国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东亚书记处的具体操作下，组建中国共产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接下来的历史已为人们所熟知。随着另外一位人物的登场，前述轮廓变成了清晰的图景。这位人物就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回忆中提到的吴廷康。中共早期党员之所以对他印象深

刻，是因为直接与他打过交道。从档案资料中未发现维连斯基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与中共早期党员打交道的记录。这也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注重吴廷康而忽略维连斯基的原因之一。同样被忽略的，是维连斯基与吴廷康的组织关系。

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的外国处向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吴廷康和两位助手。（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席团副主席布龙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第一卷，第49~57页）吴廷康在当年6月写给“某人”的第二封汇报信中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主要工作是把各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这个“某人”是谁，现有档案资料未做明确交代，仅有推测。（第一卷，第28页，这封信是给他的直接领导的回信，该档案中没有他的第一封信和他的领导的信）但从时间、空间与吴廷康的工作内容看，笔者推断，此人应该是维连斯基。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一封向维连斯基请示汇报的信。维连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内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吴廷康的汇报中得到的。也就是说，维连斯基遥控指挥，吴廷康具体操作。理由有三：

1. 从工作关系上看，维连斯基是俄共中央派

驻远东的全权代表,吴廷康是俄共远东局派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都在为远东事务工作。组建东亚书记处之后,维连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称,是受“留在远东工作的同事们的委托”送上报告。(第一卷,第36页)吴廷康则是留在中国工作的负责人。

2. 从空间上看,吴廷康来自于海参崴。在吴廷康去中国前,为执行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20年2月维连斯基也到了海参崴。(第一卷,第39页)

3. 从时间上看,维连斯基2月到了海参崴,吴廷康4月从海参崴去了中国,目的地是上海,5月上海即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而作为执行主席的维连斯基当时并不在中国。6月,吴廷康向他的领导发出了第二封汇报信,汇报了他到6月为止在中国的工作情况。7月维连斯基即亲赴中国,主持召开了苏俄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维连斯基显然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了莫斯科。8月向政治局提交了“提纲”,9月1日就东亚工作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报告,总结汇报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与此同时,新的工作阶段开始了。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对华的领导机构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维连斯基回国之后,吴廷康还在中国,他于8月17日发出的报告已经不再是给维连斯基的了,而是报给了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第一卷,第31~35、49~57页)他在这份报告中称,在上海成立了吴廷康和四个中国革命者组成的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显然革命局实际上是继续了原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不过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工更加细化明确,机构也增多了。除上海外,另由两位俄国人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在北京组建了北京局。该科还计划召开上海和北京的联合代表会议,并在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建立革命局。

在吴廷康的这份报告中,特别提到他在天津的一个接头地点,这个地点是为了组织党的工作人员登记而专设的。(第一卷,第35页)

从中国人的回忆中大概可以知道,吴廷康到达中国后,通过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找到了在北大

俄文系任教的柏伟烈,又通过柏伟烈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再通过李大钊认识了更多的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吴廷康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吴廷康是位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他在来中国之前肯定对中国的情况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所登载的文章及其作者有所了解。因此不妨推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均是他主动寻找的对象,而不是中国人主动找到了他。

来自不同的回忆,在吴廷康的具体组织操作下,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分别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0月,苏俄阿穆尔州委的东方支部书记费奥多罗夫已经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给俄共阿穆尔州写了一个报告。(第一卷,第44~46页)11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但未对外发布,而只是作为接受党员标准的文件。

到了1921年5月,中国已有7个省级的党组织,设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在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要求,通过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建立常驻书记处的方式以增强同远东书记处的组织联系。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在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兹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1922年中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共产国际所议决的加入条件,并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称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作者为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 胡治安

“交叉党员”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党，而八个民主党派，叫做参政党、友党。而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党员，人们称这“两栖”党员为“交叉党员”。

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一些民主党派成立时，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一些党员就参与其领导工作或成为其骨干。如民革中央的王昆仑、民盟的胡愈之、民进的周建人等，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在1949年后，纷纷要求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离开民主党派，做自己想做的事，但都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拒绝。另外，共产党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多民主人士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老一代民主人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党并肩战斗，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很多人把入党当作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有人为了寻求保险，躲避风浪而要求入党。

## 两次入党高峰

民主人士及著名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后，有两次高峰：一次是1957年前后；一次是文革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一次高峰的背景，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理论上认为阶级关系变化、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入党；二是反右斗争的教训，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不管地位多高，必须有政治保护色。“共产党员”就是最好的保护色。三是共产党要积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尽量吸收大知识分子进入党内。1957年化学家侯德榜、唐敖庆就入党了。侯德榜既是著名化学家，又是民族资本家代表——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

总经理。他的入党影响意义很大，他还出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随后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物理学家钱学森、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也几乎同时宣布入党。为配合“大跃进”的场面，把已有几十年党龄的秘密党员郭沫若、翦伯赞也公开党籍，各报热热闹闹地宣传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入党”了。共产党内有了一批大知识分子。这岂不是以事实批驳罗隆基说的“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理论吗？

## 周恩来的劝阻

1960年11月5日，周恩来约请党外部长座谈。当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讲到有李四光、李德全、侯德榜、陈其璠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七八位写了申请书时，周恩来说：“都入党了还行？！那我们今天就变成开党代会了”。后来他提出，都入党了，还有什么多党合作？要劝说老一代民主人士留在党外，说是“都入党了，没有意思”。他对史良说，党内有邓大姐、蔡大姐（指蔡畅），再多你一个史大姐，作用也一样；而党外有你一个史大姐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周恩来极力劝史良做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并在接见苏联代表团时向苏联同志隆重介绍：这是我们的非党布尔什维克！1958年，茅以升、严济慈都想入党，被周恩来劝止。

文革之后，又出现了民主人士入党高峰。1983年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县、市政府领导的人，到1985、1986年大约有70%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高峰的背景是，文革中的“臭老九”要平反恢复名誉，有关部门提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坚持以共产党的事业为理想，还有不少人从切身经历中看到共产党的错误，不愿当局外人，决心参加共产

党改造共产党。当时，高层民主人士及著名知识分子“入党做官”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共产党，成了“交叉党员”。这种交叉党员一度在民主党派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交叉党员在政协、人大的议席中都统计在民主党派内。八届政协时 2012 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交叉党员 220 名，这在实际上就改变了文件规定的党内外比例，引起民主党派某些领导人的不满。更麻烦的是，双重身份，两种作用。以“执政党”党员的身份，对待民主党派，颐指气使，个人专权；又以民主党派“党魁”的身份，对付共产党，追求“在野党”领袖的名利地位。有位“党魁”就曾发动自己党员写信，推荐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当然是极个别人。有些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已成为民主党派的真正代表，被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认同的人，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他们既忠诚于共产党的信仰，又热心民主党派工作。但不管怎样，这种双重身份者的活动，既不利于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又有损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形象，甚至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 胡耀邦的办法

胡耀邦主持党务时，曾采取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公开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中共党员名单，并宣布以后不再在民主党派中发展秘密党员；二是限制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措施得到民主党派的普遍拥护，认为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一着好棋，但在棋局上，并不顺当。2005 年 10 月，荣毅仁逝世的当晚，中央统战部一位局长打电话问我：荣毅仁是不是党员？我说不很清楚，但从种种迹象看，他应该是。又问：是否给予公开？我认为不宜公开。第一、中共中央已宣布不再发展秘密党员，为什么说话不算数？第二、1993 年他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时，对外说他是党外人士，岂不是“欺世盗名”吗？他说，公开他的身份，不表明共产党的伟大吗？我说共产党将大资本家也改造成了党员，那应在吸收他为党员时宣传，现在宣传，必然得出“欺世盗名”的结论；第三、影响对现任党外高官的形象，人们会猜想，他们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从

政治上考虑，荣毅仁的党籍不公开为好。第二天，报上登出“共产主义战士”荣毅仁，在生平中讲明，他 198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至今认为公开荣毅仁党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一着臭棋。

## 难以阻挡

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为了完善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这一根本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劝说一些民主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组织的各级领导人，不要参加共产党。为了贯彻中央决定，我曾连续参与起草了两个《意见》，以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文件下发，但还是挡不住一些老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彭迪先还曾为入党的事找过杨尚昆，向他的这位老乡哭诉说，留在党外，我能理解，但家里人不理解，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不然怎么入不了党？并说你不入党，再来运动，有你好果子吃！杨尚昆也来电话，让彭迪先入党吧。没有办法，就入吧。

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1981 年 4 月在弥留之际再次申请入党。为准备陈的后事，也为他的入党，我特意拜访了梁漱溟。那天梁老心情很好，开口就说，找我了解陈此生，你算找对人了。陈此生是民革中央副主席，他原与民革没有历史渊源，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他是我的朋友、大学教授，也是我们民主政团同盟的中央委员。他因我的关系与李济深认识，而参与民革的组建。解放后，他在广西当文教厅长、副省长，李济深当民革中央主席，没有自己的人（即没有桂系的人），我向他推荐陈此生，这样他到北京，成了民革中央负责人，先当副秘书长。此人为人正派、公道，不计私利，古道热肠，同共产党真诚无二，是难得的好人。陈此生在这年 1 月抱病写了入党申请书。遵照领导指示，我于 4 月 23 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出《关于陈此生同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示报告》，获准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到医院通知陈此生，奇迹出现了，年已 80 岁又多年卧病、已下病危通知的陈此生，兴奋起来，居然多活了半年。

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裴昌

会，他是当年攻占延安的军长。1947年3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本日10时半国军克复延安城，十一年来共匪祸国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铲除于一旦，为国为党雪耻复仇之愿已偿其半也。”然而这位为蒋先生雪耻复仇、攻占延安的裴昌会将军，也于198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汤元炳，也在1997年逝世前加入了中共。汤元炳在1927年前，曾经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1949年后，曾任浙江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当他生命之火将熄灭时申请入党，浙江省委电话请示，部里领导要我办理。第二日晚上，部里领导来电话，说汤元炳参加过军统，入党的事谨慎些。我问谁说的？他说民建中央的人反映。我告诉他，汤元炳抗日时期参加“东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这个所是军统开办的，专为收集日本经济情报，汤早年留学日本从事经济研究，他本人并没有参加军统组织，这些历史，他在50年代已做了清楚的说明，不应该认为有问题，批准入党可以不变，领导听从了。

1990年3月，陆定一写信平杰三询问农学家、被誉为现代茶圣的吴觉农的入党问题。当时吴刚刚谢世，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经过细心解释，在正常情况下，不宜搞追认，家属接受了统战部意见。3月28日，平杰三带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陆定一，向他汇报吴觉农申请入党的处理情况，陆一口无锡话，我一口湖南话，彼此谈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但他听清了“不搞追认”、“家属同意”。我听懂了，只要家属没有意见就行了。在这次谈话中，听平杰三与陆定一的对话，都认为把民主人士都搞到党内来，就没有统战工作了，没有意义了，并说现在孙起孟（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30年代的中共党员）、周培源（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党员，都以党外人士面目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外面看成笑话。

1988年6月9日，收到邓颖超办公室电话指示，要解决董竹君的党籍问题，说董竹君大姐自1930年开始与我党发生联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在另一条战线上忠心实意，支持党员干部、党的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营救了不同同志，解放前夕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上海青

年，是很难得的党外朋友，非党的革命者，老了应该给她解决党籍问题。

的确，董竹君与原四川副都督夏之时离婚后，带着父母和四个子女回到上海，在革命低潮的1930年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当时组织上考虑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入党后要服从调动，家庭怎么办？还是办企业，做生意，解决经济问题，有了钱支持革命！自那时开始，她虽然没有入党，但一直与共产党革命事业站在一起。为了解决董的党籍问题，我随即到王府井金鱼胡同拜访董先生。对董竹君，党内外不少负责人尊称她为先生。时年88岁的董竹君，风韵犹存，正在写回忆录。从她那热情的招待和不凡的谈吐中，可见她年轻时的交际水平，可想象她在复杂环境下应付各种场面、掩护革命志士的超凡手段。当时她身患癌症，但每天还坚持写作，她说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完成《我的一个世纪》的自传，并说将来一定送你一本。果真，就在1996年12月，董先生住院期间由她的子女联名赠送了她自撰的《我的一个世纪》。董则于1997年12月6日辞世。在那次拜访中，她本人没有谈到入党的问题，听起来她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进步事业，为朋友做些好事，很愉快，心安理得，并无刻意追求入党。谈得更多的是她与上海锦江饭店的纠纷，因为我参与了处理工作。我说到邓大姐很关心您，也未引起老人接过话题，提出入党。当时认为我层次低，她要与上层领导谈。后来，我拜读了老人为一位友人写的挽联，领悟了真意：“唯大学问功高心愈下，是真淡泊身没志益明”。董先生是“大学问”、“真淡泊”之士。

在这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著名民主人士有许德珩（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罗庚（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严济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庄希泉、陶峙岳、茅以升，及原宋子文的秘书、全国政协常委郭增恺，等等。有的民主人士生前留下遗言，要求在身后追认为共产党员，如民革中央副主席甘祠森，1981年逝世后，追认为中共党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仑的妹夫吴茂荪，也是在临终时追认的。这类追认多了，在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一次与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的负责同志商定，在控制民

主党派负责人入党的同时,对一般情况下,正常逝世的党外人士,不要追认为中共党员。

## 朱学范、侯镜如留在党外了

1996年1月7日,91岁的朱学范病逝,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第一次是1月12日,我们到朱家征求《生平》稿意见时,由朱培康提出。我想保留朱学范彻底的党外人士的形象和身份,对民革、对中共都有好处,对其家属毫无不利影响。第二天,我陪着统战部秘书长到朱学范家,再次听取家属意见,朱学范的五个儿子,有四位到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高级干部,唯有外孙是“党外人士”,女儿也来了。我们说明来意,关于追认朱老为中共党员的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朱老以什么身份留在当今社会和未来历史上更合适?对党、对民革、对本人更有利?朱培根(长子)首先发言,希望实现朱老遗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二儿媳言辞激烈:朱老投奔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到头来党都入不了?在台湾、国外的朋友将会笑话他!共产党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入党,是为共产党争光。外孙更是边哭边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公公应追认为党员,他与史良那些人不同,他是工人出身,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不让一个工人出身、跟共产党奋斗一辈子的人入党?将他拒之门外!他们都说得有理,作为亲属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说,这里不存在拒之门外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问题。朱老一辈子是党外民主人士,为什么身后再由共产党收编过来,外界人看问题,同我们看问题有差别,始终保留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对共产党、对民革都有好处。最后家属们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不追认朱学范为中共党员,同意为其遗体覆盖国旗。并由此之后,形成一个规定,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以上两个职务退下的党外同志,逝世后遗体均可覆盖国旗。

现在想来,这样处理朱学范要求入党的问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伤害感情的一面。如果宣布他为中共党员,1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就不可能有蒋纬国送的花圈,对外观感上应予肯

定。但对家属的感情,必有所伤害。因为朱学范到底是个历史复杂的人物,他由一个邮务员上升到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曾七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他要站立、要活动,必须同各路“神仙”交往。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他不能迈过;国民党的工会头目陆京士也是盟友。“文革”中,抓住历史上的小辫子,诬为“反革命”,在秦城监狱折磨七年,出来之后,他也没有提出“平反昭雪”。这些都是他亲人和家属心中的阴影,如果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把过去的一切,打包丢入历史的垃圾堆了。没有入党,思想上总有种不信任感。

我作为事务的处理者,绝无历史成见,对朱极其尊重。我认识他是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在礼堂大堂迎候来宾,见来了一位身材不很高,但壮实健步的老人,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我的老处长李世桐大姐轻轻告诉我:“这是朱学范。”70多岁的朱,几步上前与我们热情握手,还拉着我的手说:“没见过,新来的?”“来不久,请关照。”他对统战部很多人叫不出名,但面孔是熟的。会后处长对我说:“看到没有?今天朱学范特别高兴,对每个人都亲热问候、握手。”我说了句很不礼貌的话:“老江湖呗!”处长说,不,他升了,要当副委员长了。啊,原来是高兴。以后注意查看有关历史资料,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朱学范是工人出身的民主战士!在旧社会中刚柔交错,智勇奋斗,探寻真理,追求光明,是中国杰出的工会活动家,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解放后,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是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文革中遭受七年牢狱之灾,居然不发一句怨言;在参政议政中还能发表不同意见。1986年增补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时,他对中央统战部提名的两位民革成员,因不了解底细,而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习仲勋责令统战部向他说明解释。其中一人黄启汉,在民革内部多有非议。但此翁是桂系老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抗日时期与中共有联系。1949年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时,黄是和谈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南京代表团的电台密码交给叶剑英,中共及时、准确掌握南京方面的动向。对共产党,他是有功

的,当了几十年政协委员,提升一下,情有可原。这些情况,向朱学范交了底,他也高兴地接受。1992年朱学范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让位给年轻的李沛瑶。

他外孙说得有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他这样一辈子搞工会运动,跟着共产党几十年,甘苦共尝,最终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遗体覆盖党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些早年参加而后脱离了共产党的人,解放后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的地位,想“归队”,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因为脱党时间太长,按照党章规定,恢复是很困难的。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沈雁冰。沈在逝世前曾申请重新入党,中央统战部批准其入党申请。而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统战部索要沈的档案,我亲自将档案送到组织部。第二天早晨听到广播,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沈雁冰1921年的中共党籍,这是胡耀邦办的。了解沈雁冰历史的李一氓,对此很有意见,他说,可以接受茅盾重新入党,但绝不该恢复他的党籍。

另外一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文革后,当许多人要求入党时,他提出恢复其1925年的中共党籍。但中央统战部坚持脱离关系时间太久,请他重新提出申请报中央。他则坚持要恢复,不肯重新申请。记得一次在鸿宾楼的饭桌上,当着不少人的面,他再次讲,我的组织问题,希望解决!当场回答,您重新入党,组织上是欢迎的。直到侯镜如逝世,也没有恢复中共党籍。

其实侯镜如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东征时由周恩来和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因党员身份未暴露,奉组织决定,潜伏在第一军,北伐到福州时,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接党组织命令,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请长假,去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伤后,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随后派任贺龙二十军教导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中再负重伤。1927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在去中共河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以嫌疑犯监禁14个月。1929年9月去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工作。1931年奉派到上海时,因顾顺章

叛变,找不到组织,曾用组织规定的侯治国的名字登报联络,略称“胞兄,我找不到你,如果你再不来,我没有办法,自去找工作了,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登报也没有联系上。因生活所迫,离开上海,回河南老家,经小同乡孙殿英的推荐,进入国民党军界,由师政训处长逐步提升,直到九十二军军长。

1948年任第七兵团司令的侯镜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曾想用他监视北平傅作义的行动。天津解放后,又令其“立即南撤”。在此同时,侯的外甥、共产党员李介人送来安子文的信,安与侯曾是狱友,彼此熟知身份。信中大意是:“周、贺二公关怀你,欢迎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去是可以原谅的。”周是周恩来,贺是贺龙,都是侯在共产党内的老上级,他得知党组织对其宽大,又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从而下定决心,一方面与李介人保持联系,通畅中共的关系,一方面调动人事,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待机起义。但阴差阳错,频繁调动失去率部起义机会,他指示部下的一个师起义。

在他任津沽防守司令时,聂荣臻曾派李介人到塘沽与之联系,侯将平津蒋军布防地图交李看,并说明华北蒋军布防形势、兵力部署和对攻打平津的建议,要李向聂、罗报告。

1949年5月到香港,从事策反蒋军部队起义的活动,曾经过孙连仲的关系,成功策动四川鲁崇义三十军的起义,曾派十七兵团军法处长孙吉甫去海南,策动三十二军军长赵琳、师长李鸿慈起义未成,赵、李均被台湾方面扣押。同时联络一些在台湾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副司令、台湾防总副司令等,准备待解放军对台行动时,相机在台湾澎湖起义。40年代后期的侯镜如身在蒋营,心在共产党。十多年前的话,“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重新涌上心头。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回到北京后,长期要求“归队”而未得允。

侯镜如脱离中共的情节清楚,与安子文联络后“归队”,表现也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所认可,但为什么给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却不允许归队,但同意他重新入党呢?此中自有机密。1933年侯任国民军三十师少将参谋长兼政训处长时,该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少校秘书李子纯被捕杀害。李妻(中共党员)1954年、1956年两次揭发认

为李的被害是侯告密的结果,在该师工作过的一些人,也提供材料,认为李的被杀可能与侯有关。所有揭发都只是怀疑,缺乏直接证据。因而既不能肯定,也不可轻易否定,但又无法进一步调查,只得挂了起来,作为历史疑案,不再处理。鉴于早期的革命经历及解放前夕与中共的联系,可以接受他重新入党。他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李子纯的事,为洗刷清白,则坚持要恢复1925年的党籍。这可能就是侯镜如入党问题的要害。

## 张权要求“留在党外”

张权曾积极要求入党,后来自觉放弃组织上的入党要求。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著名歌唱家张权1951年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毕业,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证书。1952年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她参加了几次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活动以后,这位单纯得可爱的艺术家就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了,为此感到光荣、兴奋。后来,别人告诉她,入党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审查,要办理手续。此后,她为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断努力。

作为艺术家,张权很有成就,是解放后第一个“茶花女”。但她政治上极其幼稚,后来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这并没有动摇她对中共的信任,她被错划为右派后,甚至从心里认为,党是对的,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和改造。

1961年,张权被下放到黑龙江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当音乐教员、独唱演员。1962年春节,她回北京过年,在一次舞会上,有位男士请她跳舞。张权感到此人有点面熟,似曾相识,但不知姓甚名谁,便很礼貌地问:“您贵姓?”男士彬彬有礼地回答:“姓李,叫李先念。”张闻后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她见到她特别崇敬与信赖的周恩来,她问:“总理,我现在是右派,以后我这个右派能不能变成左派?”周恩来说:“可以嘛,矛盾是能够转换的。”张权听后很兴奋。回到哈尔滨后,她对人说,我这个右派会变成左派。在那个谈右色变,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头上顶着右派帽子的人,竟敢说自己要成为

左派,岂不是要为右派翻案!她“理所当然”地招来一通批判。但她也不辩驳,只是把周恩来的话埋在心里,默默地为转化为左派而努力。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来,当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市音乐舞蹈学会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右派改正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党,她郑重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请。但她的热情却遭受冷落,没有被发展为党员。1979年,她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委,仍忘我地投入工作。

198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把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当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全党上下、各地各方面一度抓得很紧,媒体宣传也紧锣密鼓,声势不可谓不大。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被拉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权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她透露,打算吸收她入党。那段时间,张权常接待来访的外宾。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常遇到这样的事,对方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不是,于是外宾谈话很坦率,没什么遮拦,她的话外宾也能听得进去,双方交流很顺利。她由此体会到,在党外,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有利的工作。

在党组织找她谈过入党问题后,1984年3月,张权邀请民进中央秘书长、中共党员葛志成谈心。她谈了对党的认识和申请入党的过程。她恳挚地说:“我对党是有感情的,但从工作考虑,不入党更有利。雷(洁琼)大姐、谢(冰心)大姐都不是党员,不都是党外的同志吗?”希望能转告党组织,体谅她的用心。

直至1993年因癌症去世,张权一直没有入党。住院期间,她谢绝一切好友的探望,因为癌症折磨,形容全变,为了在友人们心中保留原来的美好形象。一样的道理,她谢绝入党,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位优秀的、不图政治虚名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本刊公告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2010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 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

○ 王晓中

“西北问题”是指 1935 年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肃反”所遗留的历史悬案。1983 年,中央顾问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持解决“西北问题”。

20 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西北问题”及其长期遗留的矛盾纠葛,以及最后认定史实和化解宿怨的过程,仍然多有值得感悟和反思之处。

## 一、“西北问题”的背景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是中共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创建的两个“红色苏维埃”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分别是两个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是西北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当时的旧中国,西北陕甘一带是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土地贫瘠,天灾不断,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官僚、军阀、土匪、豪绅以及帮会袍哥沆瀣一气,明争暗斗,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当地社会特点,在发动群众、解救群众的同时,始终坚持在军阀、民团、土匪、帮会武装中开展工作,采用争取改造、分化瓦解与打击惩处并举的方针,反抗黑暗势力的统治,培育、创建革命力量。经过起伏再三的斗争和牺牲,最终拉起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在初期阶段,由刘志丹领导创建的根据地称为“陕甘边根据地”,由谢子长领导创建的根据地称为“陕北根据地”。西北党和军队创建成长的过程不但格外艰难曲折,而且有自身独到的特点。由于多是本地人在当地发起革命,凭借各自的社会基础和艰苦斗争创建了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武装,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和个人威望在各自创建和领导的队伍中格外突出。于是,围绕刘志丹、谢子

长两人,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纠纷和冲突,也多是发生在这两个派系之间。

刘、谢二人都曾根据环境和任务的需要,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策略开展工作。谢子长曾自办武装民团,自任团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的力量开展斗争。刘志丹也一次次打入地方军阀部队,曾官至团长、旅长,藉以掩护身份,展开兵运斗争。他们拉起的队伍,成分也比较复杂。既有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也有倒戈起义的旧军队官兵;有改造整编的帮会或民团,还有幡然投身革命的流寇武装。当时党内和部队内部对一些斗争策略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相关各方彼此也有较深的成见。各支队伍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猜忌和排斥情绪,甚至发生过武装火并,流过血,死过人。所以,出身西北的党政军干部战士之间的矛盾和积怨,由来已久。因为局势和斗争发展的需要,西北党和军队的组织机构和编成又经常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更进一步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

发生在 1935 年的“肃反”,固然与全党当时的政治路线有关,但西北革命力量原有的内在矛盾,也是促成浩劫重要的内因。这次“肃反”,进一步激化了旧有矛盾,新旧怨愤全面爆发,一度把西北革命事业推向崩溃的边缘。

## 二、1935 年秋的“肃反”运动

尽管西北党和军队建设成长一波三折,但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坚强领导下,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力量在对敌斗争中,终归以大局为重,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粉碎敌人一次次围剿,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刘、谢的积极推动下,于 1935 年 2 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谢子长任工委负责人



谢子长(1897-1935)

刘志丹(1903-1936)

兼军委会主席,两片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

1934年8月,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西北工委刚刚建立,谢子长就因伤势恶化牺牲。刘志丹继任西北军委会主席,5月兼前敌总指挥,成为西北党和军队的首要领导人。至1935年8月,陕甘边、陕北两片根据地终于连成一片,并日渐巩固起来。

然而,正当西北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与当时其他根据地一样,也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自相残杀的内部“肃反”运动。

1934年8月期间,正值全党“左倾”政治路线泛滥成灾,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无端指责西北根据地的土改政策是“富农路线”,军事方针“右倾”,搞“枪杆子万能”,部队是“土匪色彩”。谢子长的战友、陕北出身的郭洪涛,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他对刘志丹所坚持的方针政策早有看法。他写信给中共北方代表,附和以上指责,举报刘志丹及其领导下创建的红二十六军所谓问题。他的立场和做法,顿时得到北方代表的支持,对日后“肃反”的矛头所向具有重要影响。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指派朱理治、聂洪钧作为其代表抵达陕北,全面领导西北地区的党政军事务。在朱、聂的策划运作下,首先实行党政军领导机构改组,很快撤销了西北工委和陕甘边特委,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朱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

记,聂任军委主席。与此同时,来自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原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些安排的用意之一,是旨在削弱刘志丹的领导地位和影响,为“肃反”做组织上的准备。

9月,“肃反”全面铺开。朱、聂、郭和西北根据地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组成“肃反”领导小组,成为整个运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肃反”的矛头首先指

向刘志丹和陕甘边出身的班底。

运动一开始,就大肆采取无端怀疑、刑讯逼供、株连定罪等手段。不到两个月,已有二百余人被杀,被逮捕、关押的人不计其数,其中绝大部分是自己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主要处决手段竟是刀砍和活埋!随着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领导人陆续被捕关押,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主要骨干基本被一网打尽。其中包括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刘志丹的战友、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等。人人自危、滥捕滥杀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根据地。互相怀疑、互相戒备、互相敌视的气氛迅速蔓延,宗派主义情绪愈演愈烈。

正在此时,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首先,诸多案子纯属捕风捉影,查无实据,使运动领导人的心中疑窦丛生,情绪动摇。郭洪涛后来回忆说,抓了张秀山后,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作为。他对旁边的人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们(指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是反革命!”而且,有迹象表明,红军内部随时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西北根据地的命运危在旦夕。这更使运动领导人心存顾忌,感到恐慌。

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获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为混乱、迷茫的局面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开始收敛起来。

10月底,郭洪涛、程子华代表西北党组织前



往甘泉,迎接中央红军,向中央汇报了西北的情况。当听到“肃反”的情况时,毛泽东、张闻天等大为震惊,急令西北领导人“刀下留人”。

紧急磋商后,中央成立五人委员会,全权解决西北“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中,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中革军委代表张云逸,西北代表是郭洪涛。

在中央的敦促下,在五人委员会的果断干预下,运动很快收场,刘志丹等人被解救出来。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停止“肃反”,释放所有被关押人员。但在中央决定中,仍然认定“红二十六军有些负责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以及对反革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之后,对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在政治上和任用上,仍然遗留着歧视,许多被枉杀的人也没有及时做出结论。于是,在“肃反”中受到冤枉迫害的人和主持“肃反”的朱、聂、郭等人之间,从此结下更深的宿怨。

刘志丹被解救后,先担任西北军委会后方留守处副主任,后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1936年4月,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在为他撰写悼词时,查阅档案的同志看到,他的档案封面上赫然标注着一行大字:“此人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三、“西北问题”结论的反复

1935年底,中央虽然制止了西北“肃反”,但由于当时局势的严峻,特别是对于统治全党数年之久的“左倾”路线还缺乏完整、清晰的认识,所以对运动没有及时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1942年,中共中央在清算全党“左倾”路线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对1935年西北的“肃反”运动进行重新审理,从“路线斗争”的层面对“肃反”进行反省和清算。会议为刘志丹等人正式彻底平反,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同时,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予以组织处分。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

线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至此,西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结论。但是,在《决定》中,又指责郭洪涛等人是“有意陷害同志”。所以,被处理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觉得委屈,对这次结论并不完全接受。

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出身西北的广大干部各奔东西,在不同的战线和岗位上,为革命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56年起,直到文革结束后,郭洪涛等人多次给中央写信,为自己在1935年“肃反”中的作为和责任进行申辩,对1942年的中央《决定》提出申诉。

促使郭洪涛等人提出申诉的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自1941年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肃反”问题的《决定》,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

根据郭洪涛的反复申诉,主要还是高岗问题的定性,使中央有关部门的观点出现反复。中央监委于1959年、中组部于1978年先后发文,改变了1942年的口径,认为郭洪涛等人只是犯有“肃反错误”,不再提“路线错误”;对郭洪涛认定自己“在内战时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说法予以默认,并下结论称郭“不是肃反的主持人”。这就使已有的结论更加模糊起来。1959年中央监委重作结论的还有朱理治。

1981年,郭洪涛连续公开发表文章,虽然承认当时的“肃反”是错误的,但谈到自己时,回避1942年的《决定》,只提1959年中央监委和1978年中组部先后修订的结论,以证明自己不应承担“肃反”的领导责任和“路线错误”。

这些情况,尤其是郭洪涛的文章,招致许多健在的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双方爆发了争论。

针对争议,当年的中央代表李维汉在一次谈话中,郑重重申他的意见:“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路线是正确的;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革命领袖——刘志丹,谢子长。”

但是,他的话无济于事。

## 四、中顾委主持解决悬案

从1981年开始的争论日渐激烈，一些老同志不仅仅对郭洪涛的态度和“肃反”结论的反复表示不满，又把二三十年代的旧事翻腾出来，越翻腾越生气，开始影响到广大西北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并引申出如何评价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中央的注意。

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了中顾委。由于健在的当事人大多是中顾委委员，中央就把解决这起历史悬案的任务交给中顾委。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常委王首道、委员冯文彬、秘书长荣高棠和中组部部长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李维汉、王首道都是当年中央五人小组成员，是历史的见证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出席了五人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由原来陕北、陕甘边各推举四位代表和五人小组一起，以座谈会为主要方式，澄清历史，交换意见，共同商定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再纠缠枝节问题，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最终结束争论。

经协商，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等，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会。除李铁轮外，其他七人都是中顾委委员。

五人小组先行组织两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代表参加，一方一次，以求充分听取双方意见，摸清情况，核实史实。尔后，在事实基本清楚，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统一认识，做出结论。

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通过座谈、查阅档案、个别交谈、分别做说服工作等方法，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水落石出。双方都愿意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遵照五人小组提出的方针解决问题。

在认定事实、澄清是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分析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结论和中央的《决定》，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高岗的作用和责任。

王首道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高岗在陕北和

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一度把他们当右派都抓起来。是我们给他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是后来个人主义极端发展，走上了反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李维汉和王首道的意见很明确，对高岗的历史表现要作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对西北问题的结论同样应该实事求是。

6月，五人小组起草题为《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工作报告，呈报中央书记处。

报告认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立下重大历史功绩，应当载入史册。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西北革命的领袖人物。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1935年9月、10月间发生的错误“肃反”，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

在党的幼年时代，在曲折的斗争过程中，犯有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各地发生的错误，只有性质和程度的不同，没有有无之分。当时，“左倾”路线正在统治全党，各地都难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受到影响。1935年的西北“肃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产物。对此，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

报告特别指出，刘志丹是一位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二十六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他是受当时“左倾”路线所控制的北方代表的指派到陕北参加领导工作，实际是来推行“左倾”路线的。他对待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采取的是“左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郭洪涛确实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报告同时指出，郭洪涛曾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后来又表态说“不是有意陷害他们”，都是可信的。几十年来，郭洪涛也接受了历史教训，勤勤恳恳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希望他能正确认识30年代的路线是非，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报告的这一认定，实际上纠正了1942年中央《决定》中关于郭洪涛个人动机的相关说法。

报告明确指出,对于历史问题的争论,要从全局上和根本上来看。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除了路线是非必须分清以外,对其他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要再纠缠不放。否则,既不利于团结前进,也有违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生前的愿望。

报告提议,有关同志应把一切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争论终止下来。至于杀错的人,一律由中组部和民政部平反,不要再算细账。对西北问题的认识,都应以这次座谈会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一精神的文件、文章,不能再扩散。凡是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党史、军史著作,都应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6月9日,中央书记处听取李维汉的汇报,讨论并原则同意五人小组的报告,并再次重申:过去文件中凡有与此报告相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作废;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被害的同志,尚未得到平反昭雪的,一律正式平反昭雪。

6月20日,五人小组和双方代表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由王首道主持。与会各方代表对五人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决定一致表示赞成。郭洪涛当场作了自我批评,并向被伤害的同志当面道歉。他的态度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谅解。最后,双方代表遵照中央要求,签署了同意报告的意见书。

1983年7月,中共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五人小组的报告和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文件发至全国党政军机关和社会、群众团体党组、党委。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桩党内斗争悬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最终得以端正和澄清,相关纷争也平息下来。

## 五、一点启示和反思

在以往的党史宣传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1986~1987年间,我遵照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指示着手整理记述中顾委历年的工作,解决“西北问题”是其中一项。我在查阅汇集相关材料时,为这段往事的真相所深深触动。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路征程中,几度掀起大规模的内乱。而这些内乱,又总是贯穿着冷

酷无情的自相残杀。党内斗争的残酷,并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它给广大党员和党的肌体所造成的危害,又更甚于敌我斗争。

上一辈老人,当他们在和当面的敌人浴血苦战时,还要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残自毁的恶斗,遭受自己人从侧后袭来的陷害。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都不曾被敌人的凶残所吓倒,也不曾为敌人的刀枪所打倒,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竟会毁在自己人手中,冤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敌人造成的伤痛可以痊愈,甚至得以引为光荣和自豪,但来自党内的无端陷害和自相残杀,却永远铭刻在心灵深处,成为终生的痛楚。

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革命复杂严酷的外部环境所迫,但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代表社会进步的政党,竟一再发生这些不堪回首的故事,在党的政治理念、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党内风气上所暴露的缺陷和歧路,应当有更为值得检讨和反思的教训。

再者,从这一悬案的几度周折也可以看到,党史上诸多的历史问题,由于认识的局限或一时的政治需要,常会翻来覆去,或者讳莫如深。尤其是以人断史,以人划线,对人、对事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更是长期以来困扰党内修史的一块心病。现在回头去看,即便是这次最后的结论,也可以感觉到其中未尽的遗憾和委屈。

当时的中央和中顾委,对于一桩复杂的历史悬案,毕竟采取了积极主动、勇于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是值得欣慰的变化和进步。■

(作者原担任中顾委办公室秘书)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更正

本刊今年第7期,目录及第38页的标题“1956年的汉阳一中事件”,其中“1956年”应改为“1957年”;第53页右栏倒数第7行“章芷玲”应为“童芷玲”;第96页王佩英的卒年“1970年1月18日”应改为“1970年1月27日”。

##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1958年司法部党组

## 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原委

○ 崔敏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巨大的一起冤案。国务院下属一个部——司法部的党组，全体成员6人，另加正司级干部3人，共9人，被一举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把一个部的党组打成“反党集团”，它不仅在党内斗争中开创了恶劣的先例，而且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冲击，其影响至为深远。

遗憾的是，这起特大冤案，后来鲜有人再提及，渐渐地被淡忘了，人们更不知道司法部党组是代人受过——当时真正要清算的是董必武的法律思想。有鉴于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此事的起因、经过，并对背后的权谋做较深入的探析，以求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 一、事情的缘起

事情发生在“大跃进”发起的1958年，而它的缘起则在变幻莫测的1957年。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毛泽东于2月7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宣告“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面对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接着，在3月1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放手让大家讲话，使人们敢于批评。这两个报告一传达，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以为看到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曙光。

第二件大事，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

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随后，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始，与会人员比较拘谨，后经一再启发，各种意见就都放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

第三件大事，“整风”开始不久，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猛然间来了一个急转弯。于是，运筹帷幄，施展“阳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6月初发动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500余万知识分子中，打出了55万多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遂使政治空气骤然收紧，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反右派”运动中，政法战线是重灾区，大批法学家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法学领域被当作“右派观点”批判的，主要是“司法独立”、“无罪推定”、“有利被告”和“自由心证”四大论点。尤其是“司法独立”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被说成是“以法抗党”，完全颠倒是非。

“反右派”斗争于1957年下半年渐近尾声。但是，对于政法战线来说，绝不意味着事情的了结，而是新一轮冲击波的前奏。《人民日报》于1957年10月9日和10月14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提出“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中“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进而断言：“如果说党在政法战线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正需要这种‘不分’。”这两篇社论，预示着即将在政法战线发起一波更为猛烈的冲击。

为了发起新一轮冲击,事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其中,有一个情况值得回味:195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董必武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参加三国的党代会,返回途中还顺访苏联,一去就是两个多月,直到8月7日才返回北京。正是在董必武出访期间,中共中央于1958年6月10日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并指定了各小组的负责人。政法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罗瑞卿,董必武只是成员之一。随即,中央政法小组指令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按照成都会议(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召开)的精神,“检查、总结八年来的工作”。

这便是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召开的背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

## 二、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概况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于1958年6月23日开幕,8月20日结束,陆陆续续开了将近两个月。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和司法厅(局)的负责同志,部分军事法院院长,部分中级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审判员、书记员,司法院校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律师等,共440人。

### (一)会议的开会与经过

据最高法院党组在会后向中央呈送的报告称:“这是全国司法干部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会议按照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共贴出大字报一万二千张),检查了八年来主要是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以来的司法工作,其中着重检查了这一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工作,揭发和批判了司法部党组近二三年来所犯的一系列违反党的领导、方针政策的错误。会议通过检查、批判,更加透彻地解决了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审判工作的群众路线等根本性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彭真同

志和罗瑞卿同志分别就会议中讨论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作了重要报告,成为这次会议的基本总结。”

### (二)会议集中批判的几个问题

会议指责“在司法战线上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这种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由于1957年突如其来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左”倾,导致盲目地多捕重判。从1957年下半年起,全国的捕人数、判刑数大量上升,到1958年达到高峰,全国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183万件,是1955年的3倍。各地人民法院普遍发生了不该判而判、盲目重判、轻罪重判的严重“左”倾失误。在会议批判了司法工作“右倾”以后,更促使“左”的失误愈演愈烈。

会议认为:“发生严重右倾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程度不同地沾染了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并列举了三个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表现和影响。

第一,指责“忽视了法院的专政职能,篡改了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其实,这是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批判更是强词夺理。会议强调人民法院要“为阶级斗争,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片面夸大镇压功能,否定保护人民民主,是极“左”思潮的一种表现。

第二,会议按照反右派斗争的基调,批判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进而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一个驯服工具”,特别强调了“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不仅要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批示和监督”。

这样的提法,就把党的“八大”提出的“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撇在了一边。事实表明,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和“以法抗党”的责难根本站不住脚。

第三,会议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指责人民法院“过多地强调了法律程序的作用,助长了审判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批评一些法院干部“死抠法律条文”,“对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个‘紧箍咒’”。这样的批

判显然是蛮不讲理的。它倡导法律虚无主义,结果是助长了有法不依的现象进一步泛滥,致使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陷于停顿。

回过头来看,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当时所批判的观点和主张,其实都没有错。后来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司法机关的那几项罪名完全是混淆视听,颠倒了是非。那次会议的总的倾向和基调都是错误的,致使政法工作中极“左”的一套进一步强化。后来又提出“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到了1960年11月,又决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这就完全取消了三机关的互相制约,使司法工作整个儿乱了套,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 三、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

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将司法部党组打成了“反党集团”。据称:“这个反党集团的彻底揭露是司法战线上整风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指控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罪状有四条:一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违抗党中央的司法建设方针”;三是“反对地方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四是“包庇右派分子”。但从会上罗列的一系列错误事实来看,实际上都没有错。作为主管司法行政工作的司法部,对有关刑事政策和诉讼程序中的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建议,发现某些偏差后提出纠正意见,这正是尽职尽责的表现。即使某些意见与上级的指示不一致,也应该允许提出。如果一味地盲从,掩盖问题,那才是失职和误国害民。由此给扣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抗党中央的司法建设方针”等帽子,完全颠倒了是非。当时认定司法部“反党集团”的四条罪状都不能成立,历史证明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的冤案,致使当事人蒙受了20多年的冤屈。好在中共中央已于1978年12月宣布对这起冤案予以平反,为有关同志恢复了名誉。

此案似乎已经了断。然而,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矛头究竟指向何方。当初只是要整垮司法部党组,还是另有所图?这是需要下一番工夫加以考证的。

### 四、斗争的矛头究竟指向谁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批转有关会议的六个文件的批语中,直称:“政法战线上几年来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争论的。”这就把某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上的分歧,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提出和推行一条路线,绝非几个小人物能够办到。要说以司法部两位副部长为“首领”的“反党集团”(当时,司法部副部长郑绍文是党组书记,另一副部长陈养山为党组副书记,二人均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领”),居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正确路线”相对抗的“错误路线”,似乎说不通,他们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能量。换句话说,提出“两条路线争论”的背后,必有所指。那么,它的矛头究竟指向哪里?这是后人研究中国当代法制史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2006年1月出版的《董必武传》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该传记第95章专门叙述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其中有这样一个推断:

“这次会议的批判未点董必武的名字,但是,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大都引用董必武所讲过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一直是党和国家政法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既然是所谓‘政法战线上几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争论’,矛头所指,不言自明。”(《董必武传(19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8页)

这一推断能否成立?我们不妨来看事实: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向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宪法颁布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运用政治家的智慧和法学家的眼光,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真知灼见,例如:



1953年4月,董必武与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

——“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他还批评某些地方党委存在“党政不分”的现象。(同上,第482~483页)

——“法制不完备的状态,在新建的国家内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时候的。……但是,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同上,第481~482页)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同上,第485~486页)

——“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目前我们法律工

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同上,第520~521页)

在董老分管政法工作的八年中,他几乎是逢会必讲,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可胜数。半个世纪以后回头去看,他讲得多么清楚、何等深刻!董老为倡导法制文明呕心沥血,为建立和完善法制竭尽全力。他语重心长地向党内同志和司法干部反复讲解建立和完善法制的必要性,1956年在“八大”的发言中更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可谓高瞻远瞩。据薄一波同志回忆:“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可惜,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对董必武同志的上述论断并不赏识。某些左派政治家依然按照“以党治国”的惯性思维,习惯于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美其名曰“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遂把董老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当作异端。乘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余威,决心在政法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展开“两条路线的争论”。矛头显然是针对八年来一直倡导依法办事的董必武同志。但是,由于董老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如果选择这样一个目标开火,实在是太显眼也太敏感了。出于策略的考虑,便采取了“杀鸡儆猴”的战术。选择突破口也颇费心思,虚虚实实,务必要掩人耳目。权衡利弊,拿司法部党组开刀是一种高明的选择。这样,司法部党组便成了替董老受过的牺牲品。

从会议的文件来看,明确批评“一些法院干部‘死抠法律条文’,‘对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个‘紧箍咒’”;“把法神秘化、偶像化,成了束缚自己对敌斗争手脚的绳索,有时还想强加于人,束缚兄弟部门的手脚”。这就点明了批判的



1956年9月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上投票

再发表意见。

现在，人们公认董必武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他为创立和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竭尽全力，并留下了许多鸿篇巨制。但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真正懂法、倡导法制文明的伟大法学家，可谓一代人杰，却从此退出了中国的政法领域，这真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

当年猛批法治，毫不留情地把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的那些政治家，何曾料到自己也有大难临头之时？时光流过八年之

重点并不在司法部，而是针对“法院干部”，对照董必武反复强调“依法办事”，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等论断，这一批判的矛头所指，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中央政法小组1958年11月29日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司法部反党集团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郑绍文和陈养山“都有思想萎顿、政治衰退和在党内看风色、搞投机的共同点。”所谓“看风色、搞投机”，显然是指靠拢比他们职务更高的领导同志。这句话暗含的蕴意，不就点得更明白了吗？

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这场一边倒的“辩论”，十分老到，各项安排天衣无缝。尽管这次会议清算了董必武的法律思想，但无论在会上或者会下，都没有任何人公开点名对董老进行批判，充分展示了政治家们的智慧和权谋。

## 五、历史教训应该记取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董必武在1958年10月就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辞呈，内称：“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职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但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辞呈，又安排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名义上又升了一级。董老则颇为“识相”，自此对法制建设不

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彭真、罗瑞卿最先被兴师问罪，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领，论为人治下的又一批祭品。

司法部“反党集团”的冤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要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看来还得要靠健全法制，否则难保重蹈覆辙。■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已退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 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 萧 扬 整理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他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已经整理进《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并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发表。没有整理进去的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关系，胡乔木说这些事情“比较难写”。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大家对于党史上事实材料的披露有了更多期待，也有了更高的鉴别力和承受力，我觉得可以按照当时的记录（主要是未曾发表的部分）整理此文了。记录曾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复核。

##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一段有些事情比较难写。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他对冯文彬有过批评<sup>注1</sup>，对我们有帮助。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央召集会，撤销了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务。毛主席批评他空、高、怯、弱、私<sup>注2</sup>，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他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那次撤销张闻天的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也同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有责任有关，虽

然他在遵义会议上起了作用。他在政治形势的分析等问题上同博古一致，在苏维埃具体政策上有分歧。那次批评，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后来张闻天去了绥德<sup>注3</sup>，回来参加了一段整风，也讲了话。

张闻天在延安时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影响大，在国统区影响也大。一般人印象，以为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不讲待人接物之道，这篇文章澄清了误解，为共产党人改善了形象。但是文章在整风中却挨了批评，说没有阶级观点。康生批评最为激烈，毛主席也表示不赞成。其实那篇文章讲了人是分阶级的，讲了要同坏人作斗争。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是毛主席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讲人，就是阶级烙印；一看到谁讲人，就反对。

这是当时对他批评的过火之处。

七大选举时讲了张闻天的作用，但是主要是讲王稼祥的作用。实际上张闻天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之下。因为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

对王稼祥，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请他来杨家岭住，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后来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稼祥说的，毛主席就对他冷淡了。但是，毛主席后来还是比较信任王稼祥。在中联部后期，他们有分歧，王稼祥受了批评。王稼祥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不能反对，提了一个折中建议，主张分开处理。他们联名写了信。毛主席很不满意。但是对王稼祥总是好一些，王稼祥解放也早一些。

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这些文章他也不准备发表。<sup>注4</sup>

## 毛泽东 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

1944年,毛主席要张闻天、陈伯达和我三人做他的政治秘书。<sup>注5</sup>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张闻天写了中国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sup>注6</sup>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的矛盾。毛主席说,红军要彻底胜利,一定要反对陈毅主义。如不反对陈毅主义,革命就要失败。陈毅比较随便,大而化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后来陈毅到上海,周恩来要陈毅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陈毅回来,古田会议才得以召开。古田会议主要针对朱、陈二人。毛主席是少数,他认为无法合作,退出前委。后来陈毅去请他,他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决议写了很严格的主张。

做政治秘书,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张闻天就写自己的笔记、回忆,很勤奋。当时他年轻,离所写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的事情清楚。本来毛主席要我们起草七大的报告,后来认为我们起草的不能用,所以从头到尾他自己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我们没有联系。我知道他在1948年到1949年间用心研究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报告。这一时期他就合作社问题写的报告,主张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同少奇同志的分歧很严重。少奇根本否定这类主张。洛甫主张企业要有利润,少奇批,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所以提法不对,把问题提得很高。少奇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说,你的信我也没有怎么看,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用。毛主席很赞成张闻天的主张。

1950年,张闻天奉调北京,准备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本来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时,党中央就曾准备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要我为此草拟新闻稿,特别交代在稿中要写明张闻天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后来中央因故改派了董必武。

张闻天后来接替王稼祥担任驻苏大使。王稼

祥在任时,苏联同我们关系紧张,怀疑我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王稼祥回国时连欢送宴会都没有。张闻天去后,不久赫鲁晓夫上台,情况就不一样。他离开苏联时,苏联的欢送很热情。后来批张闻天时说,王稼祥在苏联受冷遇,你受欢迎。其实是张闻天在对苏联关系方面掌握得比较好。

1954年我去苏联治病,到过使馆几次。张闻天勤于调查研究,曾给国内电报,介绍苏联动态,中央比较重视。我劝他多写些电报,介绍苏联的领导方法。当时我感到国内领导经济不上轨道,苏联管理经济较有条理,希望他多写些电报,影响国内。但是后来他写的也不多,可能同中苏分歧有关。

张闻天领导使馆,内部工作有条理,很多人信服他,这些人都在。但是这一段写起来措词比较难,一些人同外交部的关系有些复杂。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时,中央曾经考虑是否需要张闻天继续留在外交部。周恩来认为张闻天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例如他曾到我国各驻外使馆做过一次巡回视察,这种工作似乎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做过),主张把他留下。可见张闻天这一段的工作是得中央好评的。

## 毛泽东: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主席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毛主席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 郁达夫：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庐山会议上，我同张闻天的意见比较接近。本来我在苏联时同他谈话，对国内形势的意见就比较接近。

“歌特”文章<sup>注7</sup>是张闻天写的，这没有问题。为何作用不大？可能文章写出不久，他就离开了上海，所以在“左联”的实际工作中未起影响。不仅周扬、夏衍没有接受，连鲁迅也没有接受。

我们那时办了一份32开的刊物，叫《中国青年》。1941年2月，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登了张闻天早年发表过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不赞成再登。我觉得可以发表，对他讲了我的考虑。那时绥米警备区刚刚收复，青年学生多，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发表《飘零的黄叶》会有作用。从张闻天那里我听说，当年小说发表后，郁达夫对他说，你这篇小说像一首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是一篇较好的作家论。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张闻天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至今也没有新的译本代替。

注释：

注1 对冯文彬的批评，指1938年批评青训班逮捕人一事。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记述了这件事：

“同张闻天同志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我记得是由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担任陕西安吴（属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不在安吴，大概是因工作去西安了。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这时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如今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廖季立同志告发。除陈珍雄以外，还有一两个跟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当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以后不久，我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同志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同他一道从事托派宣传的人逮捕起来，准备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同志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同志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青训班是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

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这个电报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自己也认识到确实太幼稚。结果是把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政府（那里的县长是党的一位同情分子），由长安县政府放了。”

注2 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 指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之行。绥德是这次调查最先路过的地方，也是调查的最后一站。

注4 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注5 关于政治秘书，在最初载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回忆张闻天同志》文中，胡乔木是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要张闻天同志在身边担任政治研究工作”。此文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时，采用了“政治秘书”一语。

注6 这本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胡乔木说它是张闻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它连同张闻天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报告和材料等等，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烧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注7 指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2年11月）。文章批评了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将文艺归结为政治留声机的关门主义错误。据程中原查证，瞿秋白、冯雪峰接受了这一批评，针对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争因而停止。鲁迅1932年12月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歌特文章反对关门主义步调也是一致的。■

（作者曾任张闻天秘书，《世界知识》杂志原主编）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1945年中苏军队会师的一些情况

○ 段湮恒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150万苏联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11日,延安总部从莫斯科电台广播中得知,苏联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司令普利耶夫上将)西路部队,包括第27摩托化步兵旅、第30摩托团、第7装甲旅及第3炮兵团,连同蒙古国一支机械化骑兵部队,从二连方向出兵,穿越300公里多盐沼泽地、戈壁沙漠,“可能直趋张家口”。遂命令我平北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配合作战。8月15日,察蒙骑兵支队在张北县城与苏蒙联军会师,次日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张北县城。17日接管了商都,19日、20日分别接管了德化、多伦,原拟中苏军队联合攻打张家口,终因受限于《雅尔塔协议》而未果。这一成功接触和摸底,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我党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并很快占得先机,我党我军第一次拥有了战略后方和总根据地,同时控制了当时解放区唯一的现代工业基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过去由于宣传的少,以致在党史军史中,很少有人提及,现将其披露出来,以飨读者。

##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由来

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指北平(今北京)以北,平承铁路以西,平张铁路以东,长城内外的一片区域。它包括伪满洲国所属丰宁、滦平,伪华北自治政府所属昌平、怀柔、密云、顺义,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属崇礼、宣化、龙关、赤城、怀来、延庆,察哈尔盟的康保、宝源、张北等县,虽然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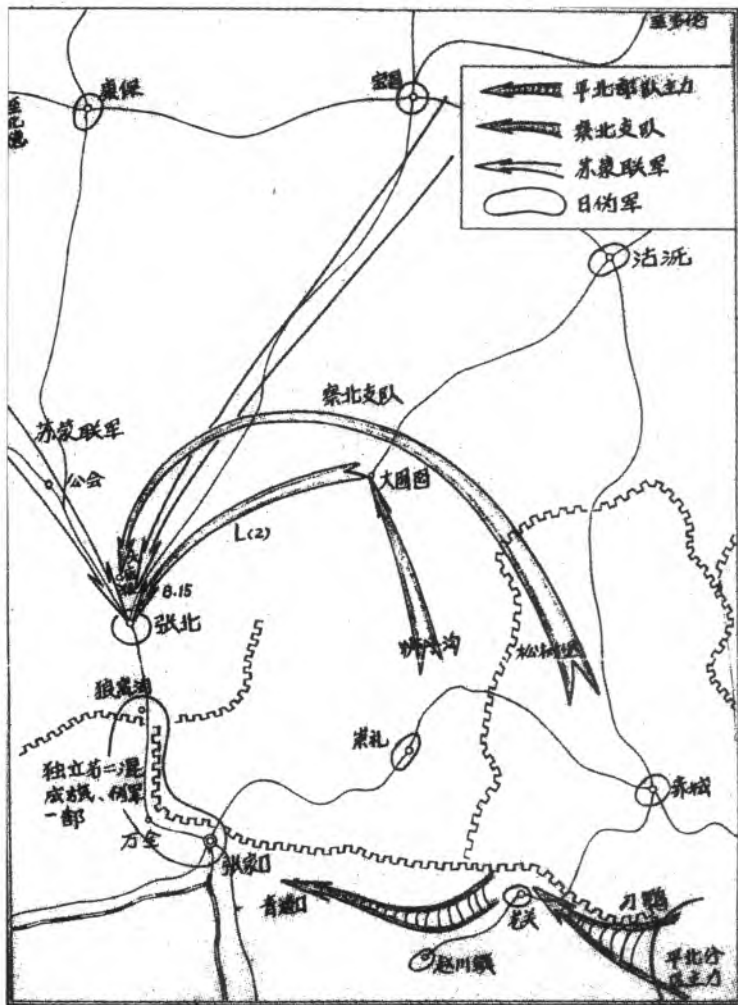
只有25000平方公里,却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精心布下的一枚棋子,楔入关内与东北衔接部的一把利刃。早在1938年5月1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聂荣臻等,要求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与东北抗联呼应,向辽宁、热河一带及北宁路发展。随着日本殖民朝鲜、侵占满洲,苏联有理由对远东局势保持高度警惕,苏军相继组建远东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以应对冲突不断的边境纠纷。1938年7月,日军在太平洋沿岸距海参崴160公里的张鼓峰地区挑起冲突(又称“哈桑湖事件”),驻朝鲜一个师团和部分关东军投入战斗,结果惨遭败北。挫折并未使日本人罢手。次年5月,日军又在“满洲”与外蒙古接壤的大兴安岭西南麓,越过边界,在哈拉哈河(苏联又称哈勒欣河)沿岸诺门坎地区燃起战火。战事不断升级,至1939年8月1日,日军已调集7.5万余人、500门大炮、182辆坦克和约450架飞机,合并为日本第6集团军。苏军总指挥为军长朱可夫,4个月的战事,苏军付出万余人代价,日军则损失了5.2万人,其中精锐的关东军第23师团伤亡80%以上,日本军界不无自嘲地说: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苏联把他们机械化部队装备到什么程度。苏军在远东小试牛刀,强力振奋了中国抗日军民。

1938年8月3日,张鼓峰捷报传来不久,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彭真,强调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提出将来苏联与日本开战后,八路军可依托冀热察根据地与苏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给。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再次致电聂荣臻,发出创建冀热察根据地的指示,打下从华北向东北发展的基础。1939年秋末,冀热察区党委和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克)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1940年初夏,在宛平县野三坡山

南村，萧克对即将赴敌后之敌后——平北地区担负艰巨任务的段苏权说：你这次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可要闹它个天翻地覆哟！不久日伪报刊惊呼：延安的触角伸到满洲了！

太平洋战争为国际形势带来积极的变化，平北作为紧邻苏蒙、挺进东北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日益凸显。1942年春季，中共北方分局指示平北由西北向东迂回，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作战略侦察，并牵制敌人兵力。同年夏季，苏联为粉碎希特勒围攻莫斯科和勉力支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3次发电报给延安，希望八路军在长城内外部署若干师团予以配合，拖住日军主力或增加其后顾之忧，避免苏军两面作战。苏联的战略需求，恰与我党开辟平北的初衷不谋而合。对斯大林电报中提供武器装备的建议，毛泽东回电说：武器八路军非常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内蒙草原到达中苏边境去接收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部队没到目的地就会被消灭。毛泽东两度否决派军队接收苏联武器的提议——对6年前西路军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但他在7月致新四军刘少奇电文中，首次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

1944年9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加强满洲及城市工作，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任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责成彭真和聂荣臻商量向东北发展的问题。12月15日，晋察冀分局向彭真报告东北工作的情形：目前在平北区已向东北派出许多人员，采取隐蔽的方式，如经商、居民亲属来往、被抓东北劳工等，使东北工作部的工作深入到东北各地，直到哈尔滨。平北军民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迎来根据地迅猛发展，由原来的6个联合县改建为8个县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4个团和1个骑兵支队（即察蒙支队，拥有5个骑兵连和1个步兵营），另有县区游击队和民兵5万余



平北部队与苏蒙联军会合情况图

人，不仅平北形成铁拳头，还与冀东、平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进军东北做好了充分准备。

## 平北部队与苏军会师

1945年2月《雅尔塔协议》签订后，苏联答应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3个月后，实施对日作战。会后苏联着手向中苏、中蒙边境进行跨越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美国也承允诺言，按时交付了这支钢铁巨龙两个月所需粮食、燃料、运输装备和其他物资的大部，总数为86万吨干货和20.6万吨燃料油。在雅尔塔会议前，中共中央从斯大林的几封电报中，已获悉苏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要出兵东北。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计划打日本的问题。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

苏共派驻延安的情报组成员弗拉基米洛夫(即孙平)对中共领导人说:苏联一定会出兵中国,但他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透露雅尔塔会议具体内容,只是强调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谈判的内容和战略意图须绝对保密。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于5月16日决定,派出两支精干的队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1旅和120师359旅第2梯队,火速南下,经湘鄂赣相机赴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批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委托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负责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还对李先念部所在地区的工作进行新的部署,要求他们研究“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揭示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七大”精神鼓舞下,平北地委和军分区适时提出向北发展、东西并重的战略方针。向东深入伪满境内抑制和打击敌人,积极开辟东北工作;向西则向坝上(当时指张北县和沽源县的大囿囿、西辛营子和小厂一带)主动出击,以期包围和解放张家口。1945年5月,鉴于形势发展,上级决定成立中共平北地委热西分委和察北分委,同时将丰滦密地区从冀东划回平北,以利我军迅速向热河西部和中蒙边境挺进。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平北军民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解放村庄451个,扩大解放区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控制了大海坨中心区迤北至长城外的张北、崇礼、沽源、康保一线的丘陵草原地带。2000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从子夜0时10分开始,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领下,苏联3个方面军计有诸兵种部队131个师、117个旅及21个边防区,总计150万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向宿敌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上午11时30分,美国空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

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敲响侵略者的丧钟。同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斯大林,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但毛、朱贺电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的任何答复。

此时此刻,宋子文及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商议和草拟《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尽管蒋介石对雅尔塔协议耿耿于怀他也是事后才得知的,在日记中写下“忍气吞声,负重致远”八个字,但百万苏军在3000公里战线快速推进,已容不得国民政府吞吞吐吐、讨价还价。8月14日夜,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24日正式对外公布。

中共中央对美英苏《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对即将达成的《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也毫不知情。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开展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其中第二号令是命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分别率部向热河、辽宁挺进,这是“打回老家去”顺理成章的安排。同时令现驻冀热辽边境的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在朱总司令发布公开命令的同时,中共中央又电告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地党组织: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所率部队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马上开往东北。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东北问题,毛说: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中共中央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军在东北的动向和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斯大林如何在同盟国和兄弟党之间走钢丝是延安最大的悬念。为了安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防止其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一边倒”,8月1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三点声明: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此项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承认东北

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行政完整;对于新疆最近事变(指1944年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史称“三区革命”),苏联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莫斯科的公开声明,对中共中央确定下一步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更添变数和困窘,在这种情势下,中央对于派兵进入东北,不得不持谨慎态度。

毛泽东一心想同苏联配合作战,于是平北部队就成了与苏联红军会师并配合作战的首选。8月12日,正率部围攻赤城的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晋察冀第12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收到聂荣臻、萧克、刘澜涛从延安发来的急电。延安总部从莫斯科广播的路透社电讯中得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已出现在日本占领下的热河林西附近,林西位于北平东北250英里处;据悉北平西北100英里蒙疆首都附近发生战事;由此推断苏蒙联军穿越300公里多盐沼泽地、戈壁沙漠,“可能直趋张家口”,遂命令我平北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同时做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段接电不敢怠慢,即刻做了部署,正在大囿囿以南、石窑子以北坝顶休整的察蒙支队,接到电令后迅速集结了3个骑兵连和2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狮子沟和张北脑包图出发,向张北和德化(今化德)方向去接应苏蒙联军。苏蒙联军西路总队8月

11日进入中国二连浩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取道滂江进占德化,14日晚进入张北县城;一路经苏尼特右旗南下,经商都亦到达张北县城。16日晚察蒙支队报告,他们于15日在张北县城外遇到苏蒙联军,联军对这支衣冠不整的部队有怀疑,

不许我军进城。命我以班为单位,把枪架起来,马拴到另一边,统由联军看管。经副政委兼察北办事处主任柴书林和副支队长吴广义反复交涉,“城防司令”(上校)才将他们带到公会镇,引至一处野外帐篷,见到一中将衔者(系扎哈罗夫),柴、吴向他敬礼同时喊了一声“达瓦列士”(俄语,同志),中将也回了一声“达瓦列士”并紧紧握手。中午以野餐招待,随即商妥分别向各自上级汇报,如无误,明天中午将县城交付我方管理。柴、吴走后,察蒙支队的生活全由苏军包下来,每人发一套铝制餐具,一日三餐全是苏军厨车做的面包和稀饭。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非常友好,尤其爱对我军小战士嬉笑打闹。苏军战士伸出大拇指说“斯大林”,我们则说“毛泽东”,分手时互相拥抱、握手、亲吻,更亲切了。

两军会师的这一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随即日本内阁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中午,苏方履约派一上校与我方会谈,承认我为八路军,将城内日伪军的仓储物资、武器弹药全部移交我们,防务仍由苏军负责。晋察冀分局接到平北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我冀察军区部队于16日(实际是15日)在张北,同苏联红军已会师。红军要联络手续,应如何办,请即示!在这份抄收件右上角,周恩来写有“快送主席”4个字,在右下角则写有“已办——毛”,可见中央对该件的重视程度。19日晚,察蒙支队受到邀



我军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这是两军领导人会面时的情景



请,次日晨在张北南门楼城头上观战。狼窝沟是位于张北城南15公里野狐岭黑风口的小村。野狐岭东西绵延数十里,岭北是坝上草原,岭南山陡沟深。黑风口又将野狐岭拦腰截断,成为沟通张家口和坝上、内蒙的咽喉。日寇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沿坝顶修了总长约600华里点线结合环形永久性筑垒工事。联军从17日开始天天进行炮击,侦察机也不断从头顶上飞过,20日晨更是以两轮急促猛烈的炮火猛轰狼窝沟前沿阵地。我方曾建议绕过雷区和壕沟,从侧翼进攻,未被苏军指挥官采纳。在攻击日军前沿北路大桥战斗中,联军先后击退日军十数次反扑,使后续主力得以迅速通过,冒雨冲向野狐岭日军阵地。经过雷区和防坦克壕,联军再次受阻,晌午时终于突破了黄花坪、老北台等日军阵地。20日夜,苏蒙

联军再次发起攻击,深入到黑风口东侧山岳地带,日军拼死抵抗,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21日日军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以掩护绥远、大同之敌和张家口的4万多侨民撤逃,拒不缴械。21日夜,日军预定计划完成,利用夜幕悄悄向张家口撤退。22日联军占领日军狼窝沟全部阵地。是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主力,震慑了张家口日军,联军亦死伤400余人,履行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解放后在张北县境内修建了“苏蒙联军烈士纪念碑”和“苏蒙烈士墓”,谢觉哉和聂荣臻元帅分别题词。1987年5月段苏权参观狼窝沟苏蒙联军烈士碑陈列馆,亦应邀写下长长的题字,以缅怀这些长眠异乡的国际主义战士。

根据平北分区察蒙骑兵支队与苏军会师的情况,8月17日和18日,中央连续来电要求平北军分区负责人即赴张北与红军联络。18日晚“带电台密赶张北与红军联络”的急电,更是指名道姓,由周恩来拟稿,内容如下:(一)望立即电令平北分区政委段苏权,带电台及与分局通电的密码,迅速赶往张北与红军会面,取得联络。段到后可将晋察冀军事情形告知红军司令,并负责将红军情形及其意见迅速电告延安。(二)经过现在张北与红军会师的

我军,将附上朱总司令给红军贺电亲自送去,以便联络,并配合其作战。鉴于詹大南司令员已率队出发即将抵达张北,段将朱德贺电连同中央电令一并发出,由詹见机行事。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专电询问与苏军会师部队的番号及首长名单。对于第一支与苏联红军会师的中国军队,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和耿飏参谋长“根据中央宣布张学思部在此方向活动,为了对外宣传,故发表为张学思部”。

## 与苏军的接洽

8月17日晚,在接到中央第一封指示电后,平北军分区詹大南司令员即偕张克宇(平北城工部长)带着10团3连乘夜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急



行军,19日晨抵达张北,临时在城里张罗了两个懂点蒙语的商人当翻译。初与苏军接触不太顺利,亦被缴了枪、电台和照相机,中午詹收到段政委发来的朱总司令贺电,转交后才消除了苏方疑虑。19日下午,詹大南给段发来电报,称苏军计划20日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从东、南两面配合进攻。同时要求我军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防敌南逃。同一天晋察冀军区向中央发电,报告詹大南与苏军接洽,“12分区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织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三路攻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张家口北、东、西三面环山,清水河由北向南把市区分为东西两部分。8月20日清晨6时,平北主力10团、40团对张家口展开攻击,教导大队作预备队。战至下午3时,清水河以东地区全部被我军占领,但直到天黑仍无苏蒙联军动静,于是只好暂时把部队撤至人头山、羊房堡一线待命。当晚打电报询詹,得悉苏军一直拒绝我方人员与其同行,无法及时了解苏军意图。

当天夜里,段苏权汇总了3天来与苏军接洽及收集的信息,向中央汇报了《对苏军的观感》,特别提到苏军“愿还我政权”、“同苏方率3个连去康保”;“对群众及蒙古官兵团结”、“重我党员”;对“中国政治问题知道很少,只知道朱德,不知道毛泽东”;“张北全境地方工作大致建立,公会(镇)公安干部极缺,国特土匪活动厉害”等等。该文抄送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平北发出的所有电文,全部是在延安核心高层传阅,许多电文在醒目处标有“已电话告知叶子龙——业务室”字样,叶子龙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在这一非常时期对苏军动态之关切,于此可见一斑。

8月21日晚,詹大南才发来电报,说苏军在狼窝沟进攻受挫,商定22日仍依原部署进攻张家口。21日午后,从大、小狼窝沟及春垦一带溃败下来的日军,陆续抵近张市。15时左右,其先头部队到达人头山以西甲官坪村,受到10团阻击,战至天黑,敌人丢下大批重装备绕道南逃。22日上午,平北部队再次向张市发起进攻。上午11时左右,从绥远、大同方向撤下来的几千名日军乘火车涌入张家口,敌人以铁甲车开道,妄图通

过张家口火车站向北平撤退,遂在车站以西发生激烈争夺。日寇困兽犹斗,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反复冲锋10余次,把大炮和重机枪架在敞车上疯狂攻击,我军伤亡较大。下午3时许,防守狼窝沟的日军主力进入市区,在油脂公司附近,遭我40团顽强堵截,双方伤亡都很大。段见苏蒙联军始终无消息,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不得不命令部队稍向后撤,敌人乘机蜂拥向南逃窜。23日拂晓,张家口市内的最后一批日本人集中到火车站附近加紧撤退,车站内外堆满了日本人遗弃的箱包、衣物、古董、银元、鸦片。我侦察分队随即进入市区,接着10团从东坡北侧进入并包围了德王府,在强大政治攻势下,700多名伪警全部缴械投降。下午3时左右战斗全部结束,当晚冀察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带领新华社支社记者从石门屯赶到张市,11天前任命的张家口市长张孟旭也率专署机关干部赶来了,与张同天任命的北平市长宋劭文、天津市长张苏、唐山市市长张明远、保定市长刘秀峰、石家庄市长王昭、秦皇岛市长朱其文,大多开了空头支票,张孟旭则名实相符。新华社25日急电:冀察我军占领察哈尔省会、伪蒙疆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缴获正清查中。此时距1937年8月27日张家口沦陷,整整过去了8年。由于张家口系日本关东军准备长期对苏作战的战略储备中心,仅军用仓库就不下60座,散落在兵营、阵地、车站、街垒的物资则更多,其中机枪、步枪1万余支(挺),子弹500万发,大炮百余门,各种炮弹10余万发,汽油3万桶,军马数千匹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此中央军委专门发文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已发现的武器弹药应迅速大部转移于平西平北根据地内,特别是弹药,除迅速发给各军区外,应即发给晋东南、晋西北各一部,立即大量组织民兵或征调党员去搬运武器”。此后张家口及周围地区成为“基本战略根据地”,在中共统辖的解放区,其地位仅次于延安。

8月24日中午,苏军派库兹涅佐夫上校乘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交谈中,段苏权依照中央指示,向苏方通报敌情、我情,拟配合苏军火速南下,直取北平、天津、保定,并告知平绥路两侧都是根据地。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外长城。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中央,事后才知道,这是《雅

尔塔协议》的一部分。段请他吃了饭，并把在宣化洋河南救治的一名跳伞飞行员交还给他。库氏挑了不少吃的、用的东西，汽车上堆得满满的。他又提出要女人，段说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事使不得，库氏才悻悻地走了。此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苏联军官，坐着老式吉普到张家口来要酒要吃的东西，多是早上来，傍晚回去。直至回国，联军部队都驻扎在万全坝以北，炮兵阵地设在张北城外西河滩上。对于美蒋即将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段也通报了苏方。8月26日9时和13时，段苏权向中央连发两个电报，“苏军最高指挥官令我们固守张市，并在市郊做工事，大同至张市至宣化铁路彻底破坏”；“今晨苏军十余人亦到，他们了解张市情形后，定于明日来此，尔后与苏军交谈一些什么问题，请告”。收电稿抄送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平北部队与苏军接洽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

## 领袖的记忆

由于受《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限制，中共中央在七大上确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下达的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未能有效实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通过多种渠道，与苏共和苏军建立了联系。在这些渠道中，最早与苏军会师的平北部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中共中央对派兵抢占东北、控制东北的信心大增。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改几天前“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有可能不能去”的发言，决定派5个团的部队和干部团去东北。8月28日下午，彭真在中央党校主持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干部的送行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你们赶快去抢。朱德也底气十足地讲：东北大有文章可做，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大有希望。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令晋察冀和

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寄予伟大之同情。因此部队可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刘少奇主持中央做出的上述重大决策，与平北部队最先与苏军亲密接触，摸清苏联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底牌，源源不断将信息提供给中央高层，是密不可分的。8月18日，苏蒙联军一部在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师军、李越之部配合下，解放丰宁凤山镇，这是继平北察蒙支队之后，第二支与苏军会师的部队。遵照毛泽东8月22日起草“派人到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组织”的中央来电，晋察冀分局令“冀热辽曾克林部仍按原定计划行动，并配备一批地方干部”沿北宁路火速北上。8月30日，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所部4000余人在苏军配合下，包围并解放了山海关，则是我军首次与苏军共同作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由于战争尚未结束，出访路线不得不迂回绕道而行。刘少奇和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车站乘专列，经沈阳到大连，再换乘飞机绕道朝鲜上空，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在沈阳停靠期间，高岗上了火车——他也是代表团成员。临上车前，高岗对前来送行的东北地区党政军干部一一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绍，当介绍到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时，少奇应声说：你是第一个与苏军会师，第一个向中央汇报苏军情况的。无独有偶，1965年底，毛泽东在上海体育馆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见到陪同客人的段苏权（时任中共中央驻老挝工作组组长），毛劈头就问：你在大青山工作过？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7月李井泉、姚喆率大青山支队创立的。大青山位于内蒙阴山中段、土默川平原以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绥远中东部地区，与段苏权毫无干系，毛泽东存有这个记忆，亦非空穴来风，恐与平北部队与苏军会师这段经历有关。正是抗战末期这件不小的事件，让中共领袖们记住了段苏权这个名字。■

（作者为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

○ 蔡晓鹏

1949~1978年,中共党内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有过几次重大分歧。1949~1953年,围绕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分歧集中在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还是加速向苏式社会主义转化;1955~1957年,分歧集中在农村合作化领域;1958~1962年,围绕着“三面红旗”,分歧集中在计划平衡的跃进与“反冒进”领域;1962~1978年,分歧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每次重大分歧中,都有华东的代表人物站在主流派的对立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 东北、华东各领风骚

建国前后,东北和华东是全国经济和财政的两大支柱。由于人文历史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明显区别,两大区域的经济政策各有特点:东北的特点是大计划优先,华东的特点是大流通优先。东北是全国重工业、军工业的中心,东北财委(建国后全称:东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陈云领衔。华东是民生工业和金融、商贸中心,华东财委(前身是华中财委,建国后全称: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曾山挂帅。

东北在日满时期是日本侵华的战略大本营,由日资垄断的军工、矿产、煤炭、电力、冶金、机电、铁路、航空、通讯等现代重工业迅速崛起,大规模的移民式垦荒也开始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和化学农药等新生产方式。日满统治者牢牢掌握着工业经济的命脉,通过军屯、贸易管制、口粮配给制,严密控制城乡经济、贸易活动,民族资本则微不足道。东北城乡间和各省间的商品交换依存度,远远低于关外与关内的商品互存度。解放战争中后期,东北通过接收敌产和土地改革,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工战略基地;建国初期,又成为抗美援朝的战略大后方。这一时期,东北经济政策总的目标是为战争服务,有明显的苏式战时经济特点。由

政府全面垄断社会核心财产和管控区域经济、贸易的“官有官控”战时经济政策,显示出极高效率。因此,建国后东北经济模式不仅为毛泽东高度肯定,而且为东北率先向苏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平稳过渡和转化,铺平了道路。

华东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工商业最发达的区域,上海更是远东近现代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国际国内贸易中心。中国民族资本的80%集中在华东。与东北不同,一方面华东能源、矿产、冶金、建材等工业原料对外区域的依赖度高,全国则对华东的民生工业品依赖度高;另一方面,华东内部的城、乡商品互补性强,农村供给城市粮、油、棉、盐、果蔬、茶、肉禽蛋、烟草、生丝等食品、轻纺原料,城市供给农村纺织品、纸张、机电、火柴、煤油、肥皂、卷烟、医药等民生工业品。由于区域和城乡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主体的民间性,即使在我、敌、伪、顽武装割据、城乡战争对峙时期,相互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也只是受到局部“有限管控”。正是在抗战时期,华中战略区(八大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发展多元经济基础上,以我为主、以民为本、以军为先,有限管控、兼济各方利益的经济政策指导方针,并局部取得了经济发展、货币稳定、公私两利、军民共享的空前成就。华东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指导政策,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实践基础(同期相适应的政体是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以民为本的经济路线,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在与沦陷区、国统区三足鼎立割据时期,能赢得民心,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持续发展的制胜因素。

建国初期,东北的高岗、陈云成为总领中央经济领导部门的统帅,分任大计委主任和大财委主任,是毛泽东已决心全国仿效苏式社会主义的意

志选择。

## 新四军军费筹集方式多样

新四军是1937年10月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组建的,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组建时仅有8000多人,7000多条枪。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没有地方政权为依托,没有稳定财源。军费来源以国民党三战区发放军饷为主,社会捐助和流动税收为辅。当时国军中央军小军月饷18万元,中等军是25万元,特大军达30多万元。杂牌军,如川军小军为18万元。开始只给新四军月饷6.6万元,每月分两次支付;后物价飞涨,至“皖南事变”前,全军月饷不过10余万元。社会捐赠最大的一笔为投军的泰国富侨之子陈子谷筹集的20万元。叶挺将军则用夫人李秀文筹集的资金从海外购买了500支驳壳枪。实际上,“皖南事变”前,除皖南军部和直属部队外,分布在江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鄂豫边的新四军各支队和地方武装,连基本军饷也没有,多靠向当地士绅索捐和“打资敌”(没收涉嫌通敌者的财产)解决自需,经费十分困难。

1940年3月,张云逸、罗炳辉的部队在安徽来安县半塔、定远县藕塘取得反顽自卫战胜利后,由方毅、魏文伯、张劲夫、张恺帆等先在定远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其后成立了相当地区行署级的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可以征粮、征税,自力更生解决生计。1940年10月,谭震林统帅的江南部队,在沙州县(今张家港)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并将各地办事处改为地方政权。沙州首任县长蔡辉根据谭震林指示,武装控占了港口,改组了轮船公司,联合沦陷区的爱国商绅,利用长江航道,大规模组织与上海的特种贸易。短期内,为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筹资600余万元,另筹集各类军需(西药、机械、电台、布匹、印刷纸、化工原料等)逾千吨,实实在在为新四军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抗战以来最丰厚的财源和紧缺军需品。

1941年3月军部重建,是新四军走向成熟发展的转折点。陈毅等人曾被批为“人枪款”主义的积极拓展方针,成为主流战略。至1942年初,新四

军各部队已建立起八大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都有完整的政权体系、社会组织体系、武装体系;至1942年末,各根据地都建立起完整的财经体系和军队供给、军工生产体系。各战略区的财经处为领导财经的总机构,集管理、组织、经营、调控四大职能。管理包括:经济管理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经营包括:自营型银行、企业,对外特种贸易;组织:各类公私合作社、工商企业发展和公共水利设施建设;调控:运用货币、大宗必需商品(粮、盐、棉、布等)调控市场。如1942~1945年,皖江贸易总局就利用武装封江控粮、垄断粮油对外贸易的手段,单方面造成芜湖、南京、上海粮油短缺,价格飞涨,迫使对方以低价工业品、盐、军需品换购我方高价粮、油、烟草等农副产品,实现年财政收入逾亿元的奇迹;在财政总收入中,流通性收入已占90%以上。同期,我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货币购买力,远远高于沦陷区和国统区,产生强大社会影响,赢得“富七师甲全军”的军内共识。

1943~1945年,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形成党、政、军一体化的大格局。华中财委由曾山挂帅,朱毅、方毅为副主任,张劲夫、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为委员。粟裕、叶飞领导的一师对应苏中行署(陈丕显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国栋任副主任);罗炳辉、谭震林领导的二师对应淮南行署(财政处处长陈穆);彭雪枫(后张爱萍)、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对应淮北行署(行署主任刘瑞龙,财政处处长李人俊);黄克诚领导的三师对应苏北盐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骆耕漠);梁兴初统帅的独立旅对应淮海专员公署(财经处长顾准);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领导的五师对应鄂豫边行署(财经处长范醒之);曾希圣、谭希林领导的七师对应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兼师供给部长,副处长蔡辉兼贸易总局局长);江渭清的六师十六旅对应苏南行署(财经处长李应模)。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己”: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己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和各类作坊(油坊、磨房、豆腐坊、酒坊、粉坊)。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蔬菜、10个月盐以及全年肉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全体委员合影

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缴获大量武装、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值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地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在1942~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踞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

“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简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农民总数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七师最出色。

50年后,时任皖江行署财经处长的叶进明老人回忆道:“这里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除了担心日寇、伪军或顽军骚扰之外,真是安居乐业。人民对抗日的军队和政权真心地爱戴”。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了苏中、淮南、盐阜、淮

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时财政和军需为保障,没有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持和牺牲,没有几十万默默无闻的华中财经大军呕心沥血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东财经、后勤精英们,在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二野、三、四野渡江南下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兵团运动、攻坚军事行动的后勤、财经、军火保障供给中,爆发出的巨大经济组织、协调、保障能量,是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面胜利的基本保障。据陈毅、粟裕和曾山、傅秋涛(时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的主任和司令)、刘瑞龙(时任第三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等当事人的回忆和军史记载,在淮海战役中,以山东为中心,组织动员鲁、豫、皖民兵、民工500多万,大小车辆80多万辆,参与修公路、铁路、保护通讯、运输、转运伤员。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转运伤员11万人;1948年冬季华中财委通过增发货币,支援淮海战役军用款项达642亿元。四野70万大军南下时,邓子恢(由华野调任四野副政委)主持领导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其规模之大、困难之多、组织之严密、跨度之长、范围之广,迄今都堪称绝响。随四野南下打到海南岛的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洪学智,后来成为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奠基者。

## 民生惟大的财经政策

华东财委在夺取、接管济南、徐州等战略重镇后采取的一系列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积累的城市管理经验,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为夺取南京、上海后重建经济、恢复城市管理提供了制度选择。中共接管上海前,

80%的工商精英转移至港台和海外，巨额黄金储备被国民党运往台湾，民间资本早在1948年起已通过广州大量抽逃至香港。昔时十里洋场已成空壳。面临商品匮乏、物价飞涨、黑市投机猖獗、战后社会经济秩序极为混乱的危局，华东财委精英处乱不惊，力挽狂澜，迅速取得了重建秩序、统一货币、平抑物价、打击投机、恢复工商、改革税收、改善民生等一系列胜利，建立起新经济秩序。

接管上海后，华东财委采取的几大经济措施，为改善民生起了很大作用。其措施有：一、拨巨款恢复保障城市公用事业；二、统一货币，平抑物价，以实物货币法应对通货膨胀对人民实际收入和购买力锐减的冲击；三、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大流通体制，一举平抑物价，带动了工农业、手工业、服务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促进了金融、物价稳定，长达十年之久。

南京接管后，也是从抓大流通入手，走了五步好棋。通过维持、改造，达到恢复、发展的目标。根据当年协助南京市市长、书记刘伯承主抓经济工作的江渭清（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长、政委，苏南行署主任；文革前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文革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回忆，五步棋布局如下：

一、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限期禁用并开始收兑金圆券，宣布禁止私自买卖金银，稳定了货币金融市场。二、发挥国营贸易主渠道调节市场、平抑物价的社会职能，成立南京市贸易总公司，平价抛售大米、面粉，促使物价回落。三、城乡互助，打破封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带领全市人民，通过城乡互助打破封锁，克服困难。四、疏散无业人口33万，安置就业就学人口10余万，消除了社会隐患，稳定了社会秩序。五、恢复发展工商业，对接管的旧政府和官僚资本的38家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迅速恢复生产；又先后筹建了国营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纱厂，大力恢复私营工商业，大力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有工商业快速发展。

1949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六国饭店和张治中散步时，对前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江渭清参与接管南京有如此评论：“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

华东财委在上海、南京走的几步好棋，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华中各根据地已经成为熟练运用的基本模式。如早在1943年，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七师暨皖江行署和区党委就采用了“破困之策”，其核心纲领是：在政府统一货币、统一税制、统一战略性商品对外专营、管控物流（长江航运）的基础上，以汤家沟经济特区为中心，以城、乡（敌、我）商品大流通为纽带，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此后三年，在这一经略指导下的皖江财经进入高速发展期，财力跃居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冠。

新四军和华东各战略区主政领导中涌现出一大批年富力强、力能扛鼎的治国理财领军人物。解放战争后期，二野、三野、四野大军南下的后勤保障和解放区经济恢复、建设的主政要员，多出自新四军（邓子恢调任四野大管家，李先念、骆耕漠调任二野大管家，刘瑞龙出任三野后勤部司令兼政委，曾山任华东财委主任）。华东干部的实际影响力遍及华中、华东、中南、西南、中原各大区。建国初期，曾山、陈国栋在上海，邓子恢、骆耕漠在中南局，李先念在湖北，黄克诚在湖南，张云逸在广西，曾希圣在安徽，谭震林、谭启龙在浙江，张劲夫、汪道涵在杭州，方毅在福建，江渭清、管文蔚在南京，向明、黎玉在山东，方方在广东，范醒之在中原局（郑州），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货币、平抑物价、恢复工商、繁荣市场、改善民生、兴修水利领域成绩显著，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巩固、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活不成，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现在革命胜利了，一定要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集中表达了那个时期已形成的华东共识，代表了当时华东财经工作总的指导方向——民生惟大。

## 华东财委精英的成功与失意

1942~1952年，是华中（华东）财经工作最辉煌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华中（华东）的成功经验说明，谁掌控了货币、商品、税收、交通和公用设施，谁为民谋利，谁就能取得驾驭经济全局的主

导权。华中(华东)在建立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大战略思路指导下,将“政府有限管控”与多元主体的市场经济共存发展,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将满足革命战争需要和保障改善民生两大目标,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先富民而后足兵论),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解放初期,华东财委精英荟萃,由一大批久经考验,在主政各战略区财经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对基于市场经济的生产、流通、税收、金融、外贸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中年知识型财经领导干部组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各自具有在战时经济大风大浪环境中自主领导战略区财经工作的丰富经历。二、在长期实践中,十分熟悉华东的市场经济特点、有广泛的人脉基础和社会联系。三、抗战前,都有在上海、南京学习或从事工运、农运、学运工作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文化素养较高。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中心,多元经济、文化、政治交汇冲撞、共存的中心。青少年时期成长于这一社会环境中的华东财委精英们,无疑在政治、经济、文化、视野和生活阅历、社会交流领域更具有国际性、开阔性、民主性、开放性。四、财经专业素质水平明显高于同时期东北、华北、华南、西北的同行们。这批骨干,不同于北方和南下的同行多是职业军人、政工干部、军队后勤干部转行或短期培训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群以财经工作为中心的战略区行政领导人或战略区财经工作领导人,具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聚集财富和驾驭市场经济的卓越才干。五、对长期践行的以民生为本的经略,已形成群体性共识。

这支超豪华团队的核心群体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方毅、张劲夫、陈国栋(兼财政部长)、骆耕漠、秘书长薛暮桥、办公厅主任蔡辉、贸易部部长徐雪寒、建工部部长李人俊、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工业部副部长孙冶方、财政部副部长顾准、外贸局局长杨浩庐、基建处长翁迪民、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叶进明。

如果1953年后,中国不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穷过渡,不强制性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非公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全面实行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或者像抗战时期一样,允许华东、华南、华北、西北、中南、中原、西南各大经济区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选择不同于东北的经济模式,那么新四军和华东财委聚集的这一批富有创造性的财经精英,也许会在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和国际经济舞台上,发挥重大的作用。

但历史没有给他们充分发挥的机会。在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将在全国急风暴雨般推开以前,他们的绝大多数已被动地离开本应由他们当主角的舞台。

建国初期,华东财政占全国财政的70%。但华东党政军首脑和华东财委在中财委、中计委实际没有话语权。1952年春的华东财委在“三反”运动中,以顾准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财经俊才被运动无情清洗。1952年末,大区撤销,以曾山为首的华东财委从体系上被彻底瓦解了。华东财委的主要骨干人员被分散至国务院各部委,又失去了对华东经济发展的决策话语权。在1953~1978年,华东一大批本应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领军人物中的绝大多数,相继或被整(如顾准、蔡辉、黎玉、向明、黄克诚),或被半闲置(如张云逸、邓子恢、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管文蔚、何克希),或当配角(如刘瑞龙、李人俊、汪道涵、杨浩庐、叶进明、陈穆),或被动转行(如曾山、张劲夫)。

但华东财委和华东各战略区党政军主官们在践行多元化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历史传统,并没有因机构解散、路线更张而失去传承。50年代中期,华东重臣邓子恢顽强抵制激进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遭到毛泽东痛批,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农工部长要职,被迫长期赋闲。1956~1959年,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又一华东重臣李先念不惜触犯龙颜,多次参与周恩来、陈云主张的“反冒进”、“反浮夸”、“反共产风”建言,又被毛主席当面批为“右倾”。1957年,无所畏惧的顾准,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对计划经济进行制度性批判。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许涤新对价值、价格、物价理论的研究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苏式计划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1957年反右运动狂潮中,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陈毅、聂荣臻支持下斗胆上书毛泽东,要求中科院不打

一个右派,为共和国保护了核心科技精英群体,其功至伟!1959年,安徽省委书记(抗战时期任皖江行署副主任)张凯帆不忍饥民待毙的惨剧蔓延,在安徽无为县毅然下令“解散公社食堂”,被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点名、罢官。曾因积极高举“三面红旗”被毛主席表扬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面对逾千万农民死于饥荒的灾难性恶果,也毅然急刹车,于1961年春上书毛泽东,首倡并在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制”、“三自一包”,为安徽农民自救求生网开一面。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在当时对“责任田”的肯定评价。二十年后,李先念赞其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李先念、谷牧在“文革”中,顶着巨大政治压力,为支撑国民经济不全面崩溃做了最大努力。

## 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沉寂多年后,华东财委的残臣张劲夫、方毅、汪道涵、陈国栋、李人俊、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许涤新及新四军、华野、上海地下党老战士乔石、谷牧、宋健、钱正英、胡立教、项南、任仲夷、袁庚、张万年、迟浩田等,新四军子弟辈的江泽民(皖东北江上青之子)、朱镕基(社科院工经所)、曾庆红(曾山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吴敬琏(社科院经济所,师从孙冶方、顾准)、李克强(七师子弟)、李源潮(四师子弟)、刘延东(刘瑞龙之女)、上将刘源(刘少奇之子)、上将张海阳(张震上将之子)、上将彭小枫(彭雪枫将军之子)、省长洪虎(洪学智上将之子)、中将粟戎生(粟裕大将之子)、部长陈昊苏(陈毅元帅之子)、部长范小建(范长江之子)、自治区副书记车俊(七师子弟)等相继成为30年来促进改革开放的群体性中坚力量。被闲置多年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荣毅仁、经叔平,应邓小平之请,成为新市场经济的先锋和领军者。在改革开放和反改革开放的争论中,华东系第一次成为主流派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这一群体背后的还有一大批参与创建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首脑、开国元勋,包括李先念、谭震林、粟裕、张云逸、黄克诚、韦国清、陈丕显、彭冲、廖汉生、姬鹏飞、江渭清、魏文伯等,和在军队任要职的张爱萍、张震、洪学智、叶飞、张秀(昆明军区司令员)、周克玉(南京军区政委)、万海

峰(成都军区政委)、陈仁洪(北京军区政委)、林维先(武汉军区副司令)、王集成(铁道兵副政委)、廖成美(二炮副司令)等。他们在主政一方的革命实践中,比任何人都深知民生建设是军队和政权生存、发展的基础,深知改革开放和重建经济统一战线对共和国的重要性。不为人民服务,不为百姓谋利,中共就会失去人民支持,从而失去一切。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年代还是如此。

1989年,有位资深的华东重臣曾这样评说:如果曾山同志1978年还健在,以其资历、声望、功绩、胆识、胸襟、学养、人品、经验、人脉和开放、稳健的经略思维取向,最有可能重新出山成为协助邓小平,辅助胡、赵主持、领导经济改革的总策划师。以邓小平与曾山在历史上有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江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建国初期在中财委(邓为副主任兼财政部长,曾为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三次合作共事,七大、八大共进中委的历史,此推测应该是靠谱的。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早在50年代就是邓子恢抵制农村激进合作化的得力助手。当今活跃在经济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王岐山、翁永曦、林毅夫、杜鹰、陈锡文、周其仁、王小强、张木生、白南风、王小鲁、温铁军、樊刚、卢迈、李镇宁、王振跃、孙方明等则出自杜的门下。经济学达人许小年的出位则得益于吴敬琏的扶携。

另一个观点是,中共第一代领袖中的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云和挺进大别山后的邓小平,在华东的人脉很深,思想影响力很大,华东干部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已与民族工商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阶层建立起唇亡齿寒的亲密关系;华东连、营以上干部多有初中以上文化,出身赤贫的不多。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边境贸易开放、双轨制、经济特区,到市场开放、税制改革、宏观调控、国企改革、中外合资、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金融改革等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迄今都没有超出华东财委当年曾经大规模践行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多数措施与其说是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华东制度回归更为确切。■

(作者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我和伯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通信

。 吴 昆

1962年2月23日,在全国讨论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激烈争论中,伯父吴晗对我的意见回了一封信。自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收到过他的信。因为他在写这封信之后不久,就被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1969年10月11日在残酷迫害下致死。

伯父的所有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以及千万个赞同他学术思想的正直的人们,普遍遭到无端批判及株连。许多人甚至因此家破人亡。我和伯父通信,由于直接讨论对《海瑞罢官》的批评,被我所在单位列为重点“专政”对象,隔离、关押长达15个月。宿舍被多次查抄,私人信件被没收作为“罪证”,归档列为专案。直到1979年7月,党中央为吴晗、袁震平反,又过了几个月,我这个“吴昆的问题要等吴晗的问题确定之后再定”的专案,才终于得到平反。被抄存档的私人信件方退回本人。

伯父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阿昆(我的小名):信收到好久了,因为正在检查,昨天才写好,今天给你回信。

你的意见都对,看了以后觉得你比过去长进了。

之前,在围绕《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展开的关于《海瑞罢官》的学术争论中,我接受了一些观点,认为伯父的学术思想和世界观跟不上时代潮流,认为他在学术思想上有错误。

我的问题是学术思想,也是政治思想问题。

在《海瑞罢官》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中,充分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历史观,有复古主义、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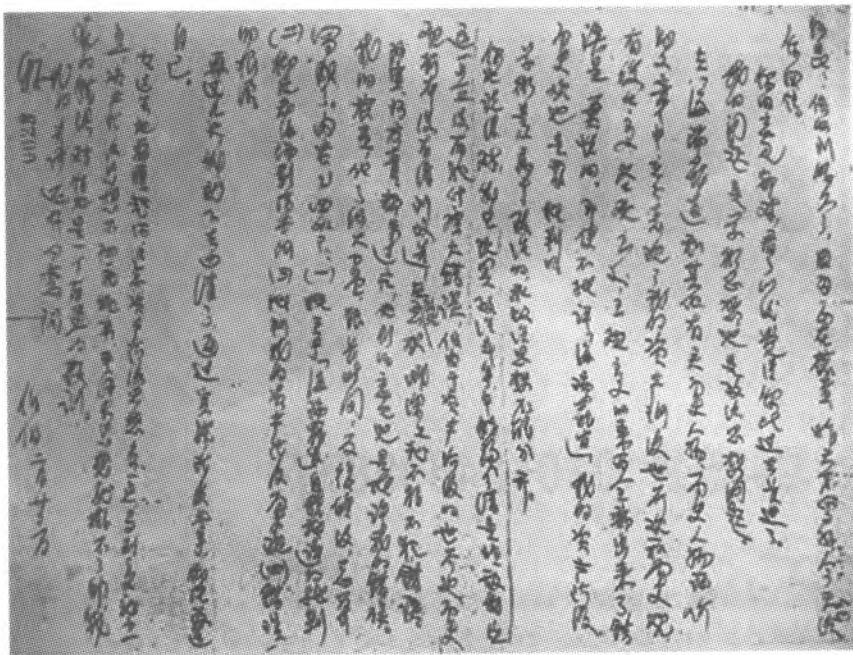
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东西,全端出来了,错误是一贯性的,即使不批评《海瑞罢官》,我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也是要批判的。

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有“清官是为帝王服务的,清官也要被否定”,“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而不应该歌颂‘清官’”等观点。

学术是从属于政治的,和政治思想不能分开。

你也说得对,我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能够分清是非、敌我,在这一点上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但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就不能不犯错误。

我去信认为:伯父从大学教授变为北京市市长,几十年来听党的话,全心全意跟着毛主席走,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根本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海瑞罢官》充其量只能是学术思想上有错误。况且他和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有来往,私交、感情都不错,怎么能是政治问



吴晗信件原件

题呢？

之后他说：

我的检查，花了很大力量、很长时间，反复修改，总算写成了。内容分四节：（一）关于《海瑞罢官》自我批评的批判，（二）彻底和海瑞划清界限，（三）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四）错误的根源。

这也是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再过几天，我就下去四清了，通过实践阶级斗争，彻底改造自己。

这就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继伯父“假（自我）批判，真包庇”之后的所谓“假四清，真保护”。北京市委因而被视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而“一锅端”下台。

最后，伯父告诉我：

在这里，也要提起你注意，资产阶级思想多一点，马列主义就少一点，资产阶级思想不彻底抛弃，毛泽东思想就挂不了帅，我犯的错误，对你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我的身体还好，勿念，问好

伯伯 二月廿三日

想不到，仅仅三年，伯父就在批斗、关押中被残酷迫害死了。时年仅60岁。

近读当代一些名人传记，得知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狂潮中，却真诚地忏悔和认错，诚惶诚恐地进行思想改造，反映了他们受现代“迷信”的禁锢，有思想上的局限性和行动上的无奈。从作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的伯父给我的最后这封信，可以清晰读出。但在那个年代，求真理、讲实话的人，谁又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呢？苍凉之雾，遍被华林，在天翻地覆之后，以传承科学文明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想继续保持思想上和人格上的自觉和独立，已经是天真的幻想。而在京剧大师马连良殷切请求下，从不看京剧的伯父，六易其稿历时半年写就的《海瑞罢官》，以历史和戏剧相结合而成的历史剧形式，歌颂为民请命、匡扶正义的清官，竟被以“莫须有”罪入狱，继而在残酷迫害中去世。

这何止是伯父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责任编辑 洪振快）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 文史资料委员会建立的前因后果

○ 雷 戈

## 一、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前

1951年,经毛泽东提议而设置了“中央文史馆”(是建国初期把一部分有影响的老年知识分子养起来的机构),首任馆长为毛之恩师、文字学家符定一。随后地方也逐渐设立各省市的文史馆(有时也叫“参事室”)。其中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虽然其人员政治面目暧昧不清,但政治立场绝不能摇摆不定。这是官方设置各级文史馆的底线。从官方定位看,文史机构与文史馆都属统战单位。其成员多具荣誉身份。对内对外发挥着某种感性化的示范效应。从工作性质看,文史资料与文史馆最为接近和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史馆就是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前身。因为二者隶属于两套不同的权力系统。从组织架构看,文史馆属政府系统,文史委属政协系统。从行政级别看,文史馆与文史委基本属于平级序列。从业务分工看,二者虽有重叠和交叉,但区别和分工还是很明显的,一般说,文史馆侧重于古代史料整理,文史委侧重于现代史料收集。但在实际运作中,特别是后来,县市一级的文史委似乎较多地涉足于古代文献风俗的征集和编写。所以,笼统说,文史委和文史馆都从事于文史资料工作。尤其是在文史资料摊子还没有铺得那么大的初始阶段,收集历史资料还是“主要利用地方政协及文史馆两个机构”。大体说来,文史馆和文史委之间有分有合,变化不定。各地情况也很不一样。有的地方是两套机构并存,有的地方则合二为一。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58年成立至文革前,“文史馆并未挂牌启印,其人员的组织关系、生活费用和文史业务统由政协代管”。又如,山西文史资料工作最初与文史馆“合署办公”,直到1980年,才与文史馆正式分家。

尽管建国初期由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一时腾不出手来全面铺开文史资料的摊子,但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还是可以做些小打小闹的工作。

比如,上海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算是动手比较早的。1953年前后,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王世英“组织了一些山西在京或在山西工作过的人士……并与在山西的一些知名人士合作,一边进行时事政策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一边就辛亥革命以来的自我经历和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情况,撰写回忆资料;有些年老体弱者,还由本人口述,组织派人记录,还对有些不能出门的知情人,派人登门访问或发信函询等。不仅写出了许多‘三亲’资料,而且还有时在山西、有时在北京举行小型座谈会,随谈漫议,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与订正。同时,还就当时能搜集到的旧政府历年的法令、章程、计划、办法以及会议记录等200余种,对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议论和印证。”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在《山西文史资料》创刊前一年,编印出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罪恶史》。1956年,聂荣臻在制定全国科技发展规划时提出“编写民国史”,不过没有下文,不了了之。另外,湖北省政协在1956年,开始征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一书。“对撰稿的辛亥老人,只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撰写辛亥革命史实,而对其历史问题不作政治上的追究。”比如,陈孝芬在日本侵华占领武汉时,曾出任公安局长,“做过汉奸”,但没有被“过多追究”,还将其撰写的辛亥史料收录书中。似见当时政治上还“比较开明”。1957年《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真实、详细反映武昌起义情况较早的一本专辑。”在个人书写历史方面,偶有个别尝试,但都是些身份特异者,比如,黄炎培回忆录《八十年来》开始撰写于1958年,“因名《八十年来》”。实际内容写的是1878年至1949年的个人经历,已将最近10年内容回避。不过从书名看,作者原来是有意将此10年纳入写作计划的。据此不难推见其官方所特别要求的一些必要内容和主导立场。范文澜在评论李六如的《六十年之变迁》一书时,就特意强调,“他的著作里揭露社会、家庭以及他本人黑暗处,表现得非常大胆勇

敢”，并认为“我们既然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怕揭露任何方面的黑暗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之一”。

文史资料机构设置的初衷本身就包含有思想改造的深层意图。所以，频繁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参观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改造作用。政协通过各种名目和形式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参观来联系和掌控各界人士的最新思想动向。如果说政协建立学习机构是思想改造的第一步，政协创设文史机构则是思想改造的第二步。二者通过前后递进而表现出层层深化的关系。1956年6月14日，北京东四政协的一次常委会“决定加强和各界人士的联系，方式是组织他们政治学习和对新事物参观活动。当年就联系了500余人，后来逐年有所增加，1958年增加到800多人。还有两个民革支部也借用政协会议室活动。”考虑到有近千名各界人士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就按界别组成了19个学习组。政治学习是确立现在政治立场，文史资料是用现在政治立场去改写历史。作为意识形态配套工程，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文史资料，构成三位一体的相互支撑关系。

## 二、文史资料委员会建立的复杂动因

依据自我定位，政协没有修史任务，“仅仅是动员、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和政协联系的各界人士”来撰写史料。这样，设立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有组织地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士来执笔撰写自己的历史，便成为一种新型史料工作，更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创举。所以它批评“不少人过去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以为：‘在群众中搜集史料就如同写诗经时搜集民歌一样’，看不出‘是伟大的创举’”。这里的认识分歧在于，人们的确没有深刻意识到这项创举的创意就是开创了思想改造的全新方式。“广泛发动各方面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特别是过去统治阶级方面的种种内幕真相由当时的有关当事人亲自提供出来，这是前人修史所未曾作过并且不可能作到的事情。”对于撰写史料所具有的这种史无前例性质以及现实可能性，官方的评价是，“这不但是一件我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而且在解放以后的建国初期，也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工作；只有

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各界人士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形势下，这个工作才有了广泛开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其真实动因恐怕相当复杂。

据我看，直接动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来自域外，比如，1959年原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与历史学家唐德刚开始合作口述自己的历史，这就是后来定本的《李宗仁回忆录》。一个来自国内，如何妥善安置即将特赦的一批战犯，是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前者虽源自外部，但并非外因。毋宁说它倒是更为内在。它给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机构的设立以最初的刺激，甚至是某种意外的启发。这使得1959年建立这样一个官方的新型历史编纂机构具有某种时间上的偶然性。但官方却对此做出了某种必然性的解释。1959年政协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0年建设时期，“这个形势除要求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政协协商、民主监督这个主导作用外，还要求从各个方面发挥它人才荟萃的优势，其中就包括了让一些阅历丰富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将他们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的经验，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这个说法似乎对1959年政协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给出了一个解释。

除了这些宏大政治背景外，在1959年开始设置文史资料委员会肯定也会有些重要的甚至关键的个人因素，首先它与身兼政协主席同时又是倡议者的周恩来个人的特殊考虑直接有关。比如，他从京剧演员程砚秋去世“而生前没有多收徒弟和录下唱片一事得到启示，感到有些史料如不抓紧收集，过若干年之后就会消失了”。但也绝不会这么简单。很可能也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想法（虽然现在尚不清楚这件事与毛泽东有何关联，但它必须经过毛泽东的首肯则无疑问）。

毫无疑问，周恩来在文史资料中的某种决定性作用，具有至为深刻的历史意义。不过人们对此至今尚未有一个清楚认识。如果说毛泽东通过正史控制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周恩来则通过野史操控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如果说毛泽东给中国人提供了正统的历史理论，周恩来则给中国人提供了正统的历史记忆。■

（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如何跳出反腐困境：建党 90 年的思考

○ 李永忠

## 制度反腐难以破局，反腐倡廉陷入困境

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年的历程中，无论区域性执掌政权，还是执掌全国政权，反腐败不仅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任务！在这 90 年中，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主要以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运动反腐（主要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运动为载体）、权力反腐（主要以领导者的认识、决心、关注度和手中的权力为载体）。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由于旧的载体——战争已经远去，群众运动不再采用；而新载体——制度，却因改革严重滞后而未能成为有效载体。因此，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已成为历次中纪委全会报告以及向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着……

面对易发多发、不断滋生蔓延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力图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去打赢这场反腐败之战。但是，在缺乏全党形成统一的共识，缺乏顶层制度的战略设计，缺乏建立政改特区的体制改革试点支撑的情况下，为不辱使命，一方面通过力所能及的探索，去公开规范削减政府行政审批权力；通过党委会票决制等形式，加强对“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事权的集体决定和监督分量，尽可能减少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

努力工作，不断加大斗争强度、惩处烈度、打击力度，以尽可能保持对腐败的相对高压态势。于是，费用不断追加，机构不断扩编，级别不断提升，人员不断增加，专门从事纪检监察的干部，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几万人，扩充到目前的几十万人……

但是，由于制度反腐尚未通过改革有所实质性的推进，期望的结果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没有出现量的向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么多年来，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越来越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中越来越频发严重腐败案件，但是，几乎没有一起是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揭发出来的！于是，30 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四个字：仍然严峻！或许，“仍然严峻”并陷入困境的反腐败形势，是体制、制度仍未有实质性改革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沉重注解！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体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观层面的机制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操作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乱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到基层监察效能情况……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宽，纠风的事越来越细，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也越来越疲于奔命。于是，8 小时内的监督明显受阻，有的就转向抓 8 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

在目标锁定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这种靠投入更多财力物力人力的高成本反腐方式，有如扬

汤止沸,难以持续发展。反腐败不能再采用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了。不能只用加法,必须加减乘除并用。

## 预防腐败知易行难,应设“特区”探索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以上2003年与2010年腐败高官数据对比转引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3期师索《省部级贪官死缓对比:从2个到7个的背后》一文)

对于火灾、疾病、事故等等,人人知道,必须预防为主。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后,对于反腐败,十六届中央纪委几经努力,在不断统一思想的过程中,才第一次在反腐败的战略方针中提出“注重预防”(尚未形成预防为主的共识)。30年改革开放中的反腐败,从只重治标,到标本兼治;从重视办案,到源头治理;从惩防并举,到注重预防;从一个注重,到三个注重(注重预防、治本、制度建设)。但是,预防腐败的工作怎么搞,始终还是未能破解的难题。各地各单位多着眼于教育和技术层面的预防。即使不少具体工作走在前面的上海,在预防腐败方面所能开出的,也不过是“制度+科技”的处方,而其所称的制度,大多是制度的浅层次含义(多为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与改革制度的实质——即改革

权力结构,还有相当距离。全国各地,由于缺乏体制预防,特别是制度预防(即通过改革权力结构来预防腐败)的试验田,因此无法根据试验田的收成及时提出“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

30多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特区深圳”,在纪检体制改革上,也缺乏类似的“小岗村”。没有特区的试点和比较成功的样板间,“注重预防”大多只能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而很难落实在行动上。在反腐领域,还形成不了一个以“预防为主”的共识,实质性的工作也难以推进。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经改特区的“样板”,而严重缺乏政改这方面的体制、制度改革试点(政改特区)的有力支撑!没有政改特区作为孵化器,综合性、复杂性、艰巨性远远大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则很难推进,并更难巩固!

30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一针见血指出,我们各种错误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而且明确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改革开放从党内分权起步的先河,我们应当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党内权力结构,实现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党内民主就能有存在的空间,党内民主就能有发展的时间,党内民主就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健全的党内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民主也就能真正由党的生命成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 努力探索减法之路,科学分解党内权力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式,走一条减法之路。也就是科学分解党内权力。

一说分权,几十年的习惯性的思维是怕弱化权威,习惯性的做法是头痛医头分事权。既然“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想出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招数。殊不知,“一把手”凭借过分集中的权力,让更依附于他的人掌管人、财、物,效果远胜于他自己直接分管。

中共建党90年执政60多年,已到了必须认真研究并实践党内机构分权的时候了。由于权威

高度与权威管辖面积成正比,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在保持中央和省委现有领导体制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在市、县委搞试点来探索经验,寻求从办案的思维转向监督的思维,从峻法转向预防,从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从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从事后转向事前。

当然,这种从扬汤止沸到釜底抽薪的转型是个痛苦的过程。但不走这一步不行,想走这一步,却不想改革体制、制度也不行。

现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党委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马克思在140年前对72天巴黎公社“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赞扬,成了各执政的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经典模式,也成了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必然宿命,还成了改革中力图绕着走的雷区、禁区。

其实,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是在战争压力下采用的权力结构,是其情可原、其时很短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保证公社的成功。前苏联照搬“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并由此而形成“苏联模式”。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也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苏东剧变令人深思。

如果考察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可以发现其权力结构设计颇有可取之处。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同时,也完备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皇帝拥有决策权,宰相郡守县令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权,同时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独立于行政官员的御史制度,并赋予其监督权。但现在很少有人研究秦汉以来的这笔历史遗产对现实制度设计的借鉴意义。

无论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还是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现在党委成为同级纪委难以监督的对象。之所以难以监督,是因为地方各级党委是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中于一体,而在这一体之中,又往往集中于被称为“一把手”的一个人。

尽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还没有出现“一把手”这个称谓,但如果不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

“一把手”会凭借其越来越大的张力,最终挤进中央的正式文件。于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演变成不再是一名普通成员的“班长”,进而再进化为凌驾于班子内所有成员之上的“一把手”。为了使这种凌驾能合理合法,个别地区的“一把手”通常还要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头衔。

诚然,个别地区的“一把手”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头衔,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非常态的现象,一旦常态化并固定下来,弊大于利则是必然的。对个人而言,权力肯定会成为监督的死角禁区;对组织而言,党内民主肯定会受到削弱和重创。杜世成如此,陈良宇也是这样。另外,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加挂的利弊得失也值得研究并权衡。

在这一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执政时间越长,党委“一把手”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越长,权力的含金量就越重;不仅会加大腐败的几率,而且会引发分裂的可能。其根源无不出自“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

改革开放前的“文革”十年浩劫,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总病根”的认识已经十分到位。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总病根”。地方党政各级“一把手”的集权程度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于是,小病慢慢酿成大病,违纪渐渐形成歪风,腐蚀逐步成为腐败。虽经组织部优中选优,并经党委、纪委严格把关,“一把手”犯错误的比率仍然高于一般普通党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通常占同级别犯错误党员领导干部的4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超过50%。

事实证明,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合理的权力分解,必然经常发生错误;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

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

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于是,称谓上,“书记”变成了“老板”,“老板”又变成了“大爷”。权力所内含的独占性、扩张性、排他性,在这“总病根”的催化下,对内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外先滋生跑官要官,再蔓延成买官卖官,最后发展成骗官杀官。

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内的决策、执行两权必须分开!

## 党内分权监督制衡,县级党委先行试点

由于长期执政,党内又缺乏分权制衡,地方各级“一把手”已经渐成高危岗位!2006年以来,河南省先后有22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一把手”成为腐败分子。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刑拘后,竟作如此狂言:“我要是真进去了,茂名官场就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腐败不是官,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吗?我敢肯定,我的下任绝对还是。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对于党内分权,半个世纪前的党的“八大”有过尝试。设立了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设立了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设立了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还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关于设立“党内国会”的构想及其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也很快就戛然而止。

至于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孰先孰后?80年代也是有过教训的。当时,在党内还没有科学分权、党政还没有合理分工、党的肌体还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就仓促提出党政分开,结果欲速而不达。

党内分权怎样才是科学合理的?可向现代企业借鉴。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常常走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前面。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

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等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可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

在县级党委进行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试点,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在市县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要求,也遵循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还能有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通过党内科学分权,逐步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再到完成党政分开。这分权、分工、分开的过程,既是有效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切实恢复党员主体地位的过程,还是从战略层面上真正实现预防和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过程。

首先,由县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内的三个委员会(党内原有的县处级职数可不必增加)。一是县委会(党内决策机关),由15~21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是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县委会成员中唯一的县处级干部,但他的一票与其他委员的一票无异。因此,这时的县委书记,也就真正具备了兼任县人大主任的基本条件。二是执委会(党内执行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首长负责制,由现任的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执委会书记,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三是监委会(党内监督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纪委书记改称监委会书记。

其次,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县委会代行其职权,县执委会和县监委会向县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最后,县监委可以对党内专门的执行机关——县执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同样县执委也可对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县监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制衡。

诚然,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查办案件。但是中国反腐战略的取胜之道在查办案件之外。精通平仄未必能写出好诗,因为好诗的功夫在诗外。

为此,要跳出反腐困境,最需要的是反腐战略思维的创新,是反腐体制的创新,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语)和创新!■

(作者为中纪委培训处处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谨防改革走偏

○ 张千帆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关于改革是否走偏的争议也日渐增多。本文想就改革为什么可能走偏,以及如何避免改革走偏,提供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 一、改革走偏已有迹象

在最近的30年中,大凡提到改革都是正面的评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并不是说凡是冠以“改革”之名就一定都是好的。为此,首先要确立一个评判改革是好是坏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基本评判标准。所谓“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指大多数人。如果通过改革,我们中国13.7亿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受益了,那就说明改革是好的。好的改革必然会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糟的改革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所以评价改革的最高标准当然是人民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去评判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它到底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这不能简单下判断,而要把改革分为不同阶段。30年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的10年,后一阶段就是后来的20年。前一阶段看上去改革是越改越好,但是随着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人民的利益和官员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改革一度中断。这是因为社会上已经有太多腐败,比如“官倒”,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利用价格双轨制赚钱。社会不能容忍这种腐败,人民的抗议声是很强的。

至于改革后20年到底是好还是糟,那要看对谁而言。对官员,自然是好的。还有少数的暴发户,比如煤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自然也是好的。对老百姓来说也要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好了,实

际上则未必。好在哪里?首先,经济迅速增长,老百姓或多或少能从中获益。其次,法治上,立法在这30年当中制定得非常快,法治理念也越来越普及。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我们有多少实质上的进步还很难说,某些方面甚至可能还退步了,尤其是我们经济总量的增长不仅没有带来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有所降低。事实上,社会资源、收入和职位分配都存在不公,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房价的增长,房子、学费、医疗多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感觉不到生活的幸福或乐趣。另一方面,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征地拆迁产生了太多的悲剧,构成了现在社会稳定的首要隐患;重复建设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即便这些问题都不谈,光是说中国今后的物质生存环境,就非常令人担忧。如果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一连串折腾,我们还“家国破碎山河在”,几十年不受控制的非理智发展却可能摧毁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如果到那个时候,空气不能呼吸,水不能喝或不够喝,食品里都是三聚氰胺、瘦肉精、有害添加剂……我们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呢?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些绝非危言耸听。

在法制方面,立法体系总体上是越来越好了。法律有些规定存在不到位或者超前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肯定比以前好;不少立法规定了很先进的理念,但问题是这些良好的法律得不到落实。中国法制改革的规律是良法难落实,恶法则落实起来尤其快,所以说这也是表面上好,但实际上不如立法表面显得那么漂亮。2010年《代表法》的修改显示,个别法律的修改甚至不进反退,连漂亮的文本表面都维持不住。目前这只是少数现象,

但不知道今后一段时间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越来越糟的另一个表现是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约束,公权滥用、贪污腐败日趋严重;司法不公仍然普遍存在,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司法改革十年之前满怀希望,十年之后不能说一点改善没有,比如说至少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考试,但是改善很有限,大都也局限于表层。司法人员的外观得到改善,看上去更像一个法官了,脱了军装大盖帽,穿上了法袍……但是法院和法官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独立,而且近年来甚至连不断进步的司法观念都有所倒退。十年之后,我们走到了一个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

## 二、改革走偏原因何在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近几年在某些方面改革越改越糟?其实近年看到的只是明显的迹象,倒退的伏笔早在20年前就已埋下了。

30年改革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后20年改革在本质上和前10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前10年改革是由民间推动的,而近20年的改革是由政府官员主导的。如果要找一个标志性的制度,那就是1993年开始系统实行的干部考核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实行系统的干部考核制度,把官员的利益和改革的力度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尤其是使GDP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这主要是落实邓小平南巡的思想,因为大家知道他说过“发展是硬道理”;所谓的“发展”不是指制度发展,而是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GDP上去了,工业上去了,国家实力更强了,这才是真正的发展。所以GDP成为评价官员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领导升迁至少要把GDP搞定,如果这个地方GDP不升反降,那么这个官就不好当了。

作为客观的经济数据,

GDP确实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直接的。GDP只是一个数字,是衡量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指标。问题是一旦它成为中央衡量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GDP就可能变成畸形增长,而不一定代表社会财富的真正增长。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对地方GDP有很大贡献,地方官员就有很大动力靠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获得GDP增速,美其名曰“发展”,但实际上是在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以及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悲剧,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近年我国的维稳费用不断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本来可以用这个钱去改善民生,但是现在不得不耗费巨大的成本,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为什么倒退的改革能继续进行?关键原因在于人民缺位,人民缺位必然导致改革倒退。这种倒退可以从很多具体制度上看出来。比如2001年的《城市拆迁条例》就是缺乏人民参与、没有广泛征求民意的体现。原先实行实物补偿,拆一间房子补你一间房子,这样至少被拆迁户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尽管利益很可能还是受损;后来拆迁改为货币补偿之后,争议就更大了,取消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造成了很多的悲剧,直接导致



2009年11月13日,为阻止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强拆,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11月29日医治无效死亡。上图为自焚过程视频截图。

了补偿不足和“土地财政”。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不受控制的征地拆迁权力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千家万户的焦虑、紧张和悲剧。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拆迁条例之所以难改,至少部分是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分税制改革在制度意义上是有必要的,但问题是最后的效果却是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在总收入中比例递减,中央收入占财政总收入递增。拆迁条例的修改之所以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的税收不足,所以地方政府对中央施加压力,导致新条例迟迟不能出台。要有效防止唐福珍这样的“血拆”事件重演,必须大幅度削减土地财政,但这恰恰是目前地方财政的命根子。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依赖土地财政?根源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是一次良性的制度改革,却造成了恶性的分配后果,加剧了地方政府大兴土木、征地拆迁并压低补偿的冲动,通过各种办法向人民伸手。分税制改革在当时广受称赞,甚至有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称。然而,联邦主义强调地方自治,强化地方的实力,但是我们的分税制改革却恰好相反。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完全是财政中央主义。

在没有人民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分税制改革不但没有强化地方税收,反而强化了中央财权。实际上如果没有人民参与,不仅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得不到合理分配,整个国家税收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国家财政增长过快意味着国富民穷。更重要的是,这个税被收上去之后,用在哪些名目上?在中国,钱怎么收是个问题,但相对来说是一个小问题,钱怎么花才是大问题。中国各级政府财政总收入巨大,但巨额税收究竟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国家该投入的地方没有投入,譬如社会保障很少。生活在中国社会,没有谁会靠政府发的养老金生活。在中国是生不起病的,生一场大病就能把你弄得倾家荡产,因为医疗保险不到位。在加拿大,一个月交50加币,看病全管了,当然药还得自己掏;但是不管得了什么病,至少看病基本上免费,自己只要花10块加币的挂号费。孩子在那里上中小学也是完全免费的,真正实行“义务教育”。在我们国家如何呢?

经常报道教育乱收费,其实即使正规的收费也很高。农民工的孩子进城打工,子女还不能就近入学,如果送到一般城市中学上学还得交“择校费”等各种昂贵费用。环境是越来越糟了,可见环境保护不得力,部分原因是片面强调GDP增长的政绩体制拉动工业和污染,部分原因是政府监管和治理投入严重不足。生产安全近几年有所改善,但是问题还是很多。食品卫生也是间歇性地爆发这样或那样的事故,像三鹿奶粉事件或食品添加剂问题,表明我们的食品卫生监督投入严重不到位。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大家没有看到一起诉讼,不是因为我们的法制意识差,而是政府强令行政了结,每个患病婴儿发2000元打发了事,堵塞了诉讼途径。

所有地方公益领域都需要政府用收来的税收为老百姓办实事,在食品卫生、环境保护、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很多领域需要大量投入,但是我们看到没有足够的投入。大量的资金却被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维稳、“三公”消费、贪腐,这些都是我们制度造成的成本。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国家在国内外长治久安,许多成本本来可以避免。我们自己的制度缺失造成那么多的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导致不得不大面积浪费钱。还有各式各样的腐败,当然还有官员的灰色收入,所有这些都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问题黑洞,最后都得由老百姓买单。

即便对于那些公开的财政预算,比如说社会福利,你也很难弄清楚这些财政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医疗开支真的用在公共医疗上了吗?普通老百姓看病真的得益了吗?未必,很多钱都花在干部疗养上了。我们各级干部的花费是相当惊人的。去年夏天,德国宪政法院的前任大法官来北大讲学,告诉我们他做大法官的时候是自己找公寓、自己开车上班。他至少相当于我们的部级干部吧,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级别,社会威望更不用说,在德国却是这种待遇,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人民付出了,不仅通过正式纳税,还有各种收费。老百姓把钱交上去了,政府就该包办养老、医疗、教育,但是它不管,人民不得不再次付出。

越改越糟不是偶然现象。首先,改革不是革命,不是把现有的体制一脚踢开,而是在现有体制之下改变目前的这种利益分配格局。良性改革

对人民有利,而我们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民多得一点,官员就少得一点,所以良性改革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触犯既得利益。其次,既得利益者是理性的,不会任由人民限制他支配利益的权力,所以会不惜代价地维护自己的权力。最后,既得利益集团中间也有想做事、有良知的开明人士,想把这个国家改得更好,让改革对人民有利。问题是这些人势孤力单。

### 三、如何避免改革走偏

如何避免改革越改越糟,使改革越改越好?目前虽然也有“微博”参政等新苗头,但是公民参与动力和压力还远远不够,所以地方官员在决策过程当中依然我行我素,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政策自然未必会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而更符合官员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呢?希望当然是有的。之所以会越改越糟,归根结底就在于人民没有参与。如果人民实质性地参与了,就能扭转这种趋势。30多年前的小岗试验就向我们展示了人民参与的重要性,它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只有在人民的有效参与之下,改革才能对人民真正有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就巨大,不仅解放了亿万农民,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公民参与有所加强。尤其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之后,开辟了一条民间的宪政路径。

由此可见,改革越改越好的必要条件是人民有效参与改革的进程。人民如何参与改革的进程呢?首先,必须让人民说话。如果不能讲话,那么民意怎么表达出来呢?执政者又如何了解真正的民意呢?人民必须有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其次,人民表达民意之后,这个民意还得通过各种渠道才能受到政府的重视,最主要的就是宪法规定的代议制度。但问题是人大制度不工作,基本上是个摆设,人大选举也是走过场,所以说目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各级官员唯上不唯下的状况。要让民意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打通人民影响政府的渠道,主要是完善人大选举。今明两年又要举行五年一次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国还是有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如果中央真想把改革越改越好,是有能力采取措施促进公民参与的,至少不要对公民参与造成障碍。

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不能寄望于出现一个开明领袖,而要靠人民的自觉。目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首先,人民中间需要形成共同的基本是非判断,各自以自己的方式遵守这个底线。没良知的官员还会继续贪污腐败,但是有良知的官员可以大刀阔斧去搞地方改革。在这个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良性的淘汰机制。良性环境如何形成?关键还是在于官员评价要由老百姓而不是领导来决定。

这就需要老百姓不做专制社会的臣民,而要做民主社会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就是要懂得如何行使宪法赋予的那些权利;宪法给了你这个权利,你就要站出来行使。当然,在目前制度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维权是有一定风险的,但要是没有人敢承担一点风险,那么老百姓维权就永远没有希望。相反,敢于站出来的人越多,维权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小,国家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即使目前不能主动站出来竞选,至少也要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即便是“围观”也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表达自由。人大换届选举的时候,至少出来投一票,哪怕这一票不能改变什么。

其次,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是学者和媒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学者尤其是宪法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中国的言论环境,和负责任的媒体一起坚守言论自由的底线。

因此,关键在于政府和人民之间要形成良性的互动,人民不能只做被动的看客。从戊戌变法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太多次的看客,就好像电影院的观众,眼睁睁看着银幕上的坏人举枪瞄准了好人,任凭坏人杀了好人,因为我们根本不在舞台上。这就是中国悲剧的根源。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使人民成为竞争的评判者,对于为民谋利的良性改革给一点鼓掌激励,对于为官牟利的恶性“改革”同声谴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改革走偏。■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 茅于軾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唯独美国没有)。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侮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20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还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却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6000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接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30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数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

可收拾?在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而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货币资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之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不抵抗政策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蒋介石不愿抗日的理由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200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死亡大约12.5万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

# 在胡耀邦家做客

○ 陆魁宏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信是这样写的:

耀邦同志: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了,我们全省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决心把学习毛选五卷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起来,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现趁《新湘评论》负责文史哲方面的陆魁宏同志去京之便,带去《新湘评论》一至四期,请收阅,并多提意见。另外,还想从中央党校要一些理论学习和历史资料,请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详情由魁宏同志面述。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张平化,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平化同志要我送《新湘评论》杂志给耀邦同志,有点背景要交代一下。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认真

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

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过程中,我们全党,从中央到地方,从思想工作部门到其他各个工作部门,都要把理论工作切实地抓起来。”并且明确指示:“要搞好报纸的理论宣传,办好理论刊物,努力提高它们的水平。”为了认真迅速地贯彻执行华国锋同志的指示,经省委常委研究,决定从1977年1月起,将1960年创刊、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刊名的省委机关理论刊物——《新湘评论》复刊,由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亲自担任刊物的编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万达、李振军同志担任编委会副主任。我启程赴京的那天,刊物正好出了一至四期,所以要我带去,听听耀邦同志的意见。

平化同志怀着深情要我去看望耀邦同志,我知道他们二位是老相识、老战友。早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跟着毛委员战斗在一起。耀邦同志1932年就在湘赣省委中央苏区做少年儿童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是红军中有名的“红小鬼”。平化同志1928年就任井冈山地区酃县县委

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统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宣传部长,1930年任酃县县委书记,1931年任酃县游击大队党代表、湘赣省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参加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反“围剿”斗争。1977年秋平化同志调任中宣部部长前夕,他正在酝酿写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章,因此要我陪同他去井冈山和酃县老家看看。车子在黄洋界停下来,我们下车看景观,平化同志说,井冈山一共五大哨口,他守过三大哨口。他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毛主席1928年秋天写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平化同志笑着说,主席作为诗人,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黄洋界上炮声隆”,很有气魄,其实当时我们红军的武器主要是梭镖、马刀和鸟铳,一共只有三发炮弹,反“围剿”时,第一发炮弹没有打响,第二发炮弹打响了,加上在洋铁桶里面燃放鞭炮,以为是大炮加机关枪,把前来“围剿”的敌人吓跑了,第三发炮弹现在还陈列在南昌革命博物馆。

在湘赣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时,耀邦和平化二位都被王明“左”倾路线打成“AB团分子”,差点杀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谭余保同志出面辩解证明,耀邦同志才幸免于难。当时平化同志也险些被当成“AB团分子”杀掉。在陪平化同志重游井冈山的路上,平化同志讲了一段故事:我在酃县当县委书记期间,湘赣省委派王震同志来到酃县,已经带了命令要抓我,解决我,把我作“AB团分子”论处。王震同志粗中有细,他一考察,认为我不像反革命,坚守革命根据地,打仗很拼命,没吃没穿,无名无利,钻到红军里面来求个什么喽!所以他杀不下手。但是,接我的手的县委书记他已经带来了,怎么办呢?他就自作主张,做出决策,说,省委决定调动你的工作,不当县委书记了,专门带游击队,当党代表。那时王震同志是独立师政治委员,工人出身,那时工人出身是块金字招牌,加上打仗勇敢,威信很高。他对上面也有个交代,就说,我把他的县委书记撤了,把他解决了。这件事的真相是到1942年延安整风,清算王明“左”倾路线时,作为肃反扩大化的例子,王震同志才讲出来的。平化同志说,我感谢王震同志刀下留人,救我一命。耀邦和平化,二位都是王明“左”倾路线刀下的幸存者。后来,他们二位跟随毛委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耀邦同志

下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1959年9月起任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兼任湘潭地委书记,华与胡二位地委书记合作得很好),这期间平化同志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他们彼此间有着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平化同志要我代为看望,让我当一回两位老井冈、老红军、老战友交流情感信息的传令兵,我深感荣幸!

耀邦同志是1977年12月任中组部部长的,当时还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校长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汪东兴)。住在《红旗》杂志修改文章,花去一周时间,到4月23日,我打电话给中央党校总机转耀邦同志,开始是秘书接电话,我正在通报情况,大概耀邦同志就在电话机旁,听到湖南省委平化同志写了信来,抢过话筒就对话,“我是胡耀邦,你是哪位?”我说我是湖南省委机关的干部,带来平化同志写给您的一封信,还送您几本刚印出来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耀邦二话没说,要我马上来。我和郭叙编马上乘公共汽车直奔中央党校。耀邦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接过平化同志写的信和搭来的《新湘评论》以后,问了问湖南的情况,然后看看手表,说:“这样吧,今天时间不多了,明天是礼拜天,到我家里去,吃中饭还是吃晚饭由你们定。”我说,明天去府上拜访我们高兴,但吃饭就不麻烦您了。他说,湖南老乡来了,一定要吃饭。没有什么招待,只是还有点湖南腊肉,是湖南老乡搭来的。说起湖南腊肉,我想起一件事,原来耀邦同志在湖南工作时的司机王成贵,给耀邦寄过几斤腊肉,还要我代笔给耀邦写过信,而且后来耀邦给王成贵回赠一份厚礼,寄给两件毛衣和两枝钢笔,说是给老王的孩子用,老王又要我代笔写信给耀邦表示感谢。于是我问,王成贵给您寄过腊肉,他写信给您还是请我代笔的哩!耀邦笑了笑,问道:王成贵现在好吗?我说他现在给平化同志开车,很好,很想念您。我们就约定好次日到耀邦家吃晚饭,要我们次日下午在住地《红旗》杂志招待所等候,由梁秘书来接我们。

4月24日下午4时半,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副书记和中央部门领导)来沙滩北街2号《红旗》杂志招待所接我们。他是走路来的,因为这里离耀邦家灯市西口富强



胡同6号很近,走路一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下午不到5点,我们同梁秘书一起步行到了耀邦同志家里。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正中是堂屋、客厅,院内南面的墙壁是木质结构的花窗,院内两边厢屋,一边是办公室和卧室,一边大概是生活设施,室内摆设很简洁、古朴。

梁秘书安顿我俩坐定之后,耀邦同志和老伴李昭同志出来了,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俩坐在宽敞的红木椅子上,热情和蔼,平易近人,使我们有一种亲切感。耀邦同志首先以沉重的心情谈了毛主席去世后,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国人心中的忧虑,对华国锋同志临危受命的难处和肩负的重任表示深切的理解,对于华国锋同志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举解决了“四人帮”问题,十分称赞和钦佩。湖南省委在加强理论工作、办好理论刊物方面很积极、很主动、动作很快,《新湘评论》很快就复刊了,而且很快就组织撰写了一批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对此,他给予充分的肯定。

谈到写文章,耀邦同志说,有一个文风问题,十多年来,文风被“四人帮”破坏得很不成样子,“四人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成了统治思想,我们的一些同志受了影响,一定要改变过来。写文章,题目可以小一点,内容一定要充实。如果内容不充实,只讲一些表面的东西,群众会反感。比如鲁迅写的《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题目很小,但内容写出了章太炎一生的主要东西。又如《纪念刘和珍君》,题目很小,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

耀邦同志赞扬华国锋同志有主见、有原则。他说,1966年底,华国锋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一些看法,有些事赞成,有些事不赞成,对林彪、“四人帮”那套搞法不赞成。毛主席回了信,同意华国锋同志的看法。说明华国锋同志有独到之见,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随风倒的,是坚持原则、坚持唯物主义的。信你们看到没有?我回答,没有看到。耀邦同志说,1967年或1968年,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谈话,毛主席说,我谈革命,你谈生产。华国锋同志说,生产不抓上去,各方面都受影响。后来毛主席同意了华国锋同志的看法,批了报告。在领袖面前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条不容易做到,说明他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我插话说,华国锋同志敢于讲真话是

出了名的,毛主席表扬过他。1961年过苦日子时,毛主席到了长沙,把华国锋同志找去问情况,华说,人也瘦了,牛也瘦了,田也瘦了,要恢复过来不容易。后来毛主席逢人便说华是老实人,因为他1961年讲了实话。耀邦同志听得很有兴趣。他接着说,华国锋同志同毛主席接触很多,有些情况我们了解不了解?比如,毛主席为什么要华国锋同志当公安部长?我们对华国锋同志还认识不深,人民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谈话中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搞了三个文件,一个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个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您当科学院党委书记时搞的,也被说成是一株大毒草,拿到下面去批,批不起来。耀邦问,为什么批不起来?我说,文件把科研的地位提得很高,说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文件说要不断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要几年加一次工资,两地分居问题要逐步解决。许多科研人员说,这不是很好吗?怎么是“大毒草”呢?把“汇报提纲”一批,您在全国的名气反而更大了,群众更加了解您、喜欢您了。他听着听着,若有所思,站起身在厅里来回踱步,穿的一套灰布解放服,裤脚可能长了点,被踩在脚跟底下。他说,我这个人,三分实,七分虚。三分实是:第一,对林彪、“四人帮”,从来不尿他们;第二,他们称霸,我从来不向他们低头;第三,文革那么乱,我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这几点是实在的。但七分是虚的,不能把群众的鼓励和赞扬看成自己的优点,应该有自知之明,不然就会忘乎所以。他接着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华主席叫我搞的,当时华管这方面的工作。华叫我搞个主见性的报告,要我搞三千字,后来我越写越长,搞了八九千字。“四人帮”搞我,我算老几?其实是搞华。

耀邦同志接着说,对待群众运动,“四人帮”压群众,骗群众,打击老干部一条,就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其实他们最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他们同群众有根本利益冲突。

耀邦同志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找平化同志谈过两次,说他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了。

我插话说,到现在还兼着。耀邦同志说,我看,即使兼,也不存在不放手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点、一个部署,下面有什么反映?正面的,反面的,提出些什么问题?心里有个数。耀邦同志说,问平化同志好,我就不再写信了,请你转达一下。一个是平化同志要学习材料的问题,过去党校搞的那些东西,什么“唐晓文”、“辛风”,都有问题,甚至严重问题,经典作家一些著作都给他们解释歪了,不能相信,所以,他们那些东西,不能再扩散,你们这回得空手回去。4、5、6这几个月,党校主要搞整风,7、8月开学,怎么个训练法,以后要搞个意见。这次你们空手回去,以后有新材料再说。另一个是希望平化同志多同中央取得联系,多通通情况,及时了解上面的精神有好处。他同华主席应该经常有联系吧。有必要经常了解些扎实的材料,总结些经验,提出些看法。

最后,耀邦同志还特别嘱咐我:“问谭老好,易大姐好,谭老很关心我。”谭老,是指谭余保同志,据说在革命根据地,他36岁时大家就称呼他“谭老”。当年在湘赣革命根据地耀邦被“左”倾路线打成“AB团分子”时,谭余保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出面辩解,救了耀邦一命。解放后谭老当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80年1月病逝。易湘苏大姐是谭老爱人,在延安结婚的,曾任359旅供给部生产指导员、中央组织干事,解放后任湖南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78年3月病逝。在耀邦家做客回长沙后,我专门去老干所拜访了谭老和易大姐,转达了耀邦同志对他们的问候和谢意,他们十分高兴和感激。

那天,我们在耀邦同志家里坐了三个多小时(中间一起吃饭),我发现,住处没有警卫人员,来人随时可进屋,均受到热情接谈。三个小时,接待了六七起客人,有的叫胡伯伯,有的叫胡叔叔,也有叫官衔的,各种辈分、各种身份的人都有,后来冯文彬同志也来了。我提问,保卫工作恐怕要加强一下才行吧?耀邦同志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能同群众隔离开,我们同群众应该是鱼水关系,鱼不能离开水。群众经常来,我可以多了解许多情况。此时我发表了几句感慨: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把群众放在心里,同群众打成一片,比如华国锋同志,他在省里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时,我在

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组工作,我们同在省委第5食堂吃饭,他同我们一样排队买饭,我帮他买他还不肯。那时吃钵子饭,每钵三两,他见我年轻能吃,有好几次用筷子从自己钵子里挑出一块,支援我。耀邦同志说,领导爱护群众,是党的传统。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儿媳找到公公,说小孙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耀邦不答应,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送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儿媳沮丧地低头离去。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耀邦一点面子都不给,说,外面有公交车,不然,你拿点钱出来,坐出租车去。我对耀邦同志如此公私分明,肃然起敬,但又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我插了句话:耀邦同志,小孩子发高烧,莫说是您的小孙子,就是街坊邻居的孩子,派车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啊!梁秘书告诉我们,耀邦同志从来就这样,廉洁奉公,有次他的儿媳流产,上班又顺路,要搭他一段便车,他都不肯,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梁秘书说,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生活方面的问题无可挑剔,“文革”中生活方面问题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梁秘书还告诉我们,耀邦同志有一种平民意识,从来不把自己看成官,他喜欢一个人上街走走,看一看,问一问,随时可以同平民百姓聊天。有时买了东西,就自己手提肩扛弄回来。有一次买了一个拖地板用的拖把,他扛在肩膀上走了回来。他个子又矮小,一个拖把扛在肩膀上,样子很有趣。附近居民都知道他住这里,为了保证他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不主动去打扰他,也让孩子们不在院子里吵闹。

晚上六点半钟,待客的“家宴”已经摆好,一起吃饭的除了耀邦夫妇和其他家人外,还有冯文彬同志(他是50年代的团中央书记,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后来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桌上的菜肴上十个,有湖南腊肉,有各种小盘小碟,清淡而精美,没有大鱼大肉。桌上打开了“二锅头”,耀邦同志亲自敬酒,亲自用小勺子敬菜。李昭大姐和其他家人个个都和颜悦色,有说有笑,气氛十分和谐。■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执行主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在南宁陪首长跳舞

○ 郭美春

1957年秋,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成为广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没有想到的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我竟有机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等首长跳舞。

## 一、毛主席的舞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们生活的年代,无论哪行哪业,劳动都是必修的课目。1957年冬末,我与剧团同仁到南宁郊区劳动,挑了一整天石头,腰酸背痛,回到宿舍正想休息,突然接到团领导的通知,要我立即随女团长柯丹参加舞会。

我心里虽然不乐意,可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得匆匆换上当年唯一的一套出客冬装,跟着女团长到了当地专门接待贵宾、素有“小红楼”之称的明园饭店。

踏进舞厅,只见灯火通明,满室辉煌,挨墙排列的椅子上座无虚席,但气氛却有些异样:除了乐队发出低沉的调音声响,全场悄无声息。广西公安厅崔副厅长,像站岗似的立在门的中央,他神情凝重,严肃地嘱咐我:“等首长来了,你要第一个请他跳舞。记住,要左脚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长习惯右脚开步。”

对这样违反常规的“指示”,我感到奇怪,也稍稍有些反感。

崔副厅长让我在长沙发上就座。正对面,与我相隔两米多的宽敞单人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安排的。静候一个小时后,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匆促的脚步声,先进来的,是几个穿呢制服的年轻小伙。少顷,“唰”的一声,大厅双门齐开,一个高大伟岸、神色从容的“巨人”,向我们缓步走来:他身着米色中山服,皮肤呈古铜色,远远看去,眼中射出威严的光芒。我为之一惊,还没定神,他已然如



毛泽东在跳舞

一座大山般地耸立在我的眼前——他竟然是领袖毛泽东!

全场有片刻的“停顿”,而后爆发出一片欢呼,人们高喊口号,跳跃,跺脚,那声响似乎能把屋顶掀掉。我和同去的伙伴激动的相互捶打,犹如在梦中见到了“神”,恍恍惚惚地处于晕眩状态。毛主席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落座,乐声响起,足足奏了十几个节拍,我明知负有第一个请首长跳舞的任务,但心慌得就像要跳出嗓子眼,腿在发抖,软软的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比我年长的演员杨玉楠女士为我“救场”,她站了起来,请主席下了舞池。

第二支舞曲响起,我方从“梦”中惊醒,走上前去鞠躬,说:“毛主席,我请你跳舞。”

毛主席个子很高,我这一米六三的身高,踮着脚也只看到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我牢记着要左脚开步,低下头看到那双宽大的棕色皮鞋,生怕踩了他的脚。与其说毛主席在跳舞,不如说他在走路。他的裤腿宽松肥大,随着节拍迈出的舞步拖沓、沉重。除了右脚开步,还不遵守慢四步舞

第三、四步合并为一拍的规则。每步都是从容的一拍。显然,他自由驾驭,不乐意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毛主席开口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嗓音又细,又亮,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他伸出手,让我在他的掌心写上我的名字。看到这只又厚又大的手,顿时想起这是亿万人想握的手啊,我慌张得不敢触碰。毛主席的笑容鼓励了我,便在他的手掌中比划起来。他又问我,哪个学校毕业,院长是谁?当我告诉他院长叫熊佛西时,

他长长地“喔”了一声:“勇佛西(湖南人熊念勇)啊——”,“西”字带着齿音,看来他熟悉戏剧界的元老,也知道熊老。我们一直跳到舞曲终止。场上请主席跳舞的女士已经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但每人只能跳两、三个节拍。于是,我成为被大家羡慕的“幸运儿”。

午夜回到宿舍,我激动得整夜无眠。

## 二、神色疲惫的刘少奇舞步轻盈,温和的笑容和长者风范令人感动

也是在那个舞会上,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跳舞。那年,他已是满头银丝,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更显出他脸色的灰暗,眼中流露出疲惫的神色。同样是领袖人物,和他在一起,我却并不胆怯。我说:“您脸色不好。”他回答道:“我睡得太少。”少奇同志问我,白天在做什么?我就像对朋友那样向他诉说,我说在挑石头,肩膀好疼啊!他安抚我:“挑久了,磨出茧子来就好了,要有个锻炼的过程啊!”他说话随和,语气亲切,短暂的问答让我感受到长者对后辈的关爱。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少奇同志跳舞,纯熟、规范。我们跳的是中速三步,他以精确的节奏,迈出了三节拍的重、轻、稍轻的舞步,转圈时柔和、轻松,与他共舞,沉醉在美妙乐曲中,是一种真正的



周恩来在跳舞

享受。应该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很好。

第二天早上,南宁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在拥挤的人群中,少奇同志认出了我,他像见到熟人那样向我招手,这一刹那连同他亲切的笑容,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革时期,大街上贴满了丑化刘少奇的漫画,我从心里无法接受。我悄悄地对亲人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的。

## 三、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细节中,周总理的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那个难以忘怀的舞会上,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场舞会,是1958年初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期间举行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总理提出的各种“反冒进”举措,为之后的全国“大跃进”做足铺垫,而总理未作辩解,在发言时承担责任,表示犯有“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在思想上没能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如今,史料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不禁浮想联翩:或许,当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起舞的时候,总理正为次日的检查苦思冥想!

有幸见到周总理并且与他跳舞,已经是60年代初了。为欢迎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南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由我担任报幕。那天,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在粤剧现代戏里扮演主角刘胡兰。演出结束后,是一场小型的舞会。

偌大的舞厅,只有不多的人,我荣幸地被安排与周总理跳第一支舞。

与我同时代,凡亲眼见过总理的人,无不为他的风度所折服。南国的冬日,没有丝毫寒意,总理身着浅湖绿色薄中山服,依然紧紧地扣着领口,浅棕色的凉皮鞋一尘不染。他款款地向我们走来,目光所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似乎感觉到:总理注意到我了!

没有任何的拘束,只有亲近与平和。总理一见我,就笑着问:“你是宁波人吧!”我惊讶不已:我出生上海,祖母却来自这座江边小城。父母也是在那里成家立业。母亲虽然是杭州人,但家里的饮食、语言还保留着宁波特色。而我,一口受过训练的普通话,总理怎么能看出我和宁波之间的天然联系呢?我由衷地钦佩他过人的洞察力。总理见我愣愣地没有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

自小我就爱看上海滑稽戏,学会了苏北方言,记忆中,总理祖籍淮阴,因为他的随和,我几乎忘了在我眼前是位领袖级人物,便用苏北腔与总理对话:“听人嘎(家)说,你是苏北人。”熟悉的乡音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总理也和我一起开心地笑了。

我和总理跳的是快三步,他以传统的欧式舞步,踮着脚,把我的右手举得很高,向右方旋转着前行。我的舞技笨拙,退着转,跳久了便有些累,总理却比我这个年轻人更经得起考验,从他快速、有力的舞步中,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当年的南宁,还没有空调,舞厅里只用几台吊扇降温。热了,当地首长往往会当众宽衣,总理却不然,他去更衣室脱下外套,穿着白衬衣步入舞厅。即便是休闲式的娱乐活动,他依然一丝不苟,儒雅、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些微的细节中。他走到乐队前,柔声地提出请求:“请奏些慢步舞曲,老了,跳不动了!”

红线女刚卸完妆,快步走进大厅,她伸出双手,向小鸟般地“飞”到总理身边,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头刘胡兰式的短发,用清脆动人的嗓音,喊着:“总理——”!我为之心动,看得出,她为初次在现代戏中演英雄人物,又能被总理欣赏而兴奋不已。她和总理翩翩起舞,亲昵地向他倾诉,犹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总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爱惜艺人,这在文艺界早已口口相传,此刻,我是亲眼所见,更是感慨无限。

#### 四、空军总司令刘亚楼善舞、善谈,性情豪放,为人平和

1961年冬,中央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我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晚间常有舞会。我为舞会主

持节目。

有一次,我和叶剑英元帅挨着坐。叶帅说,他不想跳舞,想听评弹,可当地没有人会唱。说着,他便自吟自唱,有板有眼地哼起了评弹的调门。他那自在的神情,让我很放松。

当时我年轻无知,对国家政要和军队首长以及他们的职务浑然不知。每当与他们跳舞,便直白地问他们的尊姓大名。一位中等个头、身板结实、神情威武的中年军官请我起舞。他肤色黑里泛黄、目光机敏,带着工农的粗犷气质。我们跳起了慢三步,在舞曲伴奏下,他引着我向前、向右旋转,他的俄式舞步让我适应自如。军官精力充沛,不停地转着圈,即使跳快步舞时,也喜欢聊天。他说话的嗓音有些沙哑,带点闽西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刘亚楼。

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位首长的职务,回团后才知,他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员。

因为我们配合默契,这一晚上除了报幕,几乎都在为他伴舞。他问我,是否发觉他的一条腿有点短?我摇摇头,说感觉很好啊!他说,那是红军时代打仗中了敌人的子弹,因为医疗条件差,取弹片的时候,没有用麻药,他是咬牙挺过来的。我对他肃然起敬,抬头仰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心想,这也是艰苦岁月留下的痕迹吧。曲终,细看他迈步时的动作,双腿确实有些微的差异。

跳累了,我们坐下随意交谈。刘亚楼告诉我,他是在苏联当红军时学会跳舞的。当年,伏罗西洛夫元帅访问欧美,西方人用漫画讽刺他,嘲笑苏联军人缺乏文化,连国际通行的交谊舞也不会。回国后元帅下令,让全军将士必须学会跳舞。于是,他也练就了规范的俄式舞步。恰好,我上戏剧学院时的舞蹈教师是个俄国人,难怪我们的风格如此协调。

回到剧团,老演员汪钦顺问我,今晚你和谁跳舞了?我说一个叫肖华,一个叫刘亚楼。他说,哎呀,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啊,肖华也是我军的高级将官。汪提醒我,你要乘此机会向刘司令提出要求调北京,解决和你爱人分居两地的难题!我心想,要有这个能耐,我也不至于被“发配”广西了!

与刘亚楼司令员连着跳了两个晚上的舞,再

叫我去,真有些不大乐意。原因说来也简单,当年供应紧张,营养不良,我的腿有点浮肿,舞会以后虽然有夜餐,但也很难弥补体力的消耗。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是刘司令员亲自点的名,必须去。我只得遵命,于是,我又第三次与刘司令员相聚在舞会上。

舞会休息时聊天,刘司令员问我在演什么戏?我正在阿尔巴尼亚话剧《渔人之家》中扮演谢娅,而这正是空政话剧团的首演剧目,他熟知剧情,告诉我,谢娅的戏很感人,他对空政话剧团的情况也很了解,说扮演谢娅的是位老演员,演得很好。

他又问我,爱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说是清华大学的助教,现在外语学院学习,正准备去瑞典留学。“哦,你爱人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人哪!”刘司令认真地下了结论。我们剧团的女演员吴桐华走来,要听刘司令员讲过去的故事。刘说起一则真实的趣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里扮演男主角安德列的演员,请求刘的帮助,为之引见领袖斯大林。而当斯大林站立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功勋演员却吓得一步步地直往后退,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出口。以后,这个情节便沿用到了电影中。刘司令员说,可见,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还告诉我们,其实斯大林本人很衰老,背有点驼,头发白了,还谢顶,才不像油画和电影里那么高大、漂亮,“是画家和导演把他美化了”,他说。言谈间感觉得到,行伍出身的刘司令员还是艺术的“内行”。

## 五、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当“学生”时腼腆而谦逊,流利的普通话与我沟通自如

舞技平平的我,还曾教过越南总司令武元甲跳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南宁。

一个明朗夏天的上午,明园饭店的舞池上,只有我和司令员两人,陪伴我们的除了庞大的乐队,还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他对我说,武司令要去苏联访问,学习交谊舞是其中的一道课程。我明知水平有限,心里不免发憊,但既然是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充当一次不合格的“教授”。

儒雅、帅气的武元甲司令并非想象中的“武

将”,他身材适中,体态挺拔,有一双越南人乌黑、明亮的眼睛。学舞时,他像小学生那样地听我调度、指挥。让我意外的还有,他能用流利的汉语与我沟通,发音准确,吐字也清晰,说话时语气温顺,使人感到亲切。

我从基本舞步教起:抬头,挺胸,举手,按音乐节拍迈步,不停地喊着:“一、二、三、四——”他吃力地随着我迈步,双手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看得出,他确实是初次学舞。大厅里虽然有电扇,但没多久,我们已经汗流浹背,武司令身上那套卡其布的浅色军便装,也已湿透了。我年轻急躁,教舞的时候,忘了我的“学生”是位邻国的首脑,总是数落他“不对、不对”,而他,则羞愧地朝我憨笑。休息时候,广州军区司令员提醒我说:“小郭,你要耐心点,客气点,多鼓励他,他去苏联的一路上还有机会再学,这儿是他的第一站。”

大约两个小时,武元甲司令员掌握了交谊舞的基本要领,他连声向我道谢,那谦逊、恭敬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 六、同龄人格列朗杰的舞步具有藏族特色,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在南宁期间,我还和西藏自治区领导帕巴拉·格列朗杰跳过舞。

他是来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庆典的贵宾,但年龄与我相仿,当时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这使原本陌生的我们变得亲近,一边跳舞,一边笑着无拘无束地交谈。他以藏人善于舞蹈的特长,领着我在快三步舞曲中起舞。在不停顿的旋转中,除了看到他身上洁白熨烫过的衣领,崭新的藏青色中山装和一头浓密的乌发外,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他,踩着强劲的舞步,已然谈笑风生。他说,他是共青团员,又指着坐在一旁、身披金色袈裟、目不斜视的年轻班禅,告诉我:“他,是不可以跳舞的。”

格列朗杰的舞步,具有一种独特的弹跳力,这可能是受藏族踢踏舞的影响,使年轻的他张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作者为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已退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

○ 魏海林

1968年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萍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接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调查何式翻案问题”的电话指示后，以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作风，立即进行了研究，抽调了专门力量，成立了专案小组，制定了工作部署。两个月后，这一右派公开翻案的事件被查了个底朝天而大白于天下，该会在同年7月30日给上级的报告中做出结论：“这完全是一个以右派分子何式为首的有纲领、有口号、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案件。”

同年3月16日，被“四人帮”把持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右上角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编者”的《不准右派翻天——致江西萍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何式右派翻案集团”主办的4开小报《万山红遍》一下子名传全国，从而成为当时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之无愧的活靶子、大靶子。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么样？43年后的今天，作为亲历者和受害者之一的笔者，于最近一、二年间，在查阅了萍乡市已经解密的有关档案，走访了那些尚在人世的当事人后，终于基本弄清了该事件的始末。

## 一

1967年10月间，原在萍乡报社任记者、并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离开报社的何式，和他的好友、湖南长沙某机砖厂合同工刘声琪，从长沙来到萍乡，目的是要求有关部门撤销1957年给他的右派结论和处分。抵萍后，他即受到了同为右派的同事钟亦、姚茂初等人的接待。商量后觉得，1957年那档子事，实在是太冤了，打击也太重了，令人难以忍受。要趁文化大革命开展之机，由有关部门为他们平反甄别。商量来、商量

去，觉得阻力还是很大，于是在萍乡上栗中学任教的钟亦便自告奋勇，由他出面去请所执教学校的学生来帮忙促成此事。此时离反右运动过去已有十年了，没想到，上栗中学井冈山红卫兵团的那些单纯、幼稚的学生，竟然在粗略地看了钟亦、何式等人提供的材料后，一口气答应下来了。

何式，原名李开云，时年33岁，被划右派时年仅23岁，湖南省沅江县人，家庭成分工人，本人出身学生，他15岁时适逢湖南和平解放，立即报名参军，不久入团。可能是他1.55米的个子和过于单薄的身板不适应部队生活，不久后复员到地方，先是在萍师附小当教员，因喜欢舞文弄墨，不久被调到萍乡报社当记者。在工作中，他腿勤手快，写了不少文章，对当时的萍乡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一些局部性工作，以及部门领导，提过一些意见。没想到这下结了梁子，1957年反右开始后，立即在报社内部遭到批判，任其百般辩解无济于事，反右运动结束时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处分是调离记者岗位，下放到山区广寒寨从事体力劳动。何式是个有性格、有理想的进步青年，这等冤枉事落到他头上他受不了。于是他不停地申诉上访，坚决不承认右派身份，没想到这样一来情况愈来愈糟，被广寒寨党委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他没有成家，回乡后无法生活，只好寄居在业已成家的长沙妹妹家里，靠妹妹、妹夫接济和做点短工维持生活。1964年他又因“右派不服改造”，被长沙公安机关处以劳动教养二年，押送到湖南省津市浯江农场强制劳动。在长沙期间，他结识了机砖厂工人刘声琪，二人成为挚友，刘是何的“粉丝”。

钟亦，男，时年34岁，江西省萍乡市人，家庭成分地主，本人出身学生。他因与何式有相同爱好而同时调入报社，又因同样原因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他性格相对较为柔和一些，虽然他对自己被划为右派非常不服，下放到

广寒寨劳动一段时间后,由于他不申诉,不上访,“伪装老实”,故于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但报社是回不去了,被安排到萍乡上栗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员兼某班班主任。

刘声琪,男,时年26岁,湖南省长沙市人,贫民成分,学生出身,高中文化。在长沙机砖厂制砖的他认识了何式,对何式宁折不弯的性格极为赞赏,对何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进而成为何式的“粉丝”。文革开始后,他竟然自费跑到数百里外的溁旦农场,把解除劳教的何式从津市接到长沙,住在自己那个四处漏风的小屋里。他当时已参加当地的群众组织。经人指点,刘声琪接到何式后即同来萍乡,帮助何式翻案。

这样,一个包括何式、钟亦、刘声琪在内,以上栗中学红卫兵为主体的“萍乡报社反右运动专案调查组”成立了。别看当时这些红卫兵还都是些18、19岁,不谙世事的学生,但由于当时的年代很特殊,他们的专案调查居然进行得很顺利。不久,专案组就在萍乡市委大院内贴出大字报,申明钟亦、何式被划右派一事纯属冤案,二人根本不是右派,之所以成为右派,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向领导提了意见,领导妒贤嫉能,蓄意报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案。随着一批材料的公布,他俩的冤案也得到了当时萍乡群众组织的同情和支持。1968年元月,有23个群众组织自愿加入了调查组,调查组更名为“萍乡报社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在当时,以这一目的而成立的调查团,在全国可能也是第一个。元月26日,这个团召开大会,贴出公告,宣布何式、钟亦正式平反。

如果事情到此戛然而止,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时调查团的红卫兵易希耀、魏海林、周建明、黄文君(女,著名音乐家黄海怀之妹)、陈宏宽、黎心田、甘定东等人,觉得何式、钟亦虽然平反了,但像他们这样受冤的人还大有人在,同类案件在1957年肯定不少,而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不如借此机会把1957年的这些糗事来一个彻查,多帮一些人解除苦难。

初衷是善良的。不久,机会也来了,材料也来了。1968年元月,由湖南右派分子肖琦写的《怒揭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刘邓黑线》一文被这批红卫兵小将拿到了手,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惊

天秘密:1957年湖南全省实划右派3万多人,但上报党中央只有3000多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不是在欺骗党中央、毛主席吗?那个反右运动不是被某些走资派利用,被各级部门扩大化又是什么?拿到这一材料后,何式、钟亦和红卫兵们如获至宝,当即拍板,将此文在《万山红遍》第三期上刊出。前二期《万山红遍》,每期只印5000份,这第三期,就印了2.7万余份。印出来后,以编辑部名义寄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湖南、江西省革委以及当时全国的著名报刊,如《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剩下的则由这些红卫兵手提肩挑到株洲、长沙、南昌、武汉等地叫卖,卖得非常之快、好。所到之处,人们无不踊跃观看,《万山红遍》一时洛阳纸贵,当时萍乡驻军首长陈贵隆副政委听到汇报后,特意接见这些红卫兵,夸奖他们“干得好,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实事、好事”。据后经军管会查实“汇报”,反动报纸《万山红遍》第三期出笼以后不到两个月,《万山红遍》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来信来访信件多达2000余封。

来访来信中,有的求购,有的表示声援,有的送诗送词。身处武汉的右派分子危上迅,在来信中说,这张报纸对“57年受害者有极大的启发”,“揭开了57年反右斗争中的黑幕”。一些右派分子拿着报纸,跑到原单位找领导,要求平反甄别,一场颇具影响的右派改正风潮正在民间形成。

而此时的红卫兵小将和何式、钟亦等也是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不世之功,除了接待来信来访者之外,便安心地等待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肯定和支持。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1968年3月3日,也就是接到省革委指示的第二天,在萍乡市公安局军管会领导的授意下,以萍乡工人造反组织“大联筹”为主的上百名手持棍棒的造反派突然冲进了《万山红遍》编辑部——老萍乡市政协办公室,将何式、易希耀等押走,将所有的柜子、桌子、房子贴上封条。等大家反应过来,才知道原来此事已惊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其所著的《十年浩劫史》中写过,中央文革在2月底,召集了各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开会,其中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到萍乡有个《万山红遍》时,江青插话:“右派



竟然公开翻案,要严惩”。这就有了3月3日的查封。随后,张春桥又亲自打电话给《解放日报》,这就又有了《不准右派翻天——致江西萍乡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文章的出现。

一场鸡蛋碰石头的戏就此黯然收场。

和善的陈贵隆副政委很快被调走,新来了一位杀气腾腾的马凤成副团长任萍乡驻军最高首长、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何式、钟亦、刘声琪锒铛入狱,易希耀、周建明被软禁在一所学校内,已参军入伍的魏海林被从金沙江边的8700部队退回,所有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被全部集中起来,3月20日全部软禁在市内某中学办学习班。

当时军管会认为首要任务是斗垮斗臭极右分子何式,于是在萍乡市体育场(现商城)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何式被强令跪在最前排,后面跪着一排翻案骨干。造反派先一一列举何式的罪状,然后一顿乱打,打得他当场晕死,又用凉水喷醒,问:“你承认自己是右派吗?”何式坚决顶回:“我不是右派。”于是再打,再问。值得一提的是何式直到临死时也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因为他过于强硬,不到三个月,身历大小批斗会50余次。也许他觉得生不如死,于是便采用了绝食的方式与军管会抗衡。

由于“萍乡报社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万山红遍》也是公开发行,故查处一事,进展非常顺利,两个月之后,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对这一事件便查了个水落石出。立即向省革委作了汇报,结论为,这是一个以“右派分子何式为首的有纲领、有口号、有组织、有目的公开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可以说,这一定性完全是不实之词,右派翻案固然是真,有纲领、有口号、有组织、有目的公开翻案也不假,但说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造谣诬陷。军管会收集到的何式的唯一反革命言论,就是何式在辩论时说了:“我们说毛主席正确,是说他的大方向正确,并不是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

不过,话又说回来,像《万山红遍》这样的报纸能够公开印刷发行,“萍乡报社专案联合调查团”能够公开成立,并且活动达几个月之久,获得上万人的支持,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笔者认为还反映了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即1957年



1968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不准右派翻天》一文反右运动并非那么必要,那么得人心,那些右派是值得同情的。

二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以当年55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转发了“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名义《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50余万右派中,除96人未获改正外,全部被摘帽改正。至此,反右运动被扩大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春天来了,春风也来了,这股春风自然也吹到了偏居赣西一隅的小城萍乡。1979年8月13日,未经任何人推动,当时的萍乡市革委会即批转了市公安局“关于纠正何式为首的右派翻案集

团的请求报告”。认定并宣布：当年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做出的将“萍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萍乡报社调查团”定性为“以何式为首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因此案而受到株连和迫害的人员，由所在单位纠正平反”。

市革委会的这一修正，虽然距打击查处时已长达 11 年之久，但还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但扼腕叹息的是何式，他于 1967 年在被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后，未来得及送至服刑地，即于 1967 年 7 月绝食死于狱中。据当时的看守人员回忆，死之前，他还在低声呼唤“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此时的他体重已由 80 多斤降到了 40 多斤，咽气后，被看守顺手装在便桶内，由看守人员送至火葬场火化。他终生未娶，其他亲人也远在他乡，他的那些同案犯和好友们也不知道何式已死亡，故在火化时没有一个亲朋好友送别，骨灰也是寄存在火葬场多年后，被他唯一的妹妹取走。

他的好友刘声琪，因此事获刑 12 年，到 1979 年 12 月，他已服刑 11 年又 10 个月，距刑满释放还有两个月，这天他正在田间劳动，突然被看守人员叫到办公室，向他宣读了（1979）萍中法刑字 167 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宣布：撤销原萍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刑事判决书，改判刘

声琪无罪。刘当场释放。于是刘声琪便高兴地怀揣着这一纸“无罪判决书”，喜滋滋地回到了故乡长沙，干他的临时工去了。

钟亦虽然当时被关押，但由于认罪态度尚好未获刑，关押几年后便被放出，由上栗中学安排他担任食堂工友，但由于他有民主党派身份，落实政策后不久，便担任了萍乡市安源区政协副主席。对“联会调查团”最热心支持的萍乡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人士李苏菲不久也官复原职，1970 年后因萍乡市由县级市升格为设区市，水涨船高，他也由副县级升至副厅长（局）级。

其他几位非学生身份的翻案骨干分子姚茂初、徐依广、兰家琪、喻品奎，长沙的骨干分子杨美兰、肖琦、李胤宗，在国务院外贸部工作的干部陈牛也都在受尽群众运动的百般侮辱后，被平反昭雪，然后各归其位，原先干什么还在干什么，也没有人说他们当年做得对或是做错了。

至于那些红卫兵身份的骨干分子，虽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给了他们一次重创，但他们没有因此而颓废、消沉，均逐渐通过努力，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作者为《萍矿工人报》原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图书介绍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 年是“三反”、“五反”，1957 年是“反右”，1959 年是“反右倾”，1963—1966 年是“四清”，1966—1976 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定价 28 元，邮资 7 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1980 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 1980 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摒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定价 28 元，邮资 7 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文革纪事

○ 张 军

文革之前,为了规划统一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等原因,1964年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并,上海文艺出版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以下简称人文分社)。与此同时成立了“上海编译所”,吸收20多位没有国家编制的翻译工作者,其中有著名翻译家罗稷南、满涛、草婴、李民等。文革开始,根据上级指示,编译所全体人员参加人文分社运动。

—

1966年文革开始,中央指示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称建国后17年是“文艺黑线专政”,以后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成了“阎王殿”,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的分社则成了“黑店”,被诬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上海分社有不少30年代和40年代的作家、翻译家,解放后公私合营进来一些私方人员,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一些受批判的人,还有一些名人的亲属、子女,如周扬的妻妹、巴金的弟弟、丰子恺的女儿、邵洵美的女婿等,这么多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等集聚在这里,当然就成了运动的重点。

我记得运动还没正式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出版局召开党政干部会,布置开展运动事宜,通知社长兼总编辑蒯斯曛出席,我代表支部去参加会议。走在半路上,不知什么原因,出版局联络员张利民突然跑来通知蒯斯曛不参加这个会议。这时蒯已感到“问题严重”,回去后便躺倒不干了。蒯斯曛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1938年参加地下党,后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曾任过粟裕将军秘书等职,50年代

转业回上海在出版社工作,先后任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也是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为人忠厚老实,做事小心谨慎,性格软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运动中被整的对象。另两位副总编辑包文棣(辛未艾)、孙家晋(吴岩)都是作家、翻译家,也是被整的对象,当然都直不起腰来。不久,出版局派政治部主任杨冷来领导运动,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杨任组长,宣布我为副组长。我因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疑问: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下面是不知道的,单位领导都是根据中央指示办事,怎么都成了“走资派”呢?这些话不敢明讲,但和别人讲起过蒯斯曛、包文棣不像走资派,对造反派打人、搞体罚、侮辱人格等表示反感,这些话被泄漏了出去,很快我作为“保皇”派而被轰下台,“靠边站”,直到批判资反路线被批斗为止。

二

批判资反路线后,社会上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单位领导干部。人文分社造反派在院内揪斗蒯斯曛、包文棣、孙家晋时,蒯态度顺从,不敢反抗造反派,包则不同,当有人责问包文棣是什么人时,包生性耿直,不谙世事,有些书生气,便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造反派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是走资派。包说我不是走资派,是共产党员。这些话激起一些造反青年的不满,有人要上去打他。中文编辑室范政浩反对在批判会上打人,见状急喊:包文棣不老实,大家到会议室去批他好不好?很多人响应,出版科陆季明和外文编辑室高宗文、郭振宗等乘机一面要包态度老实,正确对待革命群众,一面就把一些人挡住拉开,包文棣被架进会议室,场面的紧张气氛随之缓和,包才免遭皮肉之苦。对待被审查受批判的人,

群众中在认识上和态度上也是很不同的。我这时靠边站,虽然同情包文棣,但不敢公开表态。

1967年1月,上海全面夺权后,人文分社各科室推选代表组成领导文革运动的勤务组,记得有庄久达、陆季明、高宗文、郭振宗等,选出的代表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拥护。勤务组成立后,组织政治学习,开展大批判,注意掌握政策,运动比较平稳。但是因为不愿加入出版系统造反司令部(即“版司”)打“内战”,关门搞运动,引起“版司”一些人不满意,攻击人文分社保守势力大,造反派力量弱,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是烧不开的“温吞水”,在1967年3月13日,“版司”冲砸人文分社,扶持造反青年出来掌权,群众意见很大,自此社内陷入混乱状态,这一年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度过的。

### 三

运动发展到1968年2月,江青、姚文元到天津煽风点火,指名批判天津作家雪克和上海的刘金是“文艺黑网里的小爬虫”,3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批判文章《文艺黑线的一条小爬虫——刘金》。刘是人文分社中文编辑室主任,也是作协会员。出版系统造反派成立“斩黑线砸黑网战斗队”,进驻人文分社,把刘金作为阶级敌人在全市进行游斗,刘成了重点单位被斗争的重点对象。刘金与姚文元之间有矛盾,60年代初,雪克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金是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当时,上海作家协会组织座谈会讨论这本小说,会上姚文元硬说这本小说有政治问题,是宣传叛徒哲学。刘金因不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而发生争执,回社后曾说姚文元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刘又写文章进行申辩,由此引起姚的不满和嫉恨,于是在文革中点名批判他。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姚的做法太过分。刘金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全国解放后转到出版社工作。他为人坦率正直,工作认真负责,一贯表现很好,就因为这件事把他作为阶级敌人对待,很多人都想不通,但没有办法,以后他便成为人文分社运动中的焦点和难题。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发展到顶峰,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人们把

对毛主席的“敬爱变成了迷信……每间屋子都改造成成为庙宇,我们已经是教徒,不再是人”(著名诗人公刘的诗句)。社会上那些虔诚的造反派“教徒”,要掌权,要争权,不要联合,大打派仗,不断发生死伤人事件,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破坏,历史的车轮滑入岔道,连人文分社这个百多人的单位也有人被迫害自杀和打死人等事件。外文编辑王科一读大学时,在反右派运动中,鸣放言论受到批评,但没划他为“右派”,事过多年,文革开始又被翻出来,靠边受到批判。造反派勒令他写“漏网右派”认罪书,贴到自己弄堂里,他受不了这种屈辱,回家后关紧门窗,开放煤气,自杀身亡。中文编辑江骛,自幼读书时,就女扮男装,解放后一直不改,文革中受到冲击,又因误传解放前参加革命时配发的手枪没有上缴,几个造反青年听到后,信以为真,连夜把她拉出来突击审问,严刑逼供,被毒打致死。事后公安部门进来进行调查,对有关人员作了严肃处理。这样的惨剧如在平时是不会发生的。

### 四

1968年9月,工、军宣队进驻新闻出版系统,成立了团部,下面出版社、报社等单位成立连部,人文分社编为第五连。因为人文分社正副主编都已靠边审查,工、军宣队便吸收我和吴真两个编辑室主任担任进驻单位的正副指导员,青年任仲明、吴铮为正副连长,当时叫做“三结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工、军宣队领导下进行工作。在要我担任连指导员时,工、军宣队连干部找我谈话,告诉我:经过他们调查了解,大多数人推选我进“三结合”领导班子。我心里很矛盾,大多数人推荐我,心里很感动,但我知道以后会有风险。鉴于运动以来屡屡发生打人、体罚、侮辱人格事件,我提出要按党的一贯政策办事,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否则我就辞职,他们表示同意。一段时间,进驻单位和工、军宣队双方关系还是不错的,尽管在有些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工、军宣队进驻后,主要抓两件事:一是斗批改;二是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斗批改”主要是进行大批判,而大批判是在批“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下进行。毛主席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说过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需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第22页)对出版社出的很多书,不进行科学分析,被列入“洋名古”、“封资修”大毒草进行批判。在“黑线专政”下有没有出版过好书?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坏书?“洋名古”、“封资修”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什么关系?要不要继承和借鉴?等等,没人敢问。在这种氛围下,是非不辨,黑白不分,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大家只能接受执行。

对于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真是云谲波诡,变化异常。过去一直讲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党实现的,军队是党直接领导的,现在都颠倒了过来,丢掉了下面党组织,实在令人费解。幸好这时我们遇到了军宣队的连长陈明理。他曾和我私下交谈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要过去的,造反派掌权是暂时的,党的干部95%以上还是好的,有些干部犯了错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后还是要用他们的,现在把他们关进牛棚,对他们改造思想不利等。他进驻后与工宣队一起积极进行调查研究,把所有靠边人员放回到班里参加学习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又宣布解放一大批人。他的这些想法和作法,得到大家的拥护。但不知怎的被上面知道了,批评他右倾,勒令他复员回到浙江永嘉县家乡去工作。他内心十分痛苦,临走时到我家告别,我无法安慰他,帮助他,我只能默默地祝他回到家乡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生活。

## 五

1969年秋,根据林彪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工、军宣队带领大家到农村劳动,我们连队到奉贤柘林,住在一个停课的小学校里,除劳动外,继续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这两项任务是相互配合的,以大批判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清理阶级队伍为大批判提供资料。创作和翻译文学作品的几位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则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进行批判,这种荒唐、野蛮的作法,搞乱

了人们的思想。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外文编辑室批判翻译家满涛、包文棣。他们两人都是翻译俄罗斯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文学理论的专家。别、车、杜先后生活在1810年代至1880年代,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文艺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文学艺术和美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留下了十分丰富的遗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他们都有很高的评价,称他们是“伟大的天才”、“社会主义莱辛”等,过去有很多人是通过俄罗斯文学去了解苏联而走向革命的。他们的理论是不应该被批判的,但文革中也作为“封资修”、“洋名古”加以批判。翻译家满涛思想进步,为人憨厚,不善言辞,木讷内向,胆子很小,一批判他,血压一下升得很高,上面超过200,血压计没法量,非常危险。高宗文、郭振宗向我反映,我就对工、军宣队连里干部说,满涛是不在编人员,年事已高,农村没医院,看病不方便,万一出了事,不好向他家属交代,不如让他回家休养,身体好了再说。他们请示团部同意后,才放了他,使他能度过文革苦难岁月。包文棣是社里“当权派”,就没有满涛“幸运”,只好留在队里继续接受批判。

二是对刘金的定性问题。大约在这年年底,北京传来抓“5·16”分子的消息。有一天工宣队政委沈桂弟来,要我们抓“5·16”分子。我们说没有发现有“5·16”分子,他说刘金就是“5·16”分子。我说划“5·16”应有标准,他说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标准,刘金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5·16”分子,就是现行反革命。我说靠边受审查的都被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是否都是反革命?沈很生气,蛮横地断言:刘金就是“5·16”分子,你们要进行批斗。连里工、军宣队没有办法,就按他的说法,把刘金做为现行反革命批斗。批了几天,刘精神几乎崩溃,每天一个人跑到河边,很久才回来。后来团部联络员来我们这里了解情况,他是原出版局一位局长,刚被解放不久。我向他说明刘金的问题,请他带回团部再进行研究,他一听是刘金,马上说这事很复杂,我不介入。我很理解他的处境,但我骑虎难下,不能不介入。“五七干校”还没有完全建设成,团部命令我们连队提前进入,继续对刘金进行猛烈批斗。形势非常严峻,但我始终认为

刘金顶多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当然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而不是反革命。我这个人有点争强好胜,得理不让人,不知天高地厚,注定以后要头撞南墙的。这便是后来我遭受审查批斗的原因。

## 六

进入干校已是文革第五个年头了,斗批改进入最后阶段,对于受批判的人员,应该给他们作出审查结论了。这时受审查的人很多,因“四个面向”等走了一批人以后,他们占到人文分社人数70%以上,外出调查取证多是工、军宣队队员。在这一阶段有几个人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罗稷南的问题。罗是云南人,北京大学毕业,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曾任宣传科长、师部秘书、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淞沪战役后退到福建,曾代表蔡廷锴将军赴苏区,与中共商谈联合反蒋抗日,听说毛泽东曾设宴招待他。此事未成,以后他转移到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创办刊物、书店,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等。他翻译有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等。解放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是位爱国爱党的著名翻译家。他不愿做官,仍然从事翻译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人大代表。文革中他本不应该受到批判,而应受到尊重,可是在那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名声越大越响,就越会遭受不幸,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批斗。但罗稷南那种铮铮铁骨、不卑不亢、昂然而立的硬汉形象,令我难忘。会上不论怎么批判,他都泰然处之,不动声色。但一有人讲他反动,他便会上辩说:我不反动,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但我很惭愧,未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几句话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工、军宣队对他没有办法,批判会往往开得很僵。有一次连部开会问我的意见,我采取了“和稀泥”的办法,说他年纪大了,对事物有了固定的看法很难改变,他身体不好,在干校也不能劳动,行动也不方便,不如让他回家养老,他们同意请示团部,后来就让他回家了。回家后大约过了两年就不幸去世了。罗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内心悲愤,以致过早逝世,时年71岁。

二是包文棣和草婴的问题。包文棣的问题相对比较简单,他是上海地下党老党员,一直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解放后任出版社编辑室主任,60年代后任副总编。他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表现很好,政治上查不出什么问题,但最后还是把他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宣布予以解放。

草婴的情况就不同了。解放前1941年之后,他受上海地下党姜椿芳(原国家编译局局长)的影响和领导,为《时代》杂志和《时代日报》译稿。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翻译了很多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其间译有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小说里的主人公娜斯佳“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的英雄形象成为当时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接着草婴又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在《世界文学》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小说通过苏联一个普通人在卫国战争中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战争除了带来眼泪,不会带来任何东西”的思想。之后,中苏关系破裂,我国批判西方人道主义人性论,到了文革开始,江青说肖洛霍夫是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草婴就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且被怀疑有严重政治问题。但经过几年反复审查,没有发现他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只好作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以犯有“严重思想错误”,宣布予以“解放”。他和包文棣被解放后因为身体瘦弱,不能参加重劳动,连里安排他们两人负责编写黑板报,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团部知道后狠狠批评我们。我不服气进行了争辩说,要我们学习北京两校(北大、清华)的经验,他们解放了“大右派”钱伟长,还安排他工作,草婴和包文棣抄写黑板报为什么就不行?一气之下,我向工、军宣队提出辞去指导员的职务。他们这时正好在商量审查我,要揭开人文分社的阶级斗争盖子,就把我晾在一边。虽然草婴被宣布解放了,但仍不放过他。有次通知他到建设工地劳动,搬运百多斤的水泥袋,压坏了他,“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还不给他住医院治疗,只好回家躺在木板上养伤半年,差点下肢瘫痪,这样对待草婴,一点

人道主义都没有。后来草婴却奇迹般地好了,文革后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为文学翻译事业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是对待刘金,他们要我表态,我仍然认为他不是反革命,这是最后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 七

对于刘金的问题,工、军宣队早有预谋。第一步先把工、军宣队原来的连干部全部调换,军宣队调来何英主作指导员,工宣队来了个青年担任连长,他们俩一唱一和,相互配合,硬把刘金作为反革命,批判我包庇反革命(吴真是受我连累);第二,他们利用一个被隔离受审查的青年,检举我偷听敌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青年有一天晚上听广播,他把收音机推给我听,我听到收音机里噼噼喳喳,不知讲什么,我说你不要乱搞,就把收音机还给了他。当时他对文革不满,在日记里进行发泄,后被工、军宣队查出,说他“攻击毛主席等”被隔离审查。我向工、军宣队说明,这个青年的收音机和我的一样,都是普通的“红灯牌”收音机,香烟盒子大小,只能收听中央台的新闻、音乐、戏曲节目,没有收听海外电台的功能,在海边偶尔有港澳电台冲进来。军宣队连干部在奉贤柘林时也对我说过这种事。我请他们将收音机送有关部门去检查。他们当然不听,一定要把收听敌台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把我打成敌对分子,这样包庇反革命刘金的罪名就顺理成章了;第三,他们硬说我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牛鬼蛇神,把我和吴真打成“新的走资派”进行批斗。他们这种卑劣行径,使我伤心极了,我曾大哭一场。我想我这样真诚对待你们,你们这样对待我,天理何在?什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给出路政策等,全是骗人鬼话,发展下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我感到生存的无助,没有自由的选择,把心一横,再也不为自己申辩,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反正今后不会再给他们工作了。

他们折腾了一阵子,忽然林彪叛逃爆炸了,真是晴天霹雳。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叛变了,它对整个国家的震动是无法估量的,人心大变,山河为之失色,由林彪儿子林立果直接控制的空四军派来支左的

军宣队,顿时感到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尽管“四人帮”还很猖獗,但此起彼伏的反抗,使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阶级斗争不得不降温,落实到刘金身上,“文艺黑线小爬虫”不能成为审查结论的依据,最后他们不得不做出“刘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结论。文革结束后,刘金才彻底平反,后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分工处副处长、《文学报》主编等职。既然刘金不是反革命,我包庇他的罪名也就不能成立了。之后,工、军宣队又要我出来担任连长,我不愿意,坚持要求去工厂或农村劳动。我曾先后去过嘉定国棉三十三厂、市内国棉一厂劳动,后来因为人事纠葛,不让我回原单位而分配到《辞海》去当编辑,我还是不愿意干,又去金山石化总厂劳动,前后有四五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回到出版系统。

## 八

文革十年,像是一场噩梦,有人醒得早,有人醒得迟。梦一样荒唐、丑恶和无奈的事很多,有的问题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我写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为自己辩解什么,文革中处于我这样的位置,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也写过大字报,会上也批判过别人,不是没有教训,但他们加给我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用不着辩解,根本不存在“走资派”,也没有所谓的“牛鬼蛇神”。我常想,与那些对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成千上万的知识界人士,在“文革”中遭受的劫难相比,我还是幸运的。我写这些也不是去追究运动中某些人的责任。我只想说这是一段历史,是抹不去的一段丑恶血泪史,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不断总结。最近看到《伤痕》小说的作者卢新华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他说值得自己去认真阅读的是自己的心灵之“书”,同样,“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对自己走过的弯路,对自己曾经犯过的过错,如果不能深刻检讨、反省和忏悔,也很难有一个光明和美好的前途”。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他说得很好,用不到着解释了。■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协离休人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也谈儒家与民主 :与彭国翔先生商榷

○ 解正中

—

2011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彭国翔先生的文章《如何理解“尊孔读经” :与杨继绳先生商榷》,对中国儒家的学说高度评价,倍加赞扬,这无可厚非。但文中某些地方的阐述,论据不足,含混片面,夸大儒家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把晚清以降、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某些人称之为“现代儒家人物”,继而甚至认为传统儒学几乎是新时代学者们的智慧渊源,这就未免让人疑窦丛生了。

彭先生文中以下的两段话,值得商榷。彭先生说:

“西方一些从社群主义角度批评自由主义的学者之所以对儒家传统情有独钟,大体都在于感到了儒家传统与社群主义的彼此共鸣。只不过这些社群主义的西方学者有时不免顾此失彼,没有看到儒家传统中也兼有丰富的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而已。”

“儒家人物对于专制极权的批判,并非晚清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影响的产物,而原来就是儒家历史上一贯具有的重要传统。……”

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他们凸显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并以礼义廉耻、诚信和平、善良友爱为做人处世的道德标杆,因此,他们与西方社群主义平等博爱的宗教情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种自然吻合。这不奇怪。至于西方社群主义学者是不是如彭先生所说,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儒家传统中“兼有丰富的自由主义精神资源”,我倒认为他们并非没有看到,而是中国儒家传统中作为主流思想体系,根本就没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子。

儒家人物对于专制极权的批判,具有一贯的长期的历史传统,这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孟子不仅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了“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不仅主张换掉坏君主,甚至更激烈地具有造反精神地主张用暴力推翻暴君的统治。他的思想深刻程度,甚至早近二千年就达到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水平。洛克说:“当人们发现立法者执行者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与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诉诸上天,是否可以用战争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孟子以委婉的东方方式说出同样意思的话。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一夫。闻诛纣矣,未闻弑君也。”然而,不管儒家批判专制极权如何声色俱厉,铁面无情,他们针对的主体是君主个人,而不是专制制度。他们无意改变,或者没有想到要改变专制政治的极权制度。他们希望的只是一个仁君,一个好皇帝,而不是将权力回归人民,从体制上改变权力的性质,让人民实行民主。因此,传统儒家批判专制极权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一时换个仁君,可能为人民大众办点好事,社会相对安定,生活相对改善。但时间一长,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社会生活发生动荡,独裁统治者个人的人性即有可能发生改变。以孟子为代表的以道德教化为准则的批判与古希腊柏拉图推翻僭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批判不同,他们维护的仍然是君权。所以孟子内心深处的话仍然是:“其君不贤放逐他。……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台湾新儒学学者徐复观先生对此作了精彩的分析。他说:“中国的政治思想,除了法家,大多数都可以说是民本主义。主张民众是主体。但为什么总是无法改变几千年的政治格局呢?首先出在儒家思想本身。儒家的民本主义虽然考虑到了君主应以



人民的好恶为好恶,但儒家民本思想的主体性确立有问题。它不是以人民为主体为出发点,不曾考虑用什么方法让人民自身实现民本,体现民意,仍然以君主为主体。中国儒家对于政权的运用形式,除圣君贤相外,再也不想不出其他办法。”(《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徐复观先生说的一点不错。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体制始终跳不出周而复始的怪圈,其根子在此。

中国传统儒家为什么在政治权力上只想到君主个人,而想不到改变专制制度呢?这就牵涉到儒家的根本哲学问题了。传统儒家的人性观是人性唯善论,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孔子、孟子都是人性善论的倡导者。半个儒家的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本恶,但他把人之善性,最终归为“圣王”所有。他不仅认为上智下愚,还认为上善下恶。荀子说:“……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荀子·性恶》)传统儒家(孔、孟、荀)不知道人性既善又恶,可善可恶,是个二元结构,不知道帝王将相和草民百姓一样都是人,都有同样的善恶人性。掌权的帝王将相因为是强势者,某些方面作恶的可能性比草民更大。所以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东西方学人在研究学术的思维方法上,不尽相同。中国多主张性善,西方多主张性恶。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与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是两种不同范式的学说思想和治世方略。前者重法律,后者重道德;前者产生于西方,后者为东方所固有。就学说研究而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技术”思维,中国儒家的思维方式是“礼教”思维;他们的政治哲学是力量哲学、制衡哲学,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说服哲学、和谐哲学。林语堂先生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缺乏民权思想。我们是一种道德和谐哲学,不是一种力量哲学。”为什么要制定一部宪法?“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窃贼。他们可能滥用权力,侵犯我们的利益。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益。”(《中国人》)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林先生提醒人们千万不要相信儒家的片面人性论,把总统、官员当作

自己的父母官,以为他们会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地照顾老百姓,从而使自己跌入温柔的陷阱。

历史传统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哲学观点的不同,决定了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只能起源于西方,而不可能在封闭的东方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儒学不但想不到好的方法,想不到实行民主政治,就连君主身边的大臣、朝野学士,以及人民大众的思想言行都难有真正的自由,无不受到三纲五常,上智下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禁锢约束。孔子制定的“四杀”条例,可算是典型的思想言行的紧箍咒。孔子说:“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奇技奇器,以荡上者,杀;行为而坚,言诈而变,以非而薄,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发明这种酷律严令的孔子,在鲁国执掌权柄,为相七日,便以言论罪“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论足以饰邪营众”(《荀子·宥坐》)诛杀了少正卯。孔子对思想言论控制得如此冷峻无情,一丝不苟,儒家传统怎么可能有像彭国翔先生说的具有丰富的“自由主义”精神资源呢?已故学者王业霖先生说:“其实孔子也怪可怜的。当他在制定四杀条例的时候,自己正被别人当作思想界的异端而险遭诱捕扑杀。”

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哲学、伦理学的发展,有着许多宝贵精华。各家各派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辉煌贡献,尤其是儒家的仁爱思想、人道精神以及积极的入世态度,更是出类拔萃的一家,在诸子百家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儒家也好、法家也好、道家也好、墨家也好,除了有益的一面,都存在着不少有害的东西。我们在肯定儒家的价值与作用时,切不可把它无限拔高。我们还必须看到它的缺点、错误,看到它的消极性和局限性。对传统文化和古代经典,我们依然用得着毛泽东说过的话:去其糟粕,汲取精华,去芜存菁,批判接受。而不是盲目推崇,奉为圭臬。中国儒家传统的学理,从哲学角度看,它走的是人性本善论和“超人”哲学的路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走的是菲尔麦《先祖论》的《父权论》路径;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它不约而同走的是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具有的“泛爱”途径。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还要重复一句,中

国传统儒学好东西很多,缺少的,恰恰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精神。

## 二

民主制度也许并非人类社会最理想最完美的政治制度。然而,丘吉尔说:“民主有缺点。但迄今为止,它是最好的制度。”所谓民主的缺点,我的理解是,当民主不作为目的而作为手段和方法时,它常常可以被利用,被扭曲,甚至被彻底异化变质,变成专制极权的工具。古今中外都有这方面的例子。不仅拿破仑一世是一票一票选举出来的,拿破仑三世、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头子,就连德国的法西斯恶魔希特勒1933年上台得势,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在远古的希腊,苏格拉底被处死,阿拉克萨哥拉被驱逐出境,都是以民主方式做出决定的。中国也不乏这类实例。至于为什么会这种现象?据我研究,那是人性恶之干扰与破坏的结果。人性的干扰破坏,原因有三:(1)人的认知偏差(认识无知造成的)(2)人的利益驱动(自私贪婪造成的)(3)人的威胁逼迫(野蛮霸道造成的)。例如,受信仰、主义、学说、观点等影响的人,可能盲目跟进,这是盲从;受利益驱动,不问是非曲直,只为追逐私利,这是利从;受权力者的威胁、逼迫、恐吓,无奈跟进,这是屈从。以上三种因素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造成群盲多数。一旦这种多数形成,便有可能失去理性,对持不同意见和做法的少数进行无情的打击和疯狂的迫害。

民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今天西方民主的内容和程序,已远非古希腊原始民主可比了。美国的宪法不仅保证不同意见的绝对思想言论自由,而且有多如牛毛的法律保障人权,保护少数。世事错综复杂,少数有时可能是错误的,有时可能是正确的。保护少数,是尊重少数的权利。少数只要不触犯法律,应该受到保护。

## 三

彭国翔先生把从晚清开始,特别是五四前后,中国学界研究传统儒家理论的一些知识分子

称之为“现代儒家人物”(彭先生有时概念混用,又称之为“现代儒学人物”、“儒家人物”——笔者注)。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

我不知道“现代儒家人物”名称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这个名称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此名称无论是权威所定,是约定俗成,抑或彭先生自拟,我觉得都是不恰当的。研究某家学问,不等于某家传人。他可以是其拥戴者,亦可能是其批判者,或是半拥戴半批判者。判断一个人是哪家人物,应以他的主要思想意识和学术体系为依据。新儒学与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异(如徐复观先生)。新儒学学者既继承传统儒学的优秀遗产,又对传统儒学中的有害渣滓进行审读分解,剖析澄清。他们远远超越了儒家的思想窠臼,突破了儒家的正统。他们是学贯中西的新型知识分子(如胡适),是新学的助产士,是旧学的清道夫,而不是什么“儒家人物”、儒学教徒。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大震荡、大冲击、大分化,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无论哪一家,哪一派,哪一宗,哪一系,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热烈欢呼与倡导欧美舶来的“科学”与“民主”。彭先生说,“儒家人物对专制极权的批判,并非晚清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影响力的产物”,话虽说得不错,但不够完整。古代儒家人物批判固然不是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但晚清以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林语堂、余英时等,他们批判专制极权,除了自己的良知和责任心,他们留学西方所受的教育,不能说对他们毫无影响。正是由于他们负笈西洋,懂得了科学与民主的价值,他们对封建专制极权的批判,才更深刻,更理性,更具有时代意义。他们的批判与传统儒家的批判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不仅批判,还要建设。为了防止专制独裁死灰复燃,他们由衷地呼吁建立保障民权的民主体制。五四时代的学者、教授、作家、诗人、新闻记者、社会名流……无不满怀激情地呐喊要“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对这样一批人,不管他们后来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是研究儒家还是研究道家,我们都应该把他们称之为历史的开拓者,思想的启蒙人,而不应把他们简单归结为什么“儒家人物”。对中国来说,他们真正的贡献,是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文明之林,提供了新的思想养料和

精神资源。

#### 四

关于民主与道德,彭国翔先生文章有一段论述,仿佛靶场射的,未能击中靶心。彭先生说:“他们(现代儒家人物)立足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修正……对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仍然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段话,如果不是多余的,也是没有抓住要领。

民主政治制度,是制度;传统道德修养,是道德。这是两个不同的独立主体,是两码事。它们的功能与作用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修正谁、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就像建房的木工和瓦工一样,不是木匠修正、影响瓦匠,也不是瓦匠修正、影响木匠。他们修正、影响的是房子,而不是他们彼此个体。他们只是各司其职同心协力把房子造好。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偏废一端,忽略二者的作用。民主制度与道德修养二者共同针对的对象是人。它们要修正要影响的是人,是执政的人、掌权的人。民主制度是硬实力,是强制性的制衡人性恶的“铁棍”;道德修养是软实力,是教化性的

自律人性恶的“木棒”。它不是对政治制度实际运作发生影响,而只是对政治制度运作中的人发生影响。当道德修养对政治制度实际运作中的人不起作用时,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就会起到强制的作用。因此,民主制度比道德修养重要得多。它的作用遥遥领先于道德修养。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民主制度也很需要道德修养配合补充。不过当人的恶性发作,民主制度约束不起作用时,道德修养的教化,十之有八恐怕都会落空。改造人性之恶,是民主制度和道德修养的共同使命!

最后一个问题,彭先生说:“五四时代指出并强调中国传统内部具有自由和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正是胡适。”没错。胡适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不是现代儒家人物),但胡适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内部”,不知是哪家的传统内部?是儒家传统内部吗?如果不是儒家,那么儒家“具有自由和民主因素”的话,便要打问号了。我个人觉得,中国传统内部不管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即使有个别先贤具有自由民主因素,恐怕也不成学术体系和系统理论,而只是流星一闪,难成气候。■

(作者为安徽省芜湖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上接第83页)去包围邮局,去关邮局的门,但为什么他们不找邮局,却偏偏要找没有发行权的《解放日报》,关《解放日报》的门呢?因为这恰恰是设计者所要求的。因为抓住邮局,动摇不了市委,只有抓住《解放日报》,才能抓住市委。据说,聂元梓11月份来上海,就是奉命带着这样的意图来的。“《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不久,上海各造反派就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几万人大会,从此上海市委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解放日报》事件不是孤立的。这正是他们为打倒上海市委,使张春桥、姚文元能够登上上海市委一、二把手宝座所做的一个铺垫,而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就是从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开始的。因此,实际上这也是文革中为全国全面夺权所做的一次舆论准备,“《解放日报》事件”不过是他们棋局上的一枚棋子。正如《党史》二卷所述:“上海一月夺权的先例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

权’的序幕”,“上海的大政大权随即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现在,“《解放日报》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四十年了。三四十年后,作为对“《解放日报》事件”实际上并不怎么了解的赵元三,为什么现在要重提“《解放日报》事件”呢?是不是想以“《解放日报》事件”的见证人和造反派的发言人的身份来揭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呢?我们读了全文以后,发现他并没有揭发出什么秘密。再说,文革以后,党中央已经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已经作出结论,对所谓资反路线等等也作了诠释,对各地党委班子在他们恢复了组织生活后,也作了正确的评价。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对“《解放日报》事件”作出正确的评判。但奇怪的是,赵元三还是以过去的眼光,以文革的那一套逻辑来叙述“《解放日报》事件”。■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

○ 王树人 解芳雯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了赵元三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一文。这篇文章以“亲历者”的身份出现，给人印象讲的都是真的，似乎“红革会”要求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合理的”，而《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硬是不同意，是有意制造麻烦，因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最后因“中央文革”的干预，并责成上海市委要“端正态度”，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才使事件得到解决。好像这一事件不是造反派而是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挑起的。

关于赵文中的思想观点，我先不做评论。评论一件事的是非，首先要弄清事实，观点可以不同，事实只有一个。我是“《解放日报》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是谈判的当事人，也就是赵文中所说的“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赵文所讲的情况与我的亲身经历大不相同，因此想借《炎黄春秋》一角澄清一些事实，让读者明白事情的真相。

关于事件的缘起和矛盾的焦点。赵文说：红革会要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因为《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文章，要消毒。而且认为此前“已有先例”。说“红总司”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市委就曾同意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赵文说：“拒绝的理由是：夹在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同意《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以上许多话，赵文中都打了引号，似乎有人当场这样说过。但我作为参与谈判的当事人，

第一，我从没听说过《解放日报》曾和哪个报纸夹在一起发行过；第二，谈判时也没有听到谁说过赵文“引用”的那些话。最近我因家事到了上海，顺便询问当时也参加谈判的邮局发行处蒋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他说没有这回事。为了慎重起见，他还向处里的同志核实，都说没有。不知赵文讲的这段情节从何而来？

赵文又说：“红革会遭拒绝后，愤愤不平。再找市委联系不上，找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工作”，“他自己没有答应附送……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赵文又说：“‘红革会’眼看60万份《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绪焦躁不安起来了……零点敲过，20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烈起来……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事情经过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红革会”来人要求将《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我和接待室的负责人张伏年同志与他们开始谈判。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解放后早在50年代中央就决定“邮发合一”，报刊的发行工作由邮局管，解放日报只管编报，没有发行权。你们要批判《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我们欢迎，《红卫战报》要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我们也没有意见，怎么发行都可以，但发行归邮局管，关于发行问题，你们要去找邮局商量。（作者按：这次看了赵元三的文章，我才感到，当时我这样说实在是多余的。因为赵文说得很清楚，早在11月27日“红革会”就已向邮局报刊发行处提出了，说明“红革会”早已知道发行是邮局管，但为什么却要来找不管发行的《解放日报》呢，实际上是有意味

“找茬的”。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说了这么一大段傻话。)这样我们又把当时正在报社的邮局发行处蒋处长请过来一起谈。蒋处长对同时发行也没有说不可以，但关键在一个“夹”字。如果同时发行，就是同时投送，正像解放、文汇、人民等报纸谁订了都可以一起送一样，邮发人员的工作量差不多。但如果要“夹”在一起发行，几十万份报纸，要一份份打开来，再一份份把另一张报纸“夹”进去，需要有很多人力和时间，而这时已是深夜，人也找不到，要“夹”在一起发行，确实难以办到。但“红革会”的代表就是不答应。而且说，如果不同意，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我觉得他们实在不讲道理。因此我对他们说：“夹在一起发，邮局确有困难，你们说如果不‘夹’在一起发，《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这就不对了。这不是像姓张和姓李的吵架，却关了我姓王的门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红革会”的代表对于我们的话听不进，并开始堵住出报口，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老实说，赵文虽然自认为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情况。举个例子。赵文说：“……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第一，“红革会”代表这是第一次到解放日报来谈判，不是什么“继续”。第二，谈判地点也不在汉口路274号大楼三楼会议室，而是在汉口路309号底层接待室，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第三，至于谈判代表，报社一方就是我和张伏年同志，加上邮局发行处蒋处长，根本没有什么“文革筹”负责人，也没有什么“几位支部书记”；“红革会”代表也只有几个人，有时也有其他红卫兵进来，听一会儿就走了，根本没有什么“20余位红卫兵代表”。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29日晚，赵元三根本没有到过谈判现场“旁听”，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谈判的、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因此，他前面所讲的所谓“已有前例”以及“拒绝的理由”云云，完全是臆造之词或者是道听途说。有不少同志总误以为矛盾

的焦点是报社、市委不同意“同时发行”，其实焦点是个“夹”字。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实在难以办到。而不“夹”在一起，同时发送，一样可以达到批判《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得到红卫兵的理解而取得一致，非要“夹”在一起发行呢？前面我说是“找茬的”，其实不仅如此。这里我引用文革中解放日报造反派二把手虞伯贤写的《求索——我在“文革”中的造反史》书中的颇有意思的一段话：

红卫兵组织的报纸，批判省市党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出奇的是《红卫战报》来人交涉，要求把这期报纸夹在《解放日报》里同时发行，声称便于消毒。现在回头想想，这样的要求不仅天真也十分荒唐，几乎是无理取闹。你要揭要批，就揭就批吧，干吗要夹在一起同时发行呢？但在当时，却是一大“革命要求”，而且正打在“走资派的要害上”。在“文革”中，制造迫使“走资派”陷于被动的若干所谓“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一个过程或称之为模式：一开头都被人们习惯地看做是“无理取闹”，而一旦发生对立，逐步激化，两者矛盾也做了性质的转化。本来的“无理取闹”就转化为对红卫兵小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进而就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反路线一边的问题，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边，最后，这是站在革命还是反革命一边。这是一个陷阱，而走资派又偏偏（按：不是偏偏，是不得不）一步一步陷入这个陷阱。

在文革中，像这样无理变成有理，有理变成无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事情真是比比皆是。因此，当我看到赵文中说什么要求是“合理”的、是“革命要求”、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有什么“一队红卫兵排着整齐的行列进入报社”等等，真有点不寒而栗。（这里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引用虞书中的文字，不是说他讲的都是对的，他讲的有些也与事实不符）

“《解放日报》事件”是不是也是一个预设下的陷阱呢？回答是肯定的。按理，这是个实际的困难，为什么却不能得到红卫兵的理解取得一致呢？因为不符合“陷阱”设计者的要求。再退一步说，就是红卫兵一定要夹在一起发行，与邮局发生矛盾，那也应该去找邮局理论。（下转第81页）

# 痛别陆钦侃老友

○ 李 锐

老同事、好朋友陆钦侃去世(2011年4月11日)了,享年98岁。

他的女儿早已将他的病情告诉了我,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很难过。陆老住院期间在危重病室,医院不让探视。4月15日在八宝山告别,我很想参加,但因为感冒,为老伴和陆老的女儿所劝阻。

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在水电系统工作前后11年,是我此生最长的工作岗位。从1952年转业水电系统结识陆老,我们相识、相交60年了,真是一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

陆老是我主管水电建设的入门老师之一。他比我早两年上大学,是1936年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获得水利硕士学位,是名副其实能独立思考、具备真才实学的专家,绝不是随波逐流、逢迎上级的“科学家”。

1952年,我决心脱离坐而论道的工作,辞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以大学时学机械为由转业到工业部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转业不久,即偕陆钦侃出差闽、浙、苏、沪,时间达一月之久。一路上,我向钦侃求教水电建设知识,相互切磋,决心为中国水电建设做一番事业。此种至情,到老不衰。

我认识的老朋友、老同事中,浙江大学毕业的大都敢讲真话、能讲真话(这可能同校长竺可桢治校有关)。这样的人很多,水平也很高,陆老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遇事沉着冷静,认真负责到底,能坚持、有担当。

1982年我虽然离开了水电工作岗位,但关于三峡水电站的修建,仍旧关心。可以说,围绕中国的水电建设,我和陆老都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友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尊重,有共同理想,有共同

认知,尤其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1979年随能源代表团到巴西和美国参观考察,我邀陆老同行,详细了解两国水电发展的情况。

陆老一生,最值得大书特书之事是围绕三峡工程的所作所为。

早在1946年,陆钦侃就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派遣,赴美国垦务局,在坝工专家萨凡其等人的领导下,从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一直从事我国的水电规划,任水电勘测设计总院的副总工程师。1988年,陆钦侃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拒绝在最后的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论证期间,他多次与其他人联合,或个人单独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峡工程上马以后,他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先后六次上书并发表文章,恳陈将三峡工程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在我代为上转的多次上书中,陆老都是上书的执笔人,名字排在第一位,其心可昭日月!

一位“主建派”代表人物曾公开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我想,在这些当人当中,我李锐可算一个,陆钦侃也受之无愧。

从围绕三峡工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陆老是一位始终敢于独立思考,坚持自己意见的人。我觉得以陆钦侃为代表的一批水电老专家,从来埋头苦干,不事喧哗,不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追求的境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确是现在的年轻人应当学习的一种品格。

多年前,陆老80大寿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祝贺:智乐河川不老翁,水能利用永先锋。西江石壁如何立,四十年来不苟同。

就事业和为人而言,借用我国的古喻:陆钦侃和施嘉炆、黄万里、张昌龄、程学敏、王伊复等这一批老水利、水电专家一样,都不是风中杨柳,更不

是墙上芦苇,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松。

前段时间,一位忘年交的朋友给我送来一份《中国青年报》,上面发有一篇纪念陆钦侃的文章,题目《向良知和骨气致敬》。我想照抄照搬这

句话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向良知和骨气致敬!  
向陆钦侃同志致敬!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书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费    |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锐             | 22.80  | 6.00  |
|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 史景迁            | 19.60  | 6.00  |
| 高岗传                           | 戴茂林、赵晓光        | 59.00  | 7.00  |
|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 冯亚光            | 126.00 | 12.00 |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施用勤译           | 58.00  | 8.00  |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 150.00 | 12.00 |
|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黄宗良等       | 246.00 | 20.00 |
|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图文实录       | 丁伟             | 48.00  | 7.00  |
| 中国国情读本                        | 中国年鉴社编         | 30.00  | 6.00  |
|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 38.00  | 7.00  |
| 国学大师之死                        | 同道             | 29.00  | 7.00  |
| 人生三路口:宗教、道德与人生                | 梁漱溟            | 28.00  | 6.00  |
|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 雷颐             | 29.80  | 7.00  |
| 最后的皇族                         | 龙翔、泉明          | 38.00  | 7.00  |
|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 梁漱溟            | 43.00  | 8.00  |
|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 杨奎松            | 88.00  | 10.00 |
|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 何方             | 39.80  | 7.00  |
|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 28.00  | 6.00  |
| 党员、党权与党争                      | 王奇生            | 48.00  | 8.00  |
|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 白永达            | 22.00  | 6.00  |
|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 肖复兴            | 25.00  | 6.00  |
| 国家记忆                          | 章东磐            | 98.00  | 10.00 |
|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 乔云华            | 58.00  | 8.00  |
| 王光美私人相册                       | 罗海岩编著          | 42.00  | 7.00  |
|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 38.00  | 7.00  |
|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 丁三著            | 32.00  | 7.00  |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 49.00  | 8.00  |
|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 金以林著           | 48.00  | 8.00  |
|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 尹家民            | 95.00  | 10.00 |
| 历史:何以至此                       | 雷颐             | 28.00  | 6.00  |
|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 徐孔             | 29.80  | 6.00  |
|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 沈志华主编          | 148.00 | 12.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6.00  | 7.00  |
| 三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四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张闻天在1935~1938                 | 张培森主编          | 17.00  | 6.00  |
|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 张培森著           | 20.00  | 6.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 杨天石            | 60.00  | 8.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 杨天石            | 38.00  | 6.00  |
| “中间地带”的革命                     | 杨奎松            | 54.00  | 9.00  |
| 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 张琦主编           | 48.00  | 9.00  |
| 牛棚杂忆                          | 季羨林            | 29.00  | 7.00  |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 林贤治主编          | 38.00  | 7.00  |
| 中南海人物春秋                       | 顾保孜            | 78.00  | 7.00  |
|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 李立宁 孟新         | 48.00  | 7.00  |
|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 孟庆春            | 49.80  | 7.00  |
|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 侯井天            | 98.00  | 11.00 |
|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 朱正             | 26.00  | 7.00  |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吴思             | 28.00  | 6.00  |
|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 吴思             | 28.00  | 6.00  |
| 国史札记(史论篇)                     | 林蕴辉            | 38.00  | 7.00  |
|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 28.00  | 7.00  |
|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 39.00  | 8.00  |
| 官场怪圈定律                        | 李茗公著           | 46.00  | 8.00  |
| 走出个人崇拜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 薄一波            | 88.00  | 11.00 |
| 夹边沟记事                         | 杨宝惠            | 34.00  | 7.00  |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 沈宝祥            | 39.80  | 8.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煌             | 21.00  | 5.00  |
|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 于光远            | 36.00  | 7.00  |

## 代购代邮

《高岗传》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高岗的传记。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岗曾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作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从陕北到东北再到华北,在不同历史时期,他曾先后任西北中央局书记、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在高岗进京担任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一年多的时间,便背上“反党夺权”的罪名,落得身败名裂,自杀身亡的悲惨下场。

“高饶事件”亦称“高饶反党联盟”,是建国后党内斗争的第一个重大事件,高岗的死亡并未使得该事件平息,相反围绕着“高饶事件”的风波却再三发生,1955年5月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又演变为“彭高联盟”。

本书是作者磨砺了十五年的心血之作,力图拂去岁月的灰尘,还原一个真实的高岗。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最主要的领袖,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直到1918年1月间做了大量的演讲和报告。本书收录的文章和报告不仅全面细致的展现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脉络和重要活动,而且对革命的意义和得失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不失为研究十月革命进程、细节和影响的第一手材料。

《西路军》西路军是党史上的一件大事,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应当怎样评价他的历史作用?本套书完整、系统地记叙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后,何以能以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年的20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 苏联顾问与斯大林模式移植东欧

○ 徐元宫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宣告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

苏东剧变多米诺骨牌效应何以会发生?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原先的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种高度同质性的“质”就是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度集中,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整个国家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各企业和生产单位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处理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高度集中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整个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苏联共产党一党之手,在苏共党内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一人之手,党内民主及社会民主仅停留在口头或者文字等外在形式的层面上,正常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缺失,对党、国家及社会事务的管理,则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各级干部则自下而上地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和唯命是从,全党乃至整个国家则最终形成对党的领袖的顶礼膜拜。高度集中在思想和文化上的表现,则是以斯大林主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各种与之相悖的思想和学说基本上都遭到扼杀,公民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遭受钳制。高度集中在社会领域的表现,则是整个社会在包括国家安全机构在内的国家机器的高效、严酷的管控下,缺乏个性、创造性和生机活力,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彼此戒备、猜忌,往往为了自保而不惜做告密者甚至诬告者。

高度集中是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举全党乃至全国之人、财、物力办事是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在特定的时期里,比如遭受敌国入侵战争的时候,这种高度集中往往会产生比较积极的良好效果;可是,在长期的和平的社

会主义建设年代里,这种高度集中往往会造成比较消极的负面后果,这种消极后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淤积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和清除,最终便会酿成这种模式的社会认同度日渐式微。

随着苏联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这一模式的优点和弊端也被移植到了这些国家。当这一模式的优点日渐式微、而其弊端不断淤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就势在必行。那么,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怎样移植到东欧各国去的呢?解密档案材料表明:苏联政府派驻东欧各国的政治、军事顾问是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去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拟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为根据,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的重要机制——苏联顾问机制进行历史解读。

## 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的历史回顾

解密档案材料证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顾问就已经在东欧地区出现了,只是这时苏联顾问的任职时间比较短,其任务主要是帮助驻在国解决一些与军事相关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比如对空防御、警察部队和内卫部队的创建、国家要人的卫队组建等问题。比如1945年3月就有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在波兰活动,根据规定苏联顾问只能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开展直接活动,而在其他地区应当“通过波兰的相应机构的负责人,而不是直接地”开展工作。

随着东西方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冷战的加剧,1947年夏天苏联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东欧政策,将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1944~1947年东欧各国开展的民主革命进程被迫中断,在1947~1948年东欧各国纷纷走上苏联模



式的社会革新道路。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行苏联模式,从1949年夏天开始苏联加快了驻东欧各国苏联顾问体系的建设,派出的顾问人数逐渐增多,任期也延长了,并且首先是军事顾问的人数和任期得到了调整。被苏联政府挑选出来派遣到东欧地区担任军事顾问的一般都是苏联将军和老资格军官。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来看,1949年秋天驻东欧地区的苏联顾问的具体人数是:保加利亚有29名,匈牙利有13名,罗马尼亚有11名,捷克斯洛伐克有8名,共计61名军事顾问;而只有罗马尼亚有9名非军事顾问。

波兰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战争年代和战后最初几年,苏联军官直接编入波兰军队编制内并担任从师长一级到国防部长一级的具体职务。由于预先双方并没有约定好苏联军官留驻波兰军队的期限,而且苏联军官可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组织办理党员登记并且过组织生活,所以就无须在波兰军队再专门设置苏联顾问团了。1952年夏天,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建议按照苏联往东欧地区其他国家派遣顾问的原则向波兰派遣顾问,于是从1953年夏天开始苏联军官不再编入波兰军队,而改为派遣苏联顾问到波兰军队,同对东欧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截至1955年,苏联大约派遣了150名顾问到波兰军队,其中包括派往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18名顾问。

50年代初苏联派驻东欧地区的顾问人数急剧增加,1950年6月2日莫洛托夫呈交给苏联部长会议的一封密信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今年5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委托,我提交一份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去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工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确定:派遣到这些国家去的专家为76名,取代维辛斯基同志草案中建议的144名专家和这些国家政府所提出的265名。专家驻留期限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建议定为2个月到2年不等。外交部草案拟定的最高期限为3年。决议草案已征得相关部委的同意。B.莫洛托夫”。此信表明,到50年代初,不仅苏联派驻东欧地区的顾问人数大幅增加,而且其任期也延长了。

1950年代初苏联驻东欧各国陆军、海军、空军、国家安全部、内务部、边防站和海关的军事顾

问系统形成了,临近1952年春天苏联驻东欧各国非军事顾问系统也基本形成。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派驻东欧地区的苏联军事顾问和非军事顾问的工作条件和劳动报酬与驻在国相应级别专家的标准一样,在这个基础上签订了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双边条约和双边协议等法律文件。

苏共20大之后,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发生以及东欧各国民族精英力量的加强,苏联驻东欧地区顾问系统开始收缩。

## 驻东欧地区苏联顾问的职责及其活动

驻东欧地区苏联顾问的职责和权限是怎样的?1951年10月批准生效的《顾问守则》给我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苏联顾问必须“用自己的建议”、但是只能是口头形式的建议给驻在国安全部门和警察机构提供帮助,向驻在国领导人通报安全部门的工作情况,但是只有在征得苏联国家安全部的批准之后才可以这样做。禁止顾问代行驻在国工作人员的职权,禁止顾问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禁止顾问亲自审问被逮捕的人,禁止顾问参与“研究”驻在国领导人,禁止顾问就驻在国政治、经济问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问题提出意见。

1952年5月苏联又批准生效了两个规范性文件:《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对被派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机关和企业去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领导的决议》及其附件《对于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机关和企业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指示》,对派驻东欧地区的苏联非军事顾问的职责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遵照各驻在国的党的政治方针,作为参谋和顾问,帮助完成每一项具体工作;在提出和解决组织上的问题和具体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必须表现出主动性。顾问无权干涉驻在国领导人做出最后决定,无权直接参与贯彻这些决定的具体实际活动。只有在征得大使的同意或者受大使的委托征得主管经济问题的参赞同意之后,顾问才被允许就驻在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问题提出建议。在出现了争议的情况下,主管经济

问题的参赞有权找驻在国的上级机构进行交涉，但是必须是在征得大使的同意之后。

那么驻东欧地区苏联顾问的实际活动是否遵守了上述守则、决议和指示呢？他们究竟在东欧地区开展了哪些活动？

第一，全面而广泛地收集有关驻在国内政和外交的各种情报并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为莫斯科决策服务。比如，1947年6月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门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的П.Б.古利亚耶夫给莫斯科发回了一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详细分析报告，报告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无力掌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中共产党员的人数非常少，甚至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几个部里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在内务部，48名司局级领导人中只有14名共产党员，财政部75名同级别工作人员中只有5名共产党员，而在由其他党派的党员担任部长的部里情况则还要糟糕。比如，在社会民主党人……担任部长的工业部里，131名领导干部中只有13名共产党员，外交部51名领导干部中只有7名共产党员，司法部只有2名共产党员，并且这些人都是担任次要的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了消极的结论：“共产党领导人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了争取议会的大多数上面，却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去摧毁反动派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中产阶级中的最重要的势力。因此，一个组织严密、有着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古利亚耶夫的情报引起了苏联最高层领导人的极大不安，М.А.苏斯洛夫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门专门对捷克斯洛伐克各个部的领导干部的党派属性进行了统计：165名部级领导人中有42名共产党员，858名司局级领导人中有154名共产党员。而国防部的情况更令苏联领导人担心，因为从1947年5月起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就不断收到关于“右派政党的可怕意图在于消除进步政治人士首先是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影响”的情报。

诸如此类的情报从东欧各国不断地汇集到莫斯科，一方面是西欧发生了一连串令苏联领导人始料不及的重大政治事件：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急剧恶

化，芬兰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法国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法国政府、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被赶出意大利内阁，西欧社会情绪开始向右摇摆，另一方面是东欧各国极为严峻的政治形势，这一客观现实不能不让苏联领导人和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东欧各国共产党也会重蹈西欧各国共产党的覆辙，这就促使苏联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对东欧政策，开始积极地推进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斗争方式解除联合政府、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将苏联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

第二，按照苏联模式积极推进东欧各国建立或者改组东欧各国国家机器，促使东欧各国建立极权主义政治。

鉴于1945年3月И.А.谢罗夫将军和П.Я.梅希克将军到波兰去担任顾问，苏联研究制订了《关于（驻波兰公共安全部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权力和职责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苏联顾问的任务包括帮助组建波兰公共安全部机关、警察机关、内卫部队、边防站、侦察机关、特务机关和侦讯机关。1949年东欧各国国家安全部门成为苏联顾问的一个主要活动领域，1949年秋天苏联国家安全部成立了一个局，这个局专门负责“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机构”，境外的情报从境外的顾问们那里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个局。顾问们直接参与了东欧各国安全机构的建立，直接将苏联强力部门的活动机制和工作方法移植到东欧各国。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东欧各国都改组了内务部。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分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苏联模式的政府部门。

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保卫国家边界安全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苏联领导人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因而东欧各国军队成为苏联顾问的又一个重要活动领域，50年代初苏联驻东欧各国陆军、海军、空军、国家安全部、内务部、边防站和海关的军事顾问系统形成了，1950～1951年大批苏联军事顾问被派驻到东欧各国军队。当时，莫斯科决定：苏联的将军和高级军官担任东欧各国军事部长、总参谋长及其下属各局局长、各大军事院校、各兵种、各军种、各集团军、各军和各师的指挥官的顾问并且

延长驻留期限。顾问们不仅帮助驻在国解决诸如军队的建设、管理、装备和训练等纯粹的专业问题,而且还负责监督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的政治倾向,苏联领导人特别关注这类情报。比如1950年1月苏联驻罗马尼亚国防部总军事顾问K.C.科尔加诺夫将军通过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汇报了有关某些罗马尼亚将军的立场问题,报告的结论指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书记处‘没有按计划地和具体地关心和操持军队’;军队需要充实政工干部,将‘年轻的、有能力的和忠诚的人’提拔上来,最好是将中校提拔上来取代将军。随着大批苏联顾问进驻东欧各国军队,东欧各国军队中的大批军官遭到了清洗,很多参加过二战的东欧各国职业军官被迫退伍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第三,严密监视驻在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坚决清除有碍推行苏联模式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档案材料证明:苏联顾问严密监视驻在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状况,坚决清除推行苏联模式道路上的障碍。1948年5月,驻保加利亚苏联总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中将向苏联国防部长H.A.布尔加宁汇报了关于保加利亚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思想情绪。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这一情报是从保加利亚将军И.基诺夫那里得来的,И.基诺夫曾经在苏联军队服役20年,担任过中校,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军队的将军,他在同苏联顾问讨论苏、南冲突问题的时候表示:“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中有一批人对苏联在保加利亚解放事业中的作用评价不高,这些人是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科斯托夫、内务部部长尤戈夫和财政部部长斯特凡诺夫。彼得鲁舍夫斯基阐述了他本人对于保加利亚形势的观察:‘……5月1日以相当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了铁托的亲合力……扑入视野的是无数的铁托画像……居然有一个单位举着铁托的画像走在了斯大林同志的画像的前面’。莫斯科非常重视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这份情报,12月7日当苏联和保加利亚两国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会晤的时候斯大林对保加利亚领导人提出了对科斯托夫和尤戈夫不信任的问题。不久,科斯托夫和尤戈夫等人就厄运临头了!”

在冷战加剧的背景下,苏联领导人不会容许东欧各国游离于苏联的指挥棒,但凡敢于尝试走本民族特色道路的东欧各国领导人都必然会受到镇压,而上述驻保加利亚苏联总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发回莫斯科的有关科斯托夫等人的情报则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 苏联向东欧地区派驻顾问的影响和后果

战后大批苏联顾问长期派驻东欧地区,给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首先,战后初期,也就是在1944~1947年,东欧地区进行了深刻的民主改革,东欧所有国家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形式的社会政治联合,然而随着苏联东欧政策的根本改变,大批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地区,苏联模式被强加给东欧各国,从而人为地中断了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革命进程,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在东欧各国建立起来。正如本·福凯斯在《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50年代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自己的‘小斯大林’。在保加利亚是契尔文科夫,在罗马尼亚是乔治乌—德治,在波兰是贝鲁特,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哥特瓦尔德,在匈牙利是拉科西,在阿尔巴尼亚是霍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乌布利希。他们都享受着官方发起的对他们的吹捧,其程度仅次于斯大林本人。”

其次,苏联顾问肩负着在东欧地区推广苏联模式的使命,因而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地区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苏联模式推广的过程,从而也是清除苏联模式推广道路上的障碍的过程,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中那些轻视或者怀疑苏联模式、尝试走本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人们都受到了坚决的镇压和清洗,像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罗马尼亚的帕特勒什卡努等人遭到了清洗,另一方面这种清洗又被东欧各国部分共产党领导人用来作为清除本国政治对手、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的一种手段,这些人竭力向苏联领导人表示忠心,坚决忠实于苏联模式,坚决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利用让苏联领导人特别敏感的种种“罪

行”置自己的政治对手于死地。比如,1949年12月14日保加利亚法庭对科斯托夫作出了死刑判决,可是还在法院判决之前——1949年12月12日在争夺国家最高权力斗争中已经稳操胜券的契尔文科夫就已经向斯大林通报了即将宣判的结果,这份情况通报的附言很能说明问题:“假如有意见,请告诉我们!”然而,莫斯科没有发来任何“意见”,也就是默许了即将宣判的结果,于是判决就被执行了。因此,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地区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东欧各国政治斗争此起彼伏、揭批和镇压“人民敌人”的活动持续不断,使所有的人都笼罩在政治恐怖之中,从而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东欧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种子。

第三,上述揭批和镇压“人民敌人”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东欧各国国内,而且还波及整个东欧地区,比如匈牙利的拉科西在清除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拉伊克之后,异乎寻常地积极推进拉伊克“案件”的“国际主义化”,他对东欧其他国家“不着急揭露或者根本就不揭露混进党的领导层的奸细和间谍”表示非常惊奇,在同苏联顾问交谈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不够坚定。1950年初Г.С.叶夫多基缅科上校从匈牙利发回莫斯科的一份情报就证明了这一点:“……拉科西同志在很多次交谈中常常跑题,他所谈的话题与匈牙利国内事务没有关系,其中,他表达了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事务的关心。比如,拉科西同志说,捷克人的事情搞得很糟糕,用他的话来说,中央委员会里潜伏着……间谍。哥特瓦尔德同志和斯兰斯基同志不够坚定并且对党内的敌对分子表现出了纵容和姑息的态度。似乎他们不屑去学一学匈牙利人是如何粉碎敌人的……至于波兰人,拉科西同志说,在那里有很多的……敌人……”这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别国内部事务妄加评论、指手画脚,而且通过苏联顾问向莫斯科告状本身,都说明了国家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后来斯兰斯基被判处死刑,不能说丝毫没有拉科西的“功劳”。因此,伴随着苏联顾问的到来,不仅东欧各国国内处于政治恐怖气氛之中,而且整个东欧地区各国领导人之间也都处于互不信任、彼此猜疑的氛围之中。因此,大党主

义、大国主义以及极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是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地区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各国,在实现了苏联领导人全面监督和完全控制东欧各国的目的的同时,成功地将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移植到了东欧各国,在移植初期这一模式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模式所固有的弊端日渐淤积却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清除和消解,最终使这一模式及其诞生地——苏联一道寿终正寝,使这一模式的移植地——东欧各国发生了历史剧变,高度的同质性使苏东剧变多米诺骨牌效应得以发生。■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书屋 2011年第8期目录

|      |   |  |
|------|---|--|
| 书屋讲坛 | 武昌首义果真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吗?  | 漫 征                                    |
| 学界新论 | 后文凭时代<br>“学校化教育”与文凭社会<br>高等教育的蹈空与踏实                                   | 陈心想<br>方建锋<br>郝 稷                      |
| 人物春秋 | 蔡以忱:“铸剑”人的清官身世<br>老舍和曹禺<br>“饕餮未必非名士”<br>复旦园中的章培恒先生                    | 飞 翼<br>震 烁<br>李晓灵<br>王学斌<br>周 言        |
| 湖湘人物 | “戴仁而行,抱义而处”<br>传统文化世家与民族文化神髓的承传<br>乱世尚有王湘绮                            | 秦燕春<br>吴培显<br>陈书良                      |
| 灯下随笔 | “一片婆心哀妇人”<br>男作家笔下的“娜拉们”<br>从王国维对白话诗的态度谈起<br>回头再看安徒生                  | 张 阳<br>张春田<br>潘建伟<br>李红叶<br>刘源俊        |
| 口述历史 | 哲学与科学答客问  |  |
| 书林折枝 |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观<br>——读于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br>旧书新读,其味醇厚<br>探索中国现代文化的原点<br>坏学校也出好学生  | 郑佳明<br>张昭卿<br>刘晓燕<br>谢 泳               |
| 说长论短 | 缺乏人生艺术化的时代<br>租界的迷思<br>多读几本好书<br>古典诗词的精神世界<br>谏议工业园区的运行之道<br>孔子之死真相探析 | 刘剑梅<br>陈 娜<br>倪章荣<br>李 工<br>陈华东<br>宋 红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个人出书、单位出书约稿通知

## 一、约稿范围

1、**文史类书稿** 回忆录、自传或其他人物传记、年鉴、地方志、历史与文化记录、历史事件实录、或其它历史纪实作品等；

2、**社科研究著作书稿**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与伦理、历史研究、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

3、**文学类书稿** 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个人专著、作品集；

4、**小说类书稿** 历史、当代商战、言情、武侠、反腐等各类题材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作品；

5、**美术类书稿** 绘画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作品集；书法类：毛笔、硬笔、篆刻等作品集；摄影类：风光、人物、旅游、收藏等专业或业余摄影作品集。

6、**其他学术研究著作** 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教育教学等领域学术研究著作、论文、各级课题研究成果等；

7、**博客博文** 各类题材以及不限体裁的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

## 二、书稿要求

书稿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可以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

多人合集可以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每位作者单独或多篇作品字数应达到3万字以上。

## 三、出书办法

与出版社合作，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其中国内出版的，由国内相关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可以丛书形式出书（如：社科文献论丛、探索文库系列）和单独出书。书稿达到出书水平的，按合作出书方式的办法；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的办法。

## 四、其它事宜

1、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订标准合同；2、约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一到二周内回复；3、来稿请勿寄原稿（手稿），保证字迹工整、清楚，已编好目录、顺序；4、书稿经审阅，如达到出书水平，我们将及时通知作者，如经审阅不符合要求，作者可要求退稿（挂号或特快退回，须自付邮资）；5、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E-mail）更佳，来稿时附彩色近照一张，200字内简历一份，注明联系地址、电话；6、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文史类：《哲学大师冯友兰》 社科·心理研究类：《人体波动原理》 美术·绘画类：《虎姐历险记》 长篇小说类：《梦幻终点》 社科·励志类：《第七大营养素》

（更多作品展示，敬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http://shop.chinesezj.com/>；约稿详情请浏览网站：<http://www.zuojia.com>）

24小时全国免费投稿热线电话：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邮编100025）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mailto:bookbj@126.com)；[bookbj@bookHK.com](mailto:bookbj@bookHK.com)  
编辑直拨电话：010-57733087、57733088、57733086 单位总机：010-89506525 传真：010-89506878  
联系人：伽悦、文馨、高晶（编辑）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zuojia.com>（中华出版热线）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 业务范围：

- 老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版权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路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 作品展示





##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家史家谱

###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家史家谱：先烈纪念集、先辈遗文集，家族百年史、家谱族谱等。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 相关说明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一般32开本，“家族史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设计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要书号发行的另行协商。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说明赠送样书。

服务热线：010-68920114 68920399

咨询接待：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 代理与合作

- 1、出版社编辑合作：出版社每年都有大量书稿不能正常出版，编辑可以介绍到我们机构自费出版；我们支付劳务费用并邀请介绍人担任责编支付编审费。
- 2、媒体栏目合作：愿同报刊杂志、电台网站、电视台等媒体合作开设“家族文化、姓氏文化”专栏、讲座，既丰富了媒体内容，又能共享业务利润。
- 3、地方业务代理：有业务资源和组稿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协商开办“个人出书、家族出书”地方业务代理或加盟开办“书店、网站、讲座、出版”综合型一体化地方分站。

合作商谈：赵经理13693607606 李经理13031198980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 邮编100080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net)

#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2011年5期,文革前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文第31页左列倒数第四行“郑庭苙”应为“郑庭笈”,第84页注释中:左列正数第二行“李义勳”应为“李以勳”。  
江西读者 黄蜀井

贵刊2011年第5期第58页刊登的《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一文中的“1958—1962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表的说明中,提到浙江温州府“未经历灾荒”,这不符合事实。其实那时温州各县均有灾荒,就以我生活的平阳县来说,农村出现大量逃荒、饿死现象,至于“瓜菜代”、“浮肿病”则更普遍。2009年平阳文史资料第26期刊登黄卫初《万全饿病死亡事件始末》载:万全公社在1960年死亡3481人(据平阳粮食志载是1960年2、3月份),占公社总人口4.6%。死者1~15岁1090人,16~50岁650人,51~60岁515人,61岁以上1226人。破家荡产94户,卖儿卖女321人,妻离子散161户,其中宋桥金桥大队最严重,死亡率达12.99%。贫农周中宣,一家五口,房屋、家具全部卖光,母女死亡,妻改嫁,家破人亡,类似这种情况全大队有13户,7月23日宋华管理区47名浮肿病人下田割稻当场昏倒4人,至8月中旬,47人中死37人,灾荒起因是刮“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高征购,干部作风恶劣,如宋桥管理区被吊打群众85人,致死34人。万全公社是平阳主要产粮区,素有平阳乃至温州粮仓之称。万全公社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如平阳的宜山、钱库、金乡等区(今属苍南县)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逃荒、讨饭以及饿死人之事人人皆知,所有这些说明温州与全国一样也经历灾荒,特此说明。

浙江平阳 温兴路

贵刊2011年第5期刊登的《我走进了“胡风分子”圈》一文,其中写道:“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见第79页)据笔者所知,似乎有误:刘少奇和陈毅都没有被逮捕:刘少奇自1967年7月中旬在中南海被批斗后,囚于家中,失去自由,属于“监护”,后来在“监护”中病逝于开封;陈毅虽然遭到过批判,但既未被逮捕,也没有被“监护”。“监护”是当时中央对部分中央以及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实施的比较普遍的囚禁方法,但有别于逮捕和监狱关押。

长春读者 莽东鸿

读贵刊今年第4期董时进先生给毛泽东的信有以下体会:我是陕西省长安县王曲藏驾庄人,庄内居住着孙、杜、李三大户。“土改”前,每个大户都有着自己的共有土地,分散出租给本户的人耕作,所收的租子用以本户族的公益事,如:清明祭祖,春节期间耍社火,延请教师在本村的“五道庙”办小学……“土改”时,把户族的共有土地,全部分给了农户,就断绝了村中公益事业的经济财源。我亲眼看到村干部挨家挨户为办学按各家土地的多少收取费用的窘况,因为一些土地拥有者,已经居住到城市里,还得到城里收钱,而居住在城里的人的子弟,不在农村上学,故多不愿意交办学费用。

另外,王曲镇的其他村子也有类似情况,如王曲圪塔坊村,有共有土地时,村上成立有自乐班,每到冬季就请教师,为爱好秦腔的村民教唱,“土改”后,就无法办了。合作化后,情况变得更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就不多谈了。总之,“土改”和“合作化”对农村经济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孙恒毅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同时也在贵刊发表过一篇批判康生的文章。

今读周密在贵刊今年第4期发表的《走出秦城的周扬》一文,作为女儿,周密同情父亲,这是可以理解的。介绍周扬晚年的不幸,也是值得称道的。作为读者,我也同情周扬晚年的不幸。但文中有一句要命的话:“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2011年4期52页)《作家文摘》转载此文时,也有这句话(2011年4月22日11版)。我不知道贾植芳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总觉得这句话不科学,缺乏依据。历史是不能如此的。这话是不是为周扬开脱?是不是为胡风或丁玲加罪?是不是说周扬、胡风、丁玲“半斤八两”,都是“左”的,都是整人的,都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实上不是如此。丁玲也当过权,也主持过重要工作,她没有给谁制造冤假错案。胡风也当过权,也主持过相当的工作,他只是在文艺观点上有不同主张,没有给谁制造冤假错案。丁玲或胡风都是“左”的倾向的受害者、牺牲品。他们怎么可能“比周扬还周扬”呢?

李文杰(广西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

贵刊今年第5期登载何方老师《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一文中,“1945年接待政协访问团”一句,何方老师记拧了。1945年7月初,去延安访问的,是国民党参政会的六位参政员。他们是:褚辅成、黄炎培、冷通、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均以私人名义去的,并非由参政会组团。  
褚律元



#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感言

。 杜导正

《炎黄春秋》创刊20年了。作为这份刊物的创始人之一，作为这份杂志的主持者，我感慨良多。

《炎黄春秋》是1991年7月1日创刊的。1989年那场风波，使80年代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进程出现了断裂，到1991年，是改革开放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三年，也是争论最激烈的三年。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炎黄春秋》，关注历史与现实，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使命。

在萧克将军点将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想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是，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的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以邓小平等老一代为主导、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着力推动的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杂志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从20年的刊物来看，我们基本上守住了这两条。尽管有一些不足，但这两条是旗帜鲜明的。我们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采取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了科学的态度。那就是公正、客观，也就是萧克将军多次强调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尤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我们有了很多的突破。有些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当年，是要冒相当风险的。在这种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我们的作者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今天的镜鉴，又引申出今日的主张，那就是，必须坚定地全面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决反对开历史倒车。

2005年前后，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现实的关注。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



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或者说民主宪政推进的速度，则相对迟缓，有时候停滞不前，甚至有倒退的时候。这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背道而驰的。我们在众多作者和读者的勉励下，高举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旗帜，有针对性地组织相当数量的文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推动社会对于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五年来，我们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20年来，这份杂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的作者。他们或是资深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对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这样的作者队伍也表明，这份杂志所确立的办刊方针，反映了这种群体性的诉求。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但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的诉求和大力支持，如果这个诉求不适应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绝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我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用“扭秧歌”来形容。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扭秧歌”。在这样的时代，这份杂志在受到各方面鼓励的同时，也常常受到个别权力部门的批评，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时代总是在风风雨雨中前进，这份杂志也一样。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就不多说了。

我代表杂志社，对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作者、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对曾经在这份杂志工作过的同志表示感谢！对现在仍在杂志社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杨汝岱在庆典上发言。

○ 杨汝岱

首先对《炎黄春秋》创刊 20 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每期都要认真地看。我周围一些关心政治的朋友，我都介绍给他们看。我认为，这个刊物有两大特点：一个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刊物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反映其真实的面目。第二个特点，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党的建设，希望我们党永葆革命的青春。我看了第 7 期纪念建党 90 周年的六篇文章，觉得很有针对性。我想，我们只要按照这六篇文章的意思去做，我们的党就能够永葆革命的青春。

##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贺词

值此《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杂志社全体同仁表示诚挚的祝贺！

创刊于 1991 年 7 月的纪实性月刊《炎黄春秋》，是我会的一个学术文化品牌。这份期刊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改革开放为宗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依据翔实史料，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公正，求实存真，以史资治。尽管我们的工作还需要不断改进，但 14 万多份的发行量且绝大部分为自费订阅，说明这份期刊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希望杂志社继续努力把握正确导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精神，切实做好杂志社的转企改制工作，抓住发展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许嘉璐

2011 年 7 月 18 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张希清代表会长许嘉璐宣读贺词。

# 《炎黄春秋》二十周年庆典

2011年7月18日上午,《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庆典在京隆重举行,本刊顾问、编委、作者、读者近二百人出席庆典,济济一堂。庆典由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友情主持。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汝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等到会祝贺。社长杜导正讲话,总编辑吴思总结汇报了20年来杂志社的主要工作。本刊主管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代表会长许嘉璐宣读贺词,周有光、李锐、郭道晖、江平、张大中、资中筠、郭德宏、蒋彦永等十余位来宾发言,对本刊的工作表示肯定和鼓励。数十家媒体及本刊历年工作人员参加了庆典。出席庆典的来宾有(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东 卫毅 马长虹 马立诚 马仲廉 马懋如 尹骥 王才 王恂  
 王也扬 王克明 王彦君 王春瑜 王强华 王雁南 王俊义 冯健 白介夫  
 白博翰 艾若 刘仰东 刘志琴 孙振 孙大午 庄重 曲润海 朱玫  
 朱顺忠 江平 许人俊 齐明昌 何方 何燕凌 吴象 宋群 宋以敏  
 张万舒 张万龄 张北英 张希清 张秀平 张明江 张思之 张荣华 张素芳  
 张绪山 张惠卿 张静娴 李乔 李锐 李永忠 李树桥 李胜平 李欲晓  
 李维民 杜光 杜明明 杨洁 杨天石 杨汝岱 沈宝祥 苏双碧 谷秀敏  
 邵燕祥 陈大斌 陈四益 陈冰峰 陈徒手 陈晓萍 周密 周有光 季音  
 屈忠 岳德明 林冰 林耀 林蕴晖 茅于軾 郑仲兵 姚监复 姜军  
 施亮 洪炉 胡翼燕 赵淮青 赵德润 郝怀明 钟沛璋 展江 徐宝珍  
 秦晖 秦肖娜 袁鹰 资中筠 郭宇宽 郭道晖 钱行 顾骧 高放  
 高明国 崔永元 曹思源 章立凡 章百家 章治和 黄钟 彭迪 程建宁  
 蒋彦永 鲁淳 臧英年 蔡霞 穆广仁 薄会川 薛京 薛德震 薛攀攀  
 魏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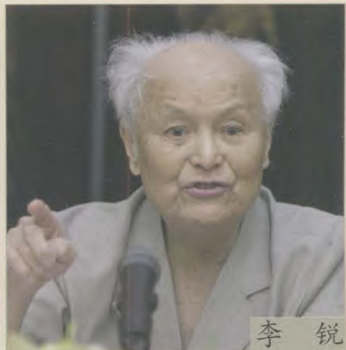
崔永元



吴思



周有光



李锐



郭道晖



江平



张大中



资中筠



郭德宏



蒋彦永



蔡霞



王恂

**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

**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

**1958年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原委**

**1945年中苏军队会师的一些情况**

**如何跳出反腐困境：建党90年的思考**

**苏联顾问与斯大林模式移植东欧**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